



久尔科·拉斯洛 著

肖像素描  
历史背景下的  
卡达尔——



D75150/1

52071

DG86/3/卡达尔

——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

〔匈〕久尔科·拉斯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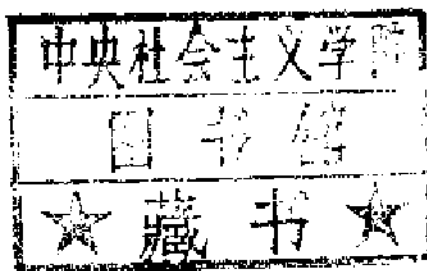
马玉琪 叶俊 刘为民 刘清文 译  
邢忠修 陈国焱 章全昌 屠良敏

陈之翥 柴鹏飞 校

(以姓氏笔划为序)



\*200053636\*



世界知识出版社

Gyurkó László  
ARCKÉPVÁZLAT  
TÖRTÉNELMI HÁTTÉRREL  
Magvető Könyvkiadó  
Felelős Kiadó Kardos György  
Budapest 1982  
根据布达佩斯播种出版社 1982年版译

封面设计：张良国

卡 达 尔  
——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  
〔匈〕久尔科·拉斯洛 著  
马玉琪等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6.75 插页：4 字数：169,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书号：3003·1661 定价：0.85元

## 译者的话

这本由匈牙利“播种出版社”出版的卡达尔评传是在1982年5月卡达尔70岁生日时问世的，也是匈牙利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介绍卡达尔的专著，对于了解卡达尔其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现行政策以及匈牙利党史、近代史都有参考价值，受到匈国内读者的欢迎。作者久尔科·拉斯洛是匈牙利著名作家、政论家，国民议会代表。

关于这本书的翻译工作，需要向读者作几点说明：

1. 我国出版的有关匈牙利的书籍中，对匈牙利人名、地名的写法不尽一致，有的出入很大。我们在翻译时主要参考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史》和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少数名字则以习惯译法为准。

2. 书中全部脚注都是我们做的。对需要作注解的人、地名，大多数都作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但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个别名字的注解也有作在其他地方的。

3. 原书除封面卡达尔肖像外，没有任何插图照片。本书卷首刊印的几幅照片，都是我们收集的。

4. 对原书中个别明显的技术性错误，我们在翻译时作了更正。

5. 本书系集体翻译，限于时间和译、校者的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3年1月6日





卡达尔近影（1980年报）



1957年5月1日卡达尔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群众集会上

1962年4月卡达尔出席社会主义劳动队长全国代表会议





1961年7月卡塔尔参观国营农场



1981年4月卡塔尔参观切削机床厂，同工人谈话



1982年5月卡达尔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授勋大会上



1982年5月在授勋招待会上讲话



1971年2月卡达尔参观哥特罗农业大学



1968年6月卡达尔访问匈牙利作家协会





1980年3月卡达尔会见出席匈党十二大的老共产党员



1973年7月，  
卡达尔视察布达佩斯第十四区，参观  
和乘坐地铁



1968年4月卡达尔访问海威什州时，少先队员向他赠送红领巾  
1973年7月卡达尔参观齐茨贝尔格少先队营，观看文艺节目



1971年4月  
卡达尔视察布达  
佩斯第十区。在  
公园看青少年下  
棋



1968年11月卡达尔视察布达佩斯市政建设，参观幼儿园





代序 .....	1
匈牙利的一个穷孩子 .....	9
地上，地下 .....	32
光明和黑暗 .....	70
走向悲剧 .....	107
新生 .....	137
后记 .....	203

## 代 序

我不是毫无偏见的。我也不相信，看待历史可以不偏不倚。对遥远的世纪尚且不能，更何况是对待不久以前的历史。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写史书。我只试图以时代为背景描绘一个人的概貌。我经历了卡达尔担任匈牙利领导人的三十五年。我并不力图公允，因为这一时代共同的喜悦、失误、成绩和挫折中，在某种形式上也有我的份。对卡达尔我也不想不偏不倚。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他。以后我又多次见过他，而且不仅是在各种会议上，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和在国会大厦。我也不会忘记，当我们在他办公室里结束了几小时长谈以后的那轻松的片刻，在那把很不舒适的靠背椅上，他身子往后一靠，松了一口气，再点燃了纸烟，满意地说：

“好，这件事我们也办完了。”

他使用多数人称是为了表示礼貌，松了一口气是表明他完成了一桩并不乐意承担的苦差事。

写这本书的前因是，有一次牛津的帕加马出版社的代表到布达佩斯来，向一位党的领导人提出，愿意在一套介绍当代政界要人的丛书中出版卡达尔的自传或传记。卡达尔十分坚决地拒绝了。他不写自传，也不同意别人写他的传记。以后我还曾听他谈到，匈牙利电视台曾经计划拍摄介绍他的电视片，如同拍摄我们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学者、艺术家的电视人物片一样，但同样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即使电视台保证拍成后不公开播放，只存在电视台的档案库里留给后世，他也不同意。

在此种种经过以后，我参与了那个旨在使牛津出版商的计划

不至于全部落空的“阴谋活动”。因为固然卡达尔固执己见，说他的个人生活不是公众的事务，然而他的几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同事也不让步，他们坚信，如果全世界能更多地了解他这不寻常的政治生涯，对我国是有益的。于是产生了一个妥协性的建议，出版一本卡达尔的文章、讲话和答记者问的选集。同时，为了使那些不了解和不熟悉这个时代的人也能理解卡达尔的经历，由我为选集写个序言。

即使要卡达尔接受这一建议也是很费劲的。我们对他提出这个要求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党的领导责成他这样做时，他才肯接受这一建议。最后只是因为政治局作了决定，他才让了步。

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反映了卡达尔一生经历的特征。1977年他在罗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一家报纸说我是‘妥协的奴隶’。我倒要说，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刺耳。我早就是一切妥协的信徒，如果这种妥协对我一直为之工作和战斗的那个事业有利的話。”

如果我们探索卡达尔的秘密，显然，他生活的最基本的动力是责任感。同时，现实感不仅是他性格的实质，也是他人生哲学的实质。这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政策。

坦率地讲，写这本书对我来说多少也有些勉为其难。我知道，而且老实的态度是应该把这一点告诉读者，这本书事实上无法避免挂一漏万的问题。

如果我要象历史学家那样做好扎扎实实的准备才动笔写书，必需花上几年时间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收集资料。我还应该访问尚在人世的同代人，并把他们的回忆同文献资料对照，还要深入研究我们这一世纪的世界历史，以了解各种事件之间的确切联系。即使这些我全部都做到了，那时仍会留下一些没有弄清和无法核实的细节。

我只能一开始就不求全，别无他法。因此，这个作品不是肖

像画，至多是幅草图。我对时代的看法当然可以商榷，我的看法不止一次地和公众的看法有差异。作为一个公民，我当然可以把责任推给历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为什么不更加深入、更加详尽地揭示这个时代和这个人物的历史？然而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必须对自己的各种分析、判断负责，对一些可以进一步商榷和不够扎实的见解负责。卡达尔没有读过我的手稿，因此无法得到他的核实。我请几个专家、政治家和朋友看过手稿，我信任他们的见解和对情况的了解。他们对我的观点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如果他们说服了我，我就接受他们的意见，如果不能说服我，则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我了解基本事实，这是可借以自慰的。弄清细节不是本书的任务。也许不澄清细微末节，也可以把本质的东西勾划出来。这一勾划即便尚有可商榷之处，也是试图分析匈牙利社会主义运动最近一段历史的一次尝试。

我既不了解卡达尔的，也不了解时代的一切秘密。因此，无法满足这个诱人和合理的要求。我只是根据我的了解写一个人物，根据我亲身的经历或我的认识描绘一个时代。我重申，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探索历史的人。

我事先已经预料到，我将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卡达尔本人。虽然他出于责任感同意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为此规定条件，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交谈时我没有使用录音机，记录也是事后补做的。这并不是因为卡达尔反对这样做。但是好几年前，有一次他曾说过，一位同他谈话的人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纸和笔，使他十分窘迫。

他不满意地说：“如果对方要记笔记，怎么能同他交谈？”

这句话出自一个已经在生活中不能同记者、记者招待会和电台报道员分开的国家领导人之口，那当然是应该注意的。但我想，如果事后补记能使谈话更随便、更无拘束，那我也将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

卡达尔是个彬彬有礼的人，这是他的性格。担任的职务越高，越要对别人有耐心。他的这一原则更使他以礼待人。他没有对我们俩人的谈话限定时间，只要求我准确地告诉他需要多少时间。

卡达尔接待来访者时桌上总是空空的，收拾得很干净。他的桌子上看不到没有处理完的公文和待复的函件。未了的工作、悬而未决的事情，总是使卡达尔感到不舒服。

他说：“我没有时间谈我的过去。”

我也主张理智的妥协，请求他给我三天时间。我想，向他询问最重要的情况，这些时间是够了，且又不至于长得使他失掉对谈话的兴趣。看来我没有失算，因为他果然满意地点点头。他只要求我们一定要守约。他十分准确地安排自己每天的时间。

我当然知道，如果要澄清所有细节，三十天也不算多。但是我也知道，这不仅是卡达尔所不能做到的，也是他所不愿意做的。

他有一次说：“我已经不如从前了。现在一到晚上我就感觉累了。”

我们进行这几次谈话时他已经六十九岁。现在，卡达尔平日还是从早工作到晚。只有一个下午看电影，这是例外。他每天早晨舒舒服服、慢条斯理地梳洗、刮胡、抽烟，久久地眺望窗外。他住在城市的高处，景色优美的地方，一幢座落在布达、林木簇拥、共三间房的小别墅里。家里到处都是书画。办公室的书架上也摆满了好几千册各种各样的书籍。1951年被捕时他就住在这里。当时，妻子被赶出家门，开除了公职，不得不长期当辅助工。现在她已经退休，退休前在部长会议情报局担任司长。

早晨是卡达尔每天工作和活动的准备时间。他利用这个时候考虑前一天和当天的工作、任务。犹如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上场前聚精会神，作好准备。他曾多次被描写为具有天赋的才能，而我却认为是他的自觉性使然。我注意到，他和六岁的孩子谈话，也象对待成年人一样。他当工人时，宁肯提前到车间，先收拾好

工作台，准备好工具，每一件工具都有条理地放在顺手的地方，随后才开始工作。

上班后，他先阅读信件和每天最重要的报告，了解情况。接着是各种会议、谈判和谈话。三十五年来他没有养成口授的习惯，总是自己亲手用铅笔起草信件和讲话稿。他每天吸二十支烟，不多也不少。以前他吸烟很厉害。

他说：“医生只让我吸十支烟。我对他们说，让我再考虑考虑。我想，如果我现在减少一半，下次他们又会要求再减少一半。因此，我就告诉他们，还是吸二十支。”

他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午饭在办公室吃，一盘肉丸子或是三两香肠。热餐只是晚上在家里吃。从前他还把工作带回家去做，现在已经不带了。最近几年，看戏、打猎、下棋、看足球赛等等他喜爱的娱乐活动已经越来越少了。他没有电视机，舍不得挤掉看书的时间。

传说卡达尔酷爱打扑克牌，这是值得一提的。国内有些神乎其神的传说，说什么很多重要的国家大事和人事问题都是在牌局上决定的。我自己也认识一些政治家，他们以为，提高打扑克的技巧，会给他们铺平仕林道路。事实是，卡达尔确实喜欢玩扑克，正如他喜欢所有娱乐一样。但是，这在他的生活中从未起过重要作用。打扑克时，他只是玩牌，不考虑任何其他事情。公众舆论主要是从密克萨特·卡尔曼<sup>①</sup>的小说里知道，上世纪末的一些政治决策，经常是在铺着绿色毡呢的牌桌上作出的。根据制造传奇故事的工艺学，现在只要把“老爷”的扑克牌局变成“无产阶级”的牌局，神话就齐全了。

如今在卡达尔的生活中只有读书是最大的嗜好，他每天仍然以读书当作休息。他没有一个晚上不读文艺作品，经常是同时看四、五本书，最喜爱的书一读再读。主要读古典作品，但使人惊

---

<sup>①</sup> 匈牙利十九世纪小说家。

讶的是，他对当代匈牙利文学也了如指掌。

“如今我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去关心和了解生活，”他说，“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帮我的忙。”

他微笑了。

“你们作家帮助我了解世界。当然，只是在有的时候。”

虽然我知道他十分繁忙——他的工作量即便对于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来说也是了不起的——但我始终不相信，他如此难以说服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时间。

我对他的种种了解表明，卡达尔·亚诺什确实是个十分谦逊的人。我经常在饱经风霜的、智慧的老农中间看到这种性格。他们乐意谈论收成、庄稼、村里和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但是闭口不谈自己。他们并非要保守什么秘密，而是他们的秉性内向使然。他们不愿意，也不让任何人深入了解他们个人。这种心灵上的羞涩至少同肉体上的羞耻感同样强烈。

显然，卡达尔具有这种性格。我不想研讨这一秘密，只是记载事实。如果新闻片里出现他的镜头，他马上走出放映室。他从来不从收音机里听自己的讲话，或是从电视里看自己的镜头。看不到他的传略，无论是正式的、半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都没有出版过。在各种百科全书和手册中出现的关于他的简短记载里，有些资料相互矛盾。这只能从他本人并没有看过这些材料中寻找答案。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了唯一的一本有关他的书，书中甚至连他的出生日期都同事实不符。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名字。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厌恶各种庆典。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现在电视的荧光屏上或在电台讲话。

他六十寿辰的时候，中央委员会曾为他设宴祝贺。当时总算发表了他即席所作答词的全文，没有做任何文字上的修饰。那未经加工整理的字句，讲话中出现的重复，以及措词上的粗糙之处，都只能使他的讲话内容听起来更加亲切可信。

“出于礼节我也应该讲几句话，虽然在这种时候讲话并不十

分容易。首先我想说，我所成长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在我们的家庭中没有庆祝结婚周年、生日或命名日的习惯。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大的。在最近一、二十年里我才第一次遇到要正式或非正式地庆祝这种日子。我觉得，家庭生活中的大事庆祝一下是好的，但我过去没有这样做过；我还不习惯，现在才开始习惯起来。我说这话是想请同志们理解，这个周年，这些活动使我心情紧张、窘迫不安。纪念生日作为家庭私事是正确的，是好事，这是我国人民的传统。遗憾的是，在我成长和明事理的时代，这种事情没有我的份。我感到这是一个缺陷，但已经无法改变。至于把做生日这样的家庭私事变成公事，变成政治，那是另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在适当的限度内把一件纯粹是个人的私事，譬如说生日，变成政治和公事，从道理上我是理解的，而且实际上也认为是正确的。但我只有在两个条件下理解和赞成这样做，一是在适当的限度内，二是不涉及到我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十分赞成。如果涉及到我，我要重申已经说过的话：这将使我紧张和不安。简单地说，我不习惯。”

在我盘问他的生活时，我不得不一直提醒自己注意他那不喜欢谈论自己的特点。然而他的生活中不知有多少细节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只能向他本人了解。不仅由于时间短缺，而且应该受到尊重的卡达尔的个人性格也限制了我的提问。

但是，卡达尔性格并不孤僻，他合群。他喜欢交朋友，喜欢聊天、开玩笑，有时候他的幽默也是十分辛辣的。只是不喜欢突出他个人。

他具有这样的性格，但却早在青年时期就担任了领导职务，并且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不小的矛盾。这种两重性也只能用责任感来解释。

据我知道，他原来准备像我国大多数劳动者一样，到规定年龄就退休。结果并非如此。这没有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理解到，国家还需要他。像卡达尔这样不关心自己地位的领导人是少



有的。对他来说，权力是个负担。据他的一位同事说，他真正害怕的有两件事：牙科医生和权力。对权力更加害怕。

一个指导国家命运几十年、每天参与最重大的决策、其全部生活节奏和工作日程已经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一旦他的生活、日常环境、生活起居起了根本的变化，不再要每天上班去完成任务，这对他来说，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但是我并不相信，如果卡达尔退休了，他会象我所认识的一些领导人那样，变成一个忧郁、烦躁和失去目标的人，不能适应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卡达尔如果休假，他就真正从政治生活、公务和国家大事中脱身出来，甚至连报纸也只是浏览一下而已。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少见的安稳而善于律己的人。

当我谈到卡达尔的秘密时，我想到的不是国家机密，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它们都是政治领导人生活的一部分。我指的是人物特征和个性方面的秘密，这是每个人最内在的特点。这确实是卡达尔的私事，但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经历和政策。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才同公众有关。

卡达尔有一个最重要的、确实和大家有关的秘密。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1956年11月，对几十万匈牙利人来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是地球上最可憎的人。如果翻阅一下当年的西方报刊，在他的名字前面只能见到“卖国贼”、“刽子手”、“苏联的走狗”和“暴君”这样的形容词。

二十五年过去了。今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仍然是卡达尔·亚诺什，而他现在无疑是全国最受尊敬和最受欢迎的人。同时，注意西方报刊的人可以看到，今天，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最顽固的敌人，对卡达尔个人及其政策也是尊重的。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是卡达尔的真正秘密所在。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秘密。

## 匈牙利的一个穷孩子

1912年卡达尔·亚诺什诞生时，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坐在帝国皇位上的是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陛下。他的封号不计其数，他的帝国疆域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波兰和意大利的一部分。他的统治从1848年延续到1916年，前后六十八年，历时之长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哈布斯堡王朝最末第二代的统治者权力极大，寿命很长，而他的家族的命运却极为不幸。他的弟弟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被那里得胜的自由战士处决。他的女儿苏菲短命夭折。他的儿子鲁道夫亲王在枪杀了自己的情人后自尽身亡。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死。他的侄子弗兰西斯·斐迪南皇储和妻子一起，被一个塞尔维亚学生杀死，成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这一段黑色的史料不仅意味着从1273年开始其统治的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濒临覆灭。鲁道夫亲王因为不能娶维泽拉·玛丽亚为妻而自尽（哈布斯堡亲王不能和一个普通的女男爵结婚），弗兰西斯·斐迪南却比较固执，他娶了女伯爵恰戴克·苏菲为妻，从而违背了历时六百五十年的王朝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仅要在婚前向皇帝和亲王们承认，他的婚姻有辱门第，因此他的后代将丧失继承皇位的权利，他的妻子也不能享受王妃的各种特权，他的子女将犹如私生子一样只能袭用母亲的姓氏。这种今天看来十分可笑，但当时却是森严的礼制造成了皇储夫妇死亡这一十分严重的后果。根据弗兰西斯·斐迪南

的身份，1914年他出访萨拉热窝时，街道两旁应该有武装士兵列队保卫他的安全；但是，根据礼宾规定，他的妻子不能享受这样一种尊贵的礼遇。因此，刺客就能毫无阻拦地两次走近皇储的马车，第一次暗杀失败后第二次得逞了。

卡达尔·亚诺什1912年5月26日出生于阜姆<sup>①</sup>。出生登记时的名字是齐尔毛奈克·亚诺什。齐尔毛奈克是他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个几乎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她从离多瑙河上游不远的奥焦拉来到几百公里以外的亚得里亚海滨谋生。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在阜姆当女仆。这是当时和以后几十年中一些在家无法糊口度日，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农村姑娘的唯一谋生之道。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在亚得里亚海滨爱上了一个在阜姆服兵役的农村小伙子，他老家在多瑙河西部地区。打那以后他们俩的遭遇同皇储夫妇一样，只是没有富丽堂皇的宫殿，没有纸醉金迷的宴游，也没有炸弹和枪声罢了。年轻的士兵想要自己的情人，但是得不到家庭的同意。他家有几霍尔特<sup>②</sup>土地，而姑娘却一无所有，无异乞丐。根据当时的规矩和做法，小伙子被迫娶了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姑娘。未婚的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生了儿子，当了母亲。封建的束缚和习惯，对皇室和最贫苦的农民同样是冷酷无情的。

当时在匈牙利当私生子是很大的耻辱。我不知道卡达尔在儿童时代是如何忍受这一命运的。他肯定早就饱尝了社会偏见的滋味。

当女仆谋生的人是不应该有孩子的。谁家都不愿雇用一个带孩子的女仆。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为了找到工作，只好把儿子托给别人抚养，她无依无靠，舍此别无他法。这样，卡达尔在童年时就到了绍莫吉州的卡波伊村。他已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地阜姆城了。后来他以国家领导人的身分第一次访问了这个城市。卡达

---

① 今南斯拉夫的里耶卡。

② 一霍尔特为0.67公顷。

尔不是那种怀古恋旧的人。

卡波伊确是穷乡僻壤。没有铁路，也不通公路。无须说，村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下水道，当时大部分农村里都没有这些。三十年代，我自己也在这一带度过一段童年时代。我还记得这一地势优美、穷得可怜的村子。有两条弯弯曲曲的小街，中间是一条小溪，一到夏天就干涸。村子的尽处就是森林。卡波伊大约有一千居民，一半是天主教徒，一半是新教徒。多数人生活十分穷苦，但是两个教派仍然各有自己的教堂，这是当时的规矩。由于大部分土地归本笃会教派的蒂豪尼修道院所有，即使有点活计，也是先交给天主教徒。卡达尔的养父是新教徒。他和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一样，是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只是有个避风栖身的地方，园子里长点零星东西，养点小牲口。他的妻子患着重病，不能干活，还需要别人照料，这就大大加重了他原来也并不轻松的生活担子。

许多年以后，卡达尔曾经这样回忆起当时的岁月：

“六岁以前我是在绍莫吉州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的。村子里点的是煤油灯，住的是茅草屋。这是个穷人窝，但它是我的世界。我熟悉那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面山坡，每一条小溪。绍莫吉州和这些熟悉的景色几乎就是我的故乡，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我开始记事及了解周围人物、环境和认识祖国的重要年代。每个地区不论在方言、人情、习惯、服饰、民间艺术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吸取了这些特色，并一直保持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所有这一切我是在绍莫吉州从生活中得到的，而且直至今日它不仅只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卡达尔的童年时代在许多方面同尤若夫·奥蒂拉<sup>①</sup>十分相似。但是在尤若夫的一生中，对童年的回忆一直象恶梦那样可怕，而卡达尔回忆起这些年代来却宛如牧歌一样悦人。这应该感谢他

---

<sup>①</sup> 尤若夫·奥蒂拉（1905—1937），匈牙利无产阶级诗人。

的养父和养母，但首先是他的养父。除了他的妻子和母亲以外，我还没有听说过卡达尔象谈起养父山多尔叔叔时那种激情谈起过其他任何人。这个寡言的农民怀有一颗万分善良的心。他每天要为一块糊口的面包辛劳、奔波。生活经常没有保障，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而这比艰辛的劳动更折磨人。他不象其他许多同命运的人那样借酒消愁，也不向他的亲人发泄烦闷。穷人的苦命没有使他的心肠变硬，他细心照料妻子，十分疼爱孩子。妻子去世后，他为了这个孩子曾经想同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结婚。

不幸的人  
喟然长叹，  
深深地向往人们的爱。  
因为  
爱可以召唤他奋起，  
把不愿做的事  
抛开。  
如果有了爱，  
他本来会洁净无瑕，  
人们也不会对他拳足相加。  
他是一个  
没有被爱祝福过的孩子，  
人们于是  
就更不爱他，  
就更禁不住要把他  
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是尤若夫·奥蒂拉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的悲嚎。当时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提到死的事。爱未能拯救他，制止他做出他所怕做的事。有两件悲惨的事情可以说明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这一代的优秀的评论家和一位同龄人中间最

优秀的演员，都是在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在尤若夫·奥蒂拉自杀的地方卧轨的，前后只相差几年时间。他们以生命的最后一个行动向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和导师尤若夫·奥蒂拉表示象征性的敬意。

“我在卡波伊学到了，”卡达尔说，“人如果能得到旁人的疼爱，即使最艰苦的命运他也可以忍受。”

他的脸上和额头布满了皱纹，有时目光疲惫。他的生活绝对不是轻松的。

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从山多尔叔叔那里听到的一句至理名言：

“亚尼，<sup>①</sup> 你要记住，穷人的孩子任何时候都要干活。”

“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卡达尔微笑着说，但是可以看出，他真是这么想的。

山多尔叔叔说的正是这孩子必须在生活中学会的东西。他刚学会走路、说话，就要帮着干家里的活，照料养母，以后又喂火鸡、当小猪倌、帮助饲养牲口。

可能是在六岁那年，一个炎热的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正是收割季节，全村的人都在地里干活。他和三个同年岁的孩子在村里仅有的一幢瓦房的晒场上玩耍。瓦房顶当时不仅意味着富有，也说明身份。房子的主人是位类似总管家那样的先生。他的一个儿子有点呆傻，按照现在的说法智力有点缺陷。在大伏天里也一再叫冷。于是他生起了火，烧着了草垛和房子。教堂里警钟齐鸣，割麦子的人从地里跑回来。孩子们觉得还是溜之大吉为妙。但是，傍晚他们不得不悄悄地溜回村里。小齐尔毛奈克问心无愧，不是他点起的火。可管家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抽了他一马鞭子。孩子跑回家去找山多尔叔叔。山多尔叔叔安静地听完他的哭诉后对他说：

---

<sup>①</sup> 亚诺什的爱称。

“只有给你面包的人才能揍你。”

农民的这句古话反映了被剥夺一空和受人鄙视的农民的反抗和自豪。这话十分切合山多尔叔叔的性格。但是，这一事件的收场白也十分切合卡达尔的性格。大约在十五年以后，他回到他成长的农村探亲。当时他已经有多数没有回卡波伊了。他是从布达佩斯骑自行车去的。在村头碰到一群妇女。他向她们打招呼，问她们是否还记得齐尔毛奈克·亚尼。当然记得。她们回答说，就是烧了管家房子的那个孩子。这话使卡达尔十分生气：人们对他的回忆竟是如此的不公平。他骑上车，回头就走。就这样，没有进村就返回了首都，两地相隔有一百五十公里。这个说话声音不高、文静、持重的人有着倔强的性格，很难容忍不公道的事。然而，他一生中却不知要忍受多少这样的事。

他六岁的时候随母亲到布达佩斯，但是，他和山多尔叔叔的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假期他总回到农村，夏天干农活挣的钱可以支付他上学的部分费用。这样他不仅学完了四年初小，还进了四年高小，这在象他这样的穷孩子中间已可算是凤毛麟角了。只是在当了学徒以后，才不能再去卡波伊，因为那时候学徒是没有假期的。他挣了工资，只要有可能，总是给山多尔叔叔寄几个钱。老人自己有房子，园子里种点最必需的东西，日子还过得去，这几个钱有时可以用来请朋友喝一杯酒，因此感到莫大的安慰和骄傲。这种显示自己体面的机会对山多尔叔叔来说，至少同每天的面包一样重要。但愿这种人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农村不仅对童年的卡达尔意味着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使他爱上了大自然，直到现在，只要有可能，他也非常喜欢去林间漫步。对日后的政治家卡达尔来说，农村也是个大学校。他多年生活在农民中间，深深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道德观和生活哲理。在卡达尔的青年时代，匈牙利是个农业国，这种状况以后还持续了好长时期。在二十年代，三分之二的居民生活在农村，半数的就业人口从事农业劳动。全国四分之一的可耕地掌握在一千

个大地主手里，他们有四十万雇工和短工，包括家属占全国人口的20%。85%的农民自有地不能为它们的所有者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

离卡波伊不到十公里的地方有个更小的村子布斯道赛梅什，童年的齐尔毛奈克·亚诺什根本不知道那里住着他的生身父亲。只是在长大成人后，他才知道有父亲和三个异母兄弟。但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密切的关系。

“血缘不是真正的纽带。”卡达尔说：“我们一辈子互不通音讯。这既不能弥补，也无法挽救。”

父亲的脾气可能和他一样犟。晚年得了脉管狭窄症，需要截肢。老人不同意，说宁可死也不能活着没有腿。举行葬礼时，卡达尔送了花圈。他们父子只见过一面。我想，卡达尔对他父亲遗弃了他母亲是不会谅解的。

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在首都当洗衣女工、送报人和门房助手。记得这些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门房助手是个低贱的职业。根据社会上的等级，这种工作相当于扫街的清道夫。两者的区别只是，门房助手每时每刻不仅要听从门房的使唤，还要忍受楼里每个居民的怪脾气。要使一个孩子也要适应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容易的，可能他最难忍受的是屈辱。

母亲和儿子很难亲热起来。这不仅因为孩子十分喜爱山多尔叔叔一家，把他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父母，而对经常见不到面的母亲却缺乏这样的感情；还因为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是个性格怪僻的妇女，情绪多变，喜怒无常。卡达尔说她是个苦命人。她的眼睛十分近视，看书时眼前的字母模糊成片，只上了两年小学就退学了。她见到的世界总是笼罩着一片迷雾，她在人群中间总是一边摸索一边行走，蹒跚前进，这使她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增加了一重困难。

孩子最不能理解的是宗教。我不想把日后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世界观追源到他的童年时代。事情的原因要简单得多：山多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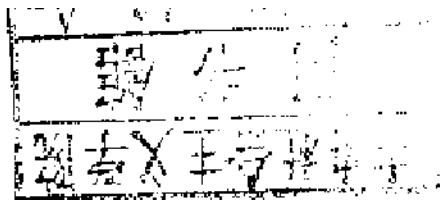
叔不信上帝，所以齐尔毛奈克·亚尼也不信上帝。而一半匈牙利族血统、一半斯洛伐克族血统的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孩子不能理解，为什么圣诞节晚上尽管家里还有吃的，母亲还是差他出去排队买面包。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穷苦人为了买到第二天清晨的面包，晚上就得到面包房门前排队等候。天气严寒，孩子冻得难以忍受。他想解个手，请一位妇女帮他照看一下位子，自己跑回家去了。他从窗口朝屋内偷看，见妈妈正在布置圣诞树。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非要他去排队不可。但是对此他并不理解。在卡波伊老家，圣诞节前山多尔叔叔总是拿上小斧子，拉着孩子的手一起到森林里去砍松树。齐尔毛奈克·亚尼知道，圣诞树不是耶稣送来的。但是，妈妈却非要他相信不可。

晚上妈妈做祷告。她大声训斥孩子，要他也做祷告。孩子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做。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在角落里撒上玉米粒，强迫不听话的孩子跪在上面。这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最轻的体罚。“跪壁角”是一种耻辱，说明罪人被逐出在世界之外了，他不配成为世界的一分子。不过，玉米粒会磨破膝盖，体罚也造成一点肉体上的疼痛。

做完祈祷，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躺下休息了。孩子还跪在壁角里，一动也不动。他们俩人谁都没有睡着。后来妈妈开始恳求固执的孩子过来躺下，但是他受了委屈，不肯过来。只是在母亲已经哭泣着苦苦哀求的时候，亚尼才站起身来。

卡达尔·亚诺什和尤若夫·奥蒂拉童年时代的区别，不仅在于在相同的环境下卡达尔的遭遇比较幸运。区别还在于，卡达尔遇到自己的真理受到损害时总是倔强地反抗；而感情脆弱得多的尤若夫·奥蒂拉，却把一个又一个创伤留在自己的心灵里。两个都是叛逆者，一个成了党的工作者，一个成了诗人。

虽然母子间开始有过一点小磨擦，但我不相信，卡达尔除了妻子外还有比母亲更亲的人了。他一直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



她逝世。坐牢的年代和搞地下工作的时间当然除外。卡达尔曾经长期坐牢，搞地下活动的时间也不短。当卡达尔已经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也知道，不管多晚回家，母亲总是等着他。她蜷身坐在厨房里，儿子不回家她是不肯躺下睡觉的。责任感和母爱督促着这位当年的农村姑娘：儿子不睡她也不能躺下。而当时党的领导人很少有在午夜前上床的。

暂时我们还要说一说1918年的事。齐尔毛奈克·亚诺什当时从卡波伊来到布达佩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匈帝国都已经接近尾声。10月，奥匈帝国向协约国提出了和谈建议，承认已经战败。此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垂死挣扎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帝国崩溃了。11月，卡罗利·米哈依领导的匈牙利新政府决定脱离奥地利。

1918年革命<sup>①</sup>的象征是秋玫瑰，这是一种温柔的、不娇贵的花朵，士兵们把它别在帽子上，代替已经摘掉的帝国的帽徽；老百姓把它别在上衣的扣眼上。革命实现了全国一致同意的和平、独立和公民自由权的要求，但无法控制经济崩溃，也解决不了匈牙利最大的问题——土地问题。全国仅天主教会就占有一百五十多万霍尔特土地，有的大地主拥有十多万霍尔特，而几百万农民却家无寸土。虽然制定了赎买大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法律，虽然已经被选为共和国临时总统的卡罗利以分自己的土地做出了榜样，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土地法实质上只是一纸空文。

1918年11月，从俄国回来的战俘中的共产党人、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个被称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小组和若干左派知识分子组成了“匈牙利的共产党”。这个党和其他政治力量不同，它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尽管一开始他们的人数很少，但随着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他们的影响扩大了，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1919年2月，游

<sup>①</sup> 1918年革命，指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以卡罗利·米哈依为首的新政府，宣布为共和国，从此奥匈帝国解体。

行示威的失业工人和维持治安的军警发生了冲突，在战斗中不少人丧命，大约有五十名共产党领导人被捕。

把左翼暂时压下去，并没有解决卡罗利政府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卡罗利·米哈依及其伙伴一开始就期待着，如果脱离哈布斯堡王朝和宣布成立共和国，就可以赢得协约国的信任，并会在确定边界时体现威尔逊<sup>①</sup>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悦耳的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

1919年3月21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了新政府的成员，他们被称做人民委员，政府被称为革命苏维埃政府，以此显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产阶级制度的区别，革命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社会民主党人高尔巴伊·山多尔，外交人民委员由共产党员库恩·贝拉<sup>②</sup>担任。

卡达尔并不记得这些震撼国家的事件。这不仅因为当时他才七岁，而且还因为那时他生活中发生的根本变化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灵，使他心神不定。他不是那种顷刻间就能轻松自如地适应新环境、新形势和新条件的性格。几十年后他曾经这样写道：

“我走出南火车站，看到了，并在以后熟悉了布达佩斯。当时它对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柏油马路、铺石块的大街、电灯、楼房、电车、地下电车、汽车、飞机、电影院，以及其他过去没有见过的奇物，第一次见到了这汪洋大海般多的陌生人。这一切对我说来既美妙，又陌生、可怕。我承认，在好几年内布达佩斯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并不令我十分喜欢。”

卡达尔对于以后决定了他一生生活的苏维埃共和国确实没有什么记忆。一个从偏僻寂静的农村突然来到杂乱、喧闹的大城市的七岁孩子，他能从世界的变化中发现什么呢？为了买到面包和

---

① 当时的美国总统。

② 库恩·贝拉（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缔造者之一。

土豆，必须和从前一样排队，钱和衣服不比以前多，玩具和糖仍没有他的份。苏维埃共和国继承了贫穷和困苦，而觉悟不是一个孩子的特征。

不过，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当时正以猛烈的速度在匈牙利进行着。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号公告宣布了大庄园、工厂、银行、交通企业收归社会所有。二十人以上的工厂和一百霍尔特以上的地产收归国有。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0%，实行了免费医疗、病休补贴，制定了普遍的退休金条例，就业的产妇享受十二周的产假，工资照发，为私生子保证了平等的权利。在首都，原来住得拥挤不堪的二十五万穷人中有十多人搬进了富人的别墅或宽敞的住房。布达佩斯成立了工人大学，几千名体力劳动者每天下午在这里脱产学习工厂管理、会计和外文。苏维埃法律规定，除剥削者和神甫外，年满十八岁的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布政教分离，学校和教育机构全部收归国有。制订了统一的小学学制，决定实行儿童十四岁以前的义务教育制，以代替过去的小学四年制。

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在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时间内，新的制度凭借它自己的力量和想象力，竟然办了这么许多事情，虽然它的一些条例常常制订得过于仓促，或者无法执行，条例在实施中遇到许多阻力，还不断出现混乱。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乌托邦主义的表现。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是短暂的过渡，通过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将建立起共产主义。

这个乌托邦主义也造成了苏维埃匈牙利的最严重的政治失误，即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直接在收归国有的土地上建立了合作社。自古以来土地是农民梦寐以求的东西，谁给他土地，他就支持谁，这是苏维埃俄国取得成功的一个秘密。可是苏维埃匈牙利没有把土地分给一无所有的人，因此，大多数农民没有感觉到革命是自己的事，没有象保卫自己的土地那样为革命进行斗争。这个致命错误的影响不仅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而且在苏维

埃政权失败和1945年全国解放以后都可以感觉出来。一个错误的政治决策影响了半个世纪的匈牙利历史。农民的意识中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深刻的概念：苏维埃政权分给了他们土地，霍尔蒂<sup>①</sup>制度夺走了他们的土地。

不过，苏维埃共和国即使执行正确的农民政策，最后也是要失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深信，短时期内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许多欧洲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匈牙利将不是敌人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而是一个强大联邦的一员。这也是当时俄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苏维埃政权的历史。

是以各种可能性，还是以各种事实作依据来判断历史，这是一切历史哲理的关键问题。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伟大的成就和重大的挫折并不出于偶然。但是，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形式都不是注定和必然的。这样，越是在乱世年代，一些日后看来是空想主义的希望越显得真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就是这样的年代。这不仅因为对各种事件几乎不可能看清、看透，而且首先由于历史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加快了自己的活动，因此，在这种时刻，一些过激的可能性比在安定的时期要显得现实。

从六十年后回溯往事，我的看法和一些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不同。我认为，当时对实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并不是那种幼稚的盼望救世主的思想，而确乎存在着现实的可能。那时在战败的德国出现了同俄国、匈牙利相同的革命形势。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取胜，革命的火焰很可能至少燃烧到东欧。

德国革命<sup>②</sup>的失败也决定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命运。虽然在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发生过战斗和起义，但它们都是孤立进行的。德国的失败也决定了苏维埃匈牙利的命运。西方列强不会允许在欧洲存在一个异体。

---

① 霍尔蒂（1868—1957），1920—1944年为匈牙利摄政，1957年死于葡萄牙。

② 指1918年11月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十一月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政体。后来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获得政权。

正如它们也企图在苏维埃俄国扼杀新的制度一样。但是，巨大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能够抵御外来的进攻，而小小的匈牙利对此却无能为力。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战斗，还获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但在超过它数倍的力量面前最终不得不归于失败。

1919年8月1日，在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革命政府宣布辞职，并将政权移交给一个工会政府，主持会议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罗奈伊·佐尔坦没有否定苏维埃共和国，他讲到了妥协，说这一妥协可以拯救“匈牙利的国土，待世界革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世界革命的旗帜将重新在这里飘扬。”

我不知道罗奈伊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许是相信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满怀着一个乌托邦的美好希望而诞生、存在和失败。它存在一百三十三天，比巴黎公社持续的时间长一倍。

当革命和反革命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小齐尔毛奈克正在熟悉他所十分陌生并在许多方面令人生畏的大城市。学校里开始大家把他当作乡巴佬，当他象绍莫吉人那样把小鸡叫做“比比采”时，引起了全班学生和老师的哄堂大笑。为了使自己不在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中间感到孤独，他从农村带来了一只小公鸡。现在他也饲养家禽，保留着幼年时的习惯。他在大自然中寻找躲避陌生大城市的“避难所”。

他写道：“我住在市中心，以后又住在第十三区、第七区和第六区，这样，逐渐熟悉了布达佩斯。因为我母亲是个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没有技术的女工，所以我一边上学，一边要做家务，还要听从差遣在城里东奔西走。但是，空余时间里我也在城里转来转去。在农村的时候，我在林间、田野和村边闲逛，因此在布达佩斯我也尽量朝外跑，到那些可以自由呼吸和没有重重楼房挡住我视线的地方去。我陆续发现了一些地方，经常喜欢到那里去游玩，如多瑙河岸、冬码头、拉奇玛涅什、盖兰弗尔德、盖莱尔特山、老鹰山、瓦罗什莫约尔、蚊子岛、城市公园、人民公园等等。”

对布达佩斯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到这些地方去游逛都要步

行好几个小时。穷孩子是没有钱坐电车的。

“当时我习惯这个城市是非常困难的。”卡达尔说：“但是现在我却已觉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布达佩斯人了。您瞧，人就是这样奇怪！”

除了上学、劳动、闲逛外，他的童年生活中还有三件爱好：踢足球、看书和下棋。这就是说，留下睡觉的时间不会太多。他在椴树街的体育俱乐部少年队踢了两年足球，对椴树街队员的黄蓝条运动服感到自豪，并且甘愿忍受因常常踢破鞋子而遭到妈妈的斥责和耳光。他在球场上的角色现在称之为前卫，自然他幻想过当个国家队队员，但是，当了学徒后再也没有时间到人民公园去踢足球了。现在他仍然爱看足球比赛。

看书很快成了他的嗜好。凡是到手的书他都如饥似渴地一口气看完。因为多半在晚上才有点看书的时间，而家里没有电灯，煤油又昂贵，他只好借着路灯的亮光看书，尽管早上五点钟就要上班劳动，还是常常看到半夜。他是一生缺睡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书籍能这样吸引着我，可能是因为它们给我展示了新的世界。”他说，“虽然我总是更相信生活，而不是文学，但当时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我慢慢习惯了看书，现在书籍已象粮食那样不可缺少了。”

他在下棋方面达到了可以参加比赛的水平。他是外费伦茨瓦罗什区的工人象棋小组的成员。无须说，他曾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未来的国际象棋大师。他没有当上象棋大师，但是现在也十分关心象棋界的事，在家里看着棋谱下一盘疑局，成了他喜爱的娱乐。

文化和体育一直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读书和象棋小组、体操协会、朗诵晚会、体育俱乐部、科学报告会、远足小组，这些活动同谈论政治一样，都是工人运动生活中的一部分。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一直遭到迫害，因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中性”组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敏感地

意识到，只有在活跃的团体中才能有集体生活。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两个原因是互为补充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从这种环境和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下棋曾经使卡达尔有过一段对他的生活确实起过影响的经历。在豪沃什街的理发师工会大楼里组织了一次青年象棋比赛。获得比赛第一名的可以得到一本书做奖品。十六岁的齐尔毛奈克获胜，领到了奖品。对此以后他回忆说：

“我回到家里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连书名《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也是古怪的。书的内容对我困难更多。过去，从通俗小说《赫尔克里什先生》到瓦尔纳和左拉的著作，我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但是从来没有读过这类书。读完一遍后我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书是匈牙利文的，我认识字母，也懂得字、词和句子，但是对整本书我仍然一点都看不懂。不用说，当时我对自己的智力估价很高。我想，毛病一定出在书上。生命的秘密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而这本书里却写着：‘生命就是蛋白体存在的方式。’这句话使我感到愤怒，但也使我不能平静，它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不想细谈。总之我被这本书迷住了。我越来越专心致志地读这本书，八个月里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朋友们拉我走，对我大声喊叫、做鬼脸，都不能使我把书放下。最后他们用手指着自己的额头，表示他们认为我有点不正常。不能说当时我完全理解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书籍。但是，从那以后，我对生活的看法同过去不一样了。”

只要从头到尾看一看《反杜林论》的目录，我们就会怀疑，只上过四年高小的年轻学徒，怎么能够确切地了解其中的字句和概念。因为在目录里可以看到这样的章目：“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否定之否定”，“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等。翻开书还可以读到这样的字句：“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之中的、尚未发展的



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之中，这些隐藏的因素的区别和分离已经显现出来，它们的抗争也开始了。”

即使略有哲学知识的读者，如果能准确地理解这些句子和《反杜林论》的含意，那也已经是了不起了的了。在卡达尔写了上述回忆录的二十五年后，即在他读了这本书的五十二年后，我重新向他提出问题：他读过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他回答的时候措词十分确切、严谨，这说明他深入考虑过这个问题。

“读了《反杜林论》并没有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单凭我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都不知道这一点，我也成不了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这本十分奇怪的书使我思考了几乎整整一年时间。因为看不懂，就使我更加好奇。不仅是这个对我陌生的世界的种种奥秘使我感到激动。使我激动不已的原因还在于，从这个起初显得无法理解的思路中，我隐约地意识到了一些日后将成为我的人生意义的事物。我不相信，我同这本书‘拼斗’了八个月以后理解了恩格斯的论点。但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思想方法。我觉悟到，世界上还有一些我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事物法则和联系。”

当时，卡达尔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而且也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工人运动。当时的法律不仅严禁十八岁以下的工人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在匈牙利是被禁止的）<sup>①</sup>，甚至禁止他加入工会。卡达尔记得，他当学徒的时候，整个车间里只有一个工人参加了工会。卡达尔猜想，正是由于上述禁令，这位工人从来没有同他谈过政治。

为了理解这一事实，我们必须重新回过来看一看历史。

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政府把政权交给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工会政府，它幼稚地相信，这个政府将多少能拯救一下工人

---

<sup>①</sup> 自1919年8月匈苏维埃共和国失败至1945年匈解放前，共产党在匈牙利是被禁止的。

运动。但是工会政府总共只执政五天。1919年8月4日，罗马尼亚国王的军队进驻布达佩斯，两天以后，自封为总督的约瑟夫·哈布斯堡亲王迫使政府下台，任命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家担任总理。

如果不是因为接着而来的时期是匈牙利左翼力量的一场悲剧，简直可以把这几个月中出现的政治乱子称为闹剧。根据掌握的材料，在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的头三个月，五千人被杀害，七万多人被投入监狱、集中营，十万人逃亡国外。我们掌握的材料显然是不完全的，因为零星的杀人一般是不予记载的。

政府不断更迭，8月底，自己任命为总督的约瑟夫亲王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下了台。罗马尼亚人把大批工厂设备、粮食和其他财物从匈牙利运走。他们不仅对占领区的居民，也对政府实施暴政，实行新闻检查，窃听部长们的电话，如果总理想去外地，也要取得罗马尼亚军事司令部的允许。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弄清楚，究竟是谁在执政。

胜利者也处于为难的境地。他们打垮了一个左翼制度，但是不知道该把政权移交给谁。匈牙利的邻国害怕建立任何可能复活奥匈帝国的政府，因此它们根本不信任大部分是贵族的保守派政治家。协约国则希望匈牙利建立起一个自由派的政府，视之为对抗复辟哈布斯堡王朝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好工具，因此它们不接受保守派贵族的毛遂自荐。

最后，正如这种时候所常见的那样，军人接过了主动权。1919年8月9日，一支大部分由职业军官和士官组成的一千人的国民军，从法国占领的塞格德向没有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多瑙河以西地区进军。这支部队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们吊人、鞭笞、棍打，用烧红的热铁在被俘的人身上烙印，活剥受害者的人皮，在他们乘坐的装甲火车锅炉里烧死俘虏。自从1514年镇压农民起

义<sup>①</sup>以来，匈牙利从来没有掀起过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为了表示同红军对立而自称为白军的反革命分子，可悲地超过了1848年自由斗争的镇压者。奥地利皇帝的海瑞将军只把被捕的自由战士吊死、枪杀和关进监狱，而白军采用的却是和1514年一样的中世纪方式，当时农民皇帝多热·久尔吉<sup>②</sup>被活活地烤死在烧红的铁制皇位上。

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也曾经处决过人，这是事实。当时国家保安队曾经公开和骄傲地自称为暴力主义者。这些穿短皮大衣的“列宁子弟”约有二百人。这个后来由于行动过火而被解散的保安队，在它的整个活动期间，未经法庭审判处决了十二人。如果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不妨把这个数字再加上几倍，那也只相当于白色恐怖受害者的一个尾数。同时，暴力主义者虽然杀人，但不折磨人。谁感觉不出这种区别，谁就根本不能理解二十世纪的东欧和中欧历史。

国民军的首领是当时五十一岁的霍尔蒂·米克洛什。他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有一千霍尔特土地。同大地主相比，他简直是个乞丐，够不上贵人的等级。但对农民、工人和市民来说，他是位傲慢的老爷。奥匈帝国时期他当过海军军官，是舰队的海军少将，做过几年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的侍从官。他是个保守、严厉，但并不特别聪明的军官，甚至在担任国民军统帅时讲奥匈帝国的官话，胜过自己祖国的语言。他不是由于军衔最高而担任国民军统帅职务的。而是因为在这场胜负未决的权力之争中，有可能获胜的政治家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重要对手的缘故。

1920年3月，纳吉巴尼奥的维戴什——霍尔蒂·米克洛什<sup>③</sup>被选为匈牙利摄政。之后，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事实上他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① 由于封建地主残酷剥削，1514年爆发了匈牙利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② 1514年匈农民起义的领袖。

③ 维戴什在匈文中是“勇士”的意思，这里是反动统治时期的一个封号。

我多次见过他的照片和新闻电影，有二、三次还见过这位身板挺直、有老鹰鼻子的统治者本人。他经常穿着海军军官礼服，佩戴着无数枚勋章，并且喜欢骑在马背上出头露面，由此还得了个绰号：骑马的海军。

今天，事过几十年之后，当我已经了解了历史，阅读了秘密档案材料和霍尔蒂的自传，我只能说，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二十四年来，这一制度下的能力比他强得多的政治家，竟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人人都承认他的权力。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对手。解开这个谜将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任务。

当选摄政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极端民族主义者霍尔蒂签署了特里亚农和约<sup>①</sup>。根据和约，三百万匈牙利人成为少数民族。匈牙利领土从过去的二十八万二千平方公里缩小到九万三千平方公里，人口从一千八百万减少到八百万。几十万匈牙利人从新的国界线以外逃到匈牙利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长年累月地住在火车车厢里或贫民区里。霍尔蒂接受的媾和条件比卡罗利政府和苏维埃共和国所不愿接受的还要糟得多。诚然，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说他也可以有别的办法：既然已经和自己声称的原则如此尖锐对立，不妨辞职。但霍尔蒂生涯的特点是，他从不引退，且总是借口他没有别的办法。

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后的两年是一个全面混乱的时期。只是在1921年霍尔蒂任命了拜特伦·伊斯特万伯爵为总理后，制度才开始巩固。拜特伦是霍尔蒂时期最有见解的政治家，他出身于一个全国最古老的名门望族，他的祖辈中有埃尔代伊<sup>②</sup>的大公。他是个忠诚的保守派。他担任总理的十年完全可以被称为巩固制度的时期。辞职后他作为寓公，还是对匈牙利的每一重大政治决策

<sup>①</sup> 1920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附近的特里亚农签订的对匈和约。

<sup>②</sup> 埃尔代伊即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

都有过影响。他的亲英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忠诚的亲德派霍尔蒂在世界大战过程中逐渐脱离希特勒。他身材瘦小，蓄八字胡。虽然身为大公苗裔，却穿燕尾服。而在这一时代，企业经理和银行家们都穿戴着古代匈牙利礼服招摇过市；头戴插白鹰羽毛的帽子，身穿盘花的皮军服，佩长剑，登马靴。这是当时日益流行的“时装”。这个时代的错误可笑得令人痛心。但是，它也救不了贵族匈牙利的命。

国家在经济上的稳定意味着在1929年，即拜特伦的黄金时代，匈牙利的生产大体上达到了战前水平。但是，战前匈牙利的经济增长同当时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而战后欧洲工业的增长是匈牙利的两倍多，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落后程度加大了。

在经济上，拜特伦的安定时期意味着恢复战前的状况。从社会观点来看，拜特伦政府并不想改变，而是力图保持战前的状况。大地主和工业巨头统治着国家，他们依靠的是大批军官、官吏和市民阶层。同奥匈帝国时期一样，工人和农民没有被当作平等的人看待。

小猪馆、门房助手的孩子、小学徒、失业的辅助工，对于有钱人如何欺压穷人——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剥削穷人——深有体会。卡达尔学的是修理打字机，但没有干他的本行。他和其他学徒一样，在三年学徒期间里，打扫车间和搬运东西一年半，以后学习半年技术。第三年师傅就派他出去维修打字机。他不得不撒谎说自己是辅助工。让学徒去干一些辅助工作的活计，师傅当然可以多一些收入。

卡达尔没有干自己的本行，不仅是因为他满师的时候恰好碰上世界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失业。当学徒的最后一年，有一次他穿了一件破衬衫到车间上班。师傅生气了，因为这个样子不能把“辅助工先生”派到顾客那里去。

“你为什么穿破衬衫？”

当时在匈牙利，师傅理所当然地称呼徒弟为“你”。

“因为我没有别的衬衣。”

卡达尔没有说，但是我可以想象，当时他内心已十分激动。

“星期天上我家来，我给你一件衬衫。”

卡达尔告诉我，他虽然从来不挑衣拣食，但自幼就怕穿别人的内衣。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答复得非常无礼：

“您为什么不今天给我？”

师傅没有理睬他，只问他什么时候满师。卡达尔告诉了他。

“明天你就别来了，我不需要这样的人。”

打字机技工是个人数比较少的行业。据卡达尔回忆，首都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自然人们相互了如指掌。这场师徒交锋的结果是，卡达尔只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打字机修理工。

他多次同母亲谈起他们的遭遇。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十分清楚，穷人的命运是多么悲惨。但是她一再说：

“如今是坏人的世道，亚尼，但是我们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比我们强大。”

我相信，当时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心里都在这样想。他们知道自己贫困，也知道这是谁造成的，但他们不相信能够改变自己的状况。肆无忌惮的暴行和革命失败以后出现的消沉，不仅使工人运动瘫痪，而且使人民失却信心。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变化。在四年危机期间，匈牙利工业生产下降24%，产业工人减少30%，工业失业人数增加了两倍。农业的短工劳动减少了50%到60%，全国有五十多万全失业或半失业的农业无产者。首都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靠不定期发放的少量救济金、捐款、免费施舍的午饭度日。

1930年9月1日，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人示威游行。早在夏天，首先是由于群众性的失业现象，国内的情绪已经炽热化。8月11日，工会理事会号召布达佩斯工人在9月1日上午十一时放下工具，和失业工人一起去参加联合举行的群众大会。政府禁止了这次游行。工厂主全国联合会决定，9月

1日关闭所有工厂，使工人没有集合的场所。鉴于警察局的禁令，工会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取消召开大会的计划，但号召工人和失业工人举行“和平的散步”活动，以示抗议。十多人上了街，和平的散步很快成了流血的斗争。冲突中一个工人死亡，七十名示威者和几名警察受重伤，几百人被捕。

这一天也是卡达尔受到火的洗礼的日子。二十五年后他回忆说，

“因为我不能干本行，但是又需要生活下去，1930年夏天终于在克劳乌泽尔街的一个地毯批发商那里当货栈工。我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不大了解。一天早上，我正在干活，忽然人们匆匆忙忙地关闭了货栈大门，并且说今天不工作了，明天再来上班。我环视四周，看到附近的商店、车间也都很快关上了门。大街上行人稀少。有个年老的无产者走过门前，挥动着拳头高喊：‘资产阶级，你们等着，现在同你们算账！’他单独一个人，也没有碰任何人，但是我看到，他把克劳乌泽尔街的小市民们都吓住了。我听说，失业工人在纳吉麦泽街游行。我快步跑到那里，看到的景象象个劫后的战场。街上空无人影，我踩在橱窗的碎玻璃片上向前走去。安德拉西大街的情景相同。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向公园的方向走去。在大弯路上警察列队挡住了去路，不让人们向前走。基拉伊街也不准通行。在多布街的拐角处碰到了从城市公园返回的示威工人。我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在谈论城市公园及附近地区发生的冲突。人群中笼罩着一种庄严的感觉和愉快的紧张气氛，它也感染了我。在多布街，从一个门洞里驰出一辆装满苏打水瓶子的马车。走在我旁边的一个工人向车夫和押车员喊道：‘你们为什么工作？今天罢工！’但车夫竟用鞭子抽这个工人的脸。以下的事情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我没有思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只是突然发现，自己也卷入了这场流氓和游行者的混战之中。”

在角斗中，卡达尔被打得失去了知觉。不相识的伙伴们把他

抬到一条长椅上，他在那里苏醒过来。即使他参加9月1日游行，首先是出于好奇心，但是，这在他身上产生的作用，同那本偶然到手和没有被完全消化的《反杜林论》所产生的完全一样。两件偶然的事情都是为必然服务的；由于卡达尔的生活经历和性格，他早晚会同工人运动相结合。



## 地上，地下

拜特伦·伊斯特万及其政府在经济危机达到最高峰的1931年8月呈请辞职。1931年9月，齐尔毛奈克·亚诺什加入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

“1931年上半年，由于等待介绍工作，作为失业者，我在约瑟夫街的职业介绍所钢铁业部门消磨了不少时间。”1956年卡达尔曾经这样回忆起这个时期的情景：“当时人们把国家职业介绍所叫作‘清谈馆’并非偶然。那时我们中间如果有谁吃了早饭，口袋里还揣着二十非列<sup>①</sup>，可以用来买一块面包和五支莱文泰卷烟，那简直就算富翁了。在那里，我们一边咒骂工厂主，一边饿着肚皮闲聊，大部分时间确实是用来发牢骚的。”

“‘清谈馆’里也进行过激烈的政治争论。有些受社会民主党右翼影响的工人在宣传派耶尔<sup>②</sup>的观点，‘要耐心等待，不能采取轻率的行动惹事生非！’当时经常有许多觉悟不高、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到职业介绍所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大部分工人，包括我在内，都赞成共产党宣传员的正确主张。我们要求进行斗争，对那些鼓吹要耐心等待的人则嗤之以鼻。警察常来干涉，要大家保持肃静，每天都把他们哄走好几次。从前，我总觉得自己软弱，无所作为，只能同全家一块儿饿死、冻死，谁都不会理睬我们。但是，在那里，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我们工人成千上万，只要进行斗争，就能有工作，就能活下去。”

<sup>①</sup> 匈辅币，一百非列折合—福林。

<sup>②</sup> 派耶尔（1881—1956），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他反对与共产党合并，反对国有化。于1947年被开除出党，死于美国。

“我自己也放弃了儿童时代曾经有过的那些掩盖和忘却贫困的幻想；我再也不想成为足球运动员和象棋大师了，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一个靠自己的劳动得到正当工资的钢铁工人。我已经懂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斗争。”

一个工人的觉醒就是这样简单、平常和自然。马克思把这个过程普遍化为历史哲学。有必要引证一下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家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sup>①</sup>

卡达尔的回忆中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确切地说，这两点正是马克思提到的觉醒的基础。一是认识到自己并不孤立。在小作坊当学徒和在小工厂做工的卡达尔，在职业介绍所觉悟到这一点。在那里，他每天都碰到成百个同他一样的工友。二是认识到不经过斗争，他和他的家庭及工友都不能得到他一直本能地渴望着的象人一样的生活。这就是说，已经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当我问起卡达尔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时，他象以往每次需要作出准确答复时那样，考虑了许久。他说：

“我成为共产党人不是因为学习了理论，而是出于切身的利益。那时我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我已经学会并且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我的正当利益。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利益。我想到要对工友们负责，后来还感到要对所有工友负责，尽管听起来似乎我在说大话。”

“我也感到过恼怒、怨恨和懊丧。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谁劳动谁就应该得到权利。劳动出色的人更应如此。然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96页。

我的遭遇却告诉我，即使好好干活也是白费，他们发给我工资好象是恩赐；无论我工作好坏，从来无法知道哪一天又被赶上街头。这使我恼怒、愤慨，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工人靠劳动就能得到应得报酬的世界上。”

关于后来的事情，卡达尔叙述说：“1931年9月初的一天，我在鲍尔乔伊街上一边走一边想着事情，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向我打招呼，他是我在椴树街的体育俱乐部足球队结识的朋友费纳凯尔·亚诺什。我们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在交谈中彼此发现我们考虑着一些同样的问题，但它们都与足球毫无关系。我们都是失业青年工人。我向他诉说我家里的情况和在如何费尽心机谋求职业。我告诉他，我也曾参加过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并且已经懂得不斗争就不能生存。但是，我也对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朋友听完我的话后告诉我，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的成员。他说，我也应当参加这个组织。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一个共产党人站在我的面前，这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十分惊讶。那时我想象中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现在已记不清楚。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个从小和我一块踢球，同我一样年青的技术工人竟是共产党人！”

加入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给卡达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尽管他已记不清准确的日子，但仍然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五点钟左右，在保乌劳伊·埃代大街二十二号的一所住宅里，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一个命名为“斯维尔德洛夫”的支部正在开会。这个支部由三个青年工人组成，书记是一位姑娘。他们向卡达尔介绍了他从未听说过的斯维尔德洛夫的生平；告诉卡达尔他几乎一无所知的布尔什维克是些什么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还谈到了保密，谈到了秘密和公开的活动，并给卡达尔取了第一个做地下工作必不可少的化

名。以后大家都叫他鲍尔诺。<sup>①</sup>这可能是因为卡达尔的头发是浅栗色的缘故，但他对此已记不清了。可是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告诉他要作好随时被捕的准备时，他害怕的倒不是警察局，而是一旦果真发生这种情况，母亲将会同他大吵大闹。

没有多久，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11月9日他第一次遭到拘捕。从这次被捕算起，卡达尔一生中总共坐过七年监狱。在警察局，象当时通常发生的一样，卡达尔受到严刑拷打；他们对他软硬兼施，但得不到任何一点口供。三个月后，因为安不上什么罪名，只好释放。1932年2月，鲍尔诺·亚诺什已经成为区委委员，几个月后又当上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这意味着他已自动转为匈牙利共产党党员。

一个年仅二十的工人，很少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什么叫苏联，什么叫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也不熟悉日常的政治活动，半年之内竟然成了地下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的书记，这在今天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我并不太清楚这一职务的份量。”卡达尔说，“那时候想到的只是斗争，我所考虑的只是这一点。”

可能和必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面对在经济危机影响下日益活跃起来的工人运动，警察局对共产党人加紧镇压，基本上破坏了党的整个领导机构。因此需要有新人接替被捕者的岗位，不管他们有没有实践经验。

政治警察局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成功地安插了一个叛徒，他担任了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出卖了不少领导人。1932年又有一些进行秘密活动的党的书记处成员被捕并交即决法庭审判。宣布实行即决审判的理由是，那个显然为警察局效劳的毛图什考·西尔韦斯泰尔，在迄今也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炸毁了比奥托尔巴吉的高架桥，造成了一列国际快车坠入山谷，二十一人死

---

<sup>①</sup> “鲍尔诺”在匈牙利语中是棕色的意思。

亡，多人重伤。尽管欧洲政治和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莱昂·勃鲁姆、托马斯·曼、保罗·富尔、布莱希特、约翰内斯·尔·贝希尔、路德维希·雷恩、安娜·西格斯、恩斯特·托勒、卡特·珂勒惠支、卡尔·考茨基、巴比塞、罗曼·罗兰、阿拉贡、安德烈·纪德等都表示了抗议，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绍劳伊·伊姆雷和菲尔什特·山多尔仍被判处死刑。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32年因被指控为共产党而遭逮捕的有一百四十六人，还对另外一百五十二人进行了审查。1933年有三百多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这时，卡达尔也再次被捕，而他担心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母亲来探监的时候终于狠狠地训斥了他，她诉说，他被抓走的时候她刚好为全家烧好了甜丸子。

至于三十年代匈牙利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只能推测。在严格的地下工作情况下，当然不能编制党员名册，而且还要仔细地清除一切可能留下的痕迹。严格的保密规定决不会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感到高兴。

现在可以证实，当时同党的领导保持经常联系的党员约有五百人。这并不是说总共才这么多党员，更不能说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者就这么多。在一个严格保密的组织里，一个联系人的被捕、流放、开除、脱党或退党，往往会使一大批人暂时或永远同党组织中断联系。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匈牙利当时有一千至一千五百名地下党员，由于种种原因——如住在外地——无法同党建立联系的人比这还要多一、两倍。当时还存在各种派别，这是个特殊问题。在首都，有不少自称为共产党的小组，这些组织的负责人部分由于原则和政治上的原因，部分出于个人原因，从党内分离出去。分析它们极为复杂的作用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我认为，这些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是正直的社会主义者，只是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他们无法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共产党。然而，政治警察局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不只一次地容忍这些组织的活动，借以减少共产党的人数，这倒是确实的。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人数很不稳

定，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估计相互矛盾，以至迄今无法断定准确的数目。无论这些材料多么没有把握，却清楚地表明，一次次象1932年这么大规模的逮捕，几乎使党的整个领导班子的成员丧失殆尽。

在这样充满艰难险阻的运动中，当时由象卡达尔那样一些还缺乏经验、缺乏实践和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自然并不理想。但是，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本身的状况也不是令人欣慰的。

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无法恢复元气。近代史中的许多事例，从巴黎公社、西班牙到智利都表明，凡是革命被反革命镇压下去的地方，革命者在很长时间内失去了活动能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反革命消灭了革命组织及其领导人，而缺乏组织和领导，任何一个运动都没有战斗力。另一方面还因为，不仅专制恐怖，而且意识到失败也会使人民处于瘫痪状态。

匈牙利共产党最富有经验的领导人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被投入监狱，或惨遭杀害。社会民主党最优秀的领导人同样被迫流亡国外，领导权落入右派手中，他们则认为，同共产党人合作是极大的错误。

运动只是冰山的顶峰，人民是冰山。对于人民来说，苏维埃共和国想要给予他们的东西很多很多：自由、权利、幸福和人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他们从短暂的、进行了殊死搏斗而经济上又一贫如洗的苏维埃政权那里所能得到的东西却很少很少。尽管如此，劳动人民中最有觉悟的分子支持了革命党，但遭到反革命的屠杀、严刑拷打、监禁和拘捕。群众失望了，疲乏了；他们没有屈服，但是丧失了信心。卡达尔的母亲代表了他们的观点：“如今是坏人的世道，但是我们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比我们强大”。在二十和三十年代，工人、农民只要全家能吃饱肚子就心满意足了。1921年工会有十五万会员，1938年减少到十一万，1942年只剩下七万人。三十年代中期，每十个工人中有一个工会会员，到四

十年代初，二十个工人中才有一个会员。从1927至1937年的十年内，平均每年有1%的工人参加了罢工。

列宁称左倾为共产主义幼稚病。把理论当作宗教戒规的教条主义，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无数错误、偏向、痛苦的极端左倾，其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但共同根源是革命者的狂热性。当然，没有这一点，革命倒退的确不能发生和取得胜利。但是，如果盲目的信念代替了逻辑、理智和分析，就会导致最可怕的灾难。如果领导人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是他们的主观意愿，其政策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必然是畸形的。形势越是困难和没有希望，人们就越容易堕入空想的深渊。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仍然无法摆脱的空想是，不久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匈牙利和欧洲取得胜利。1923年，德国的最后一次工人武装暴动、保加利亚的人民起义和波兰的群众罢工都已被镇压下去，世界大战后的最后一次革命高潮在欧洲显然已经过去。这点，共产国际在理论上也是承认的，但理论上的认识并没有变为实践。当时，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大部分生活在维也纳和莫斯科，他们从根本上错误地判断了国内和欧洲的形势，仍然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目标，而这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种政策是有害的救世主义。革命只能在革命的形势中应运而生。

这也是产生拒绝同其他左派力量结盟这一极其错误看法的根源。尽管曾经在1925年做过一次“开放”性尝试，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左翼建立了取名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合法政党，不过，它没有存在多久。一方面是因为党的许多领导人被捕，警察局使党无法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流亡在外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幻想。

这种幻想有着人和心灵两方面的基础。1945年红军解放匈牙利时，许多当年苏维埃共和国的拥护者不能理解，为什么不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少地方自发组织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

致共产党和当局不得不出来干预。

这当然只是对共产党领导人二十和三十年代错误政策的一种解释，并不能因此推卸他们的责任。在国外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也沾染了派别斗争这一任何国外流亡生活者都避免不了的通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错误。温和派团结在德高望重的朗德列尔·耶诺<sup>①</sup>周围，他们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合作。激进派的领导人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认领袖库恩·贝拉，他们为自己规定的唯一任务是，由地下党准备在匈牙利实行第二次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同任何人结盟。除开中途出现过一些曲折和在纲领上多少有些修改外，直至三十年代中期，库恩的路线在匈牙利共产党政策中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这不仅是匈牙利党的战略，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党的名称：“匈牙利的共产党”就意味着党是共产国际在匈牙利的支队。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一样：“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是社会党国际在匈牙利的支队。那时工人运动在组织上还坚持马克思的原则，主张建立全世界工人的统一的政党。

共产国际于1919年从社会党国际分裂出来。虽然以后几年中曾经做过重新合并两个组织的尝试，但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两者的目标根本不同：共产党人要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则想通过改良来变革社会。不幸的兄弟斗争后来发展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仇恨，超过了对那些迫害他们的敌人的仇恨。这种情况在德国造成了最悲惨的结果，那里，两个工人党之间的斗争成为后来国社党得以上台的一个因素。

派别斗争也有它的自我规律。例如，派别利益、个人摩擦、不信任和偏见往往把真理降到次要地位。派别倾轧不仅影响了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几十年后还可以在党内感到它的影响，

---

<sup>①</sup> 朗德列尔·耶诺（1875—1928），匈牙利共产党党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商业和内务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



并造成了痛苦的人的悲剧。

“关于这些争论，当时我一无所知。”卡达尔说，“我所关心的只是斗争，没有怎么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

看得出来，卡达尔不想让别人事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比那些已故的党的领导人高明。但是，鉴于他的基本的现实主义特点，以及曾经在工人和农民中间生活过这一事实，很难想象他也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会在短时间内获得胜利。他曾多次说过，他并不期待自己能活到匈牙利工人掌权的那一天，但这不妨碍他为这一事业的胜利而斗争，即使他自己大概不会是这一胜利的受益者。

“不要把工人神化，”他说，“肯定我们彼此都知根知底。我在工厂里有过一个同事，是个熟练的制伞工人。下班后还把工作带到家里去做，全家都帮他的忙。但他经常酗酒，钱再多也不够花。后来他参加了箭十字党，趾高气扬起来。有一次我们偶然相遇，那时我已转入地下，但他没有告发我。1945年后，他到党中央来找我，那时我还担任市警察局副局长。‘你都干了些什么？’我问他。‘什么也没有干。’他回答说，‘如果我喝醉了就乱说一通，你知道我是经常喝醉的。’‘你暂时避一避风头吧！’我劝告他说，‘等大家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再到警察局去找我。’据我知道，他后来成了一个正直的劳动者。”

党按照最严格的保密规定进行活动，所以卡达尔并不了解党的上层领导中的斗争情况。每个党小组有三、四个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党员，原则上他们只能知道彼此的化名，但在实际上经常是难以做到的。区委会由四、五个委员组成，只有党小组的书记才能同区委的某个成员保持联系。各个区委同布达佩斯市委，市委同中央书记处之间也保持着这样的秘密联系。全国性的组织网实际上无法建立。流亡在外的党的国外委员会经常秘密派负责人回国指导工作，但这些被派遣的人员要经常更换，以防被捕。尽管这样，逮捕还常常难以避免。

地下斗争、秘密组织和保守机密是党的最严格的纪律，但它们往往没有被遵守，也无法被遵守。发展卡达尔参加青年工人联盟的经过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一个年轻人偶然遇到五年未曾相见的另一个年轻人，前者十四岁以后没有见过后者的面。简单交谈之后，后者告诉前者，他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并要他的童年伙伴也加入这个组织。另一个年轻人立即表示同意。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过程的真实性，因为我所知道的类似情况不止一个，虽然这同人们常说的秘密活动大相径庭。后来，卡达尔对各种地下斗争的有关规定执行得非常严格、坚决。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正是通过这样偶然的机会有加入到运动中来。而且我还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事出偶然的招兵买马”，党大概也无法存在。许多人往往不是在入党以前，而是在入党以后才证实他是否符合党员条件的。

事实上，谁违反地下斗争和秘密活动的规定，即使在这方面稍有疑点，谁就会被抛弃于运动之外。也就是说，不象对待那些在警察局屈打成招的人那样把他们开除出党，也不象对待那些在某一政治问题上与党的领导意见对立的人那样暂时停止其党籍，而只是简单地同他们断绝一切联系。那时，要开除一个人出党或中止他的党籍也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党员名单不能登记编册，也不发党证，最多只有几个人知道某人是党员。此外，要把开除党籍的决定通知其他党员，也有很大困难。尽管在国外印刷后秘密携带入境或在国内翻印的刊物上用真姓名公布了被开除出党的党员名单，用化名公布了被中止党籍的党员名单，但这些印刷品到不了每个党员手里。因此，有些打入组织的警察局密探，尽管已被揭露，并在党的刊物上公布了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还能继续在运动内活动相当一个时期。

也出现过相反的情况，而且次数要多得多：这些保密制度极为严格、人数很少的地下组织，由于警察局的经常追踪和想方设法在其内部安插密探，不由自主地成了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的温

床。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一个不恰当的意见，一件不准确的情报，对各种事实的错误综合、判断，都足以引起对某人的怀疑。根据地下斗争的严格规定，对某个人即使稍有怀疑，就要立即断绝同他的联系，否则将威胁一大批人的安全，无论这是多么严酷，但在地下斗争中不可能有起诉、调查、旁证和辩护，怀疑本身就是判决。谁也说不清有多少共产党员仅仅因为受到怀疑就被清除出党。一个毫无根据的怀疑，几年、几十年、甚至终生影响了一个正直的人，这类悲剧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了。地下斗争的残酷现实留下的创伤，几十年之后都难能愈合。

不仅政治上的怀疑会造成开除某个人出党的后果。有的人社会关系不好，或者名声大、爱出风头，或者没有遵守被视为有约束力的道德准则，或者在任何其他方面危及或可能危及党的安全，都可以成为开除出党的理由。例如尤若夫·奥蒂拉令人痛心受到排挤，这既有思想和艺术上的原因，也有个人方面的原因。尤若夫在不少问题上的见解不同于党的观点，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合一论，这是事实。他的同事和同志们都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现他诗人的才华，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病症，接受精神分析方法治疗，并力求向医生倾诉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不能成为地下组织的成员，这也是残酷的现实使然。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警惕自然成了革命运动的首要之求。但是，一个疑心过重、吹毛求疵或品质不好的人，不仅可以使很多人的命运受到折磨，而且也会给运动带来不少损失。卡达尔曾经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他担任书记处书记。一次，他通过被收买的狱警接到了在狱中的另一位中央书记捎来的信，告发一个同志是叛徒。这位同志是个很有名的共产党员，至今仍担任着领导职务。卡达尔通过狱警回问：为什么说他是叛徒。得到的回答是：这个人曾经说过，为了爱情他什么都能牺牲。既然为了一个女人什么都干得出来，那他也会把党出

卖。

今天，在安谧的和平时期，听到这种故事可以令人发笑或生悲。但当时，在监狱和绞刑架的阴影下，这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还是这位中央委员控告书记处的第三个成员是叛徒。其根据是，据说他经手的党的经费少了四百本戈<sup>①</sup>。这笔数目当时相当一个官员的月薪。当时对党的经费显然不能实行会计和出纳分开的双重管理办法。对此，卡达尔象往常一样冷静思考：很难设想，一个管理几万本戈的人竟会只贪污四百本戈，更不用说，政治警察局任何时候都会用一大笔钱来奖赏叛变者。但控告总是控告，于是决定将书记处的第三个成员从党内除名，允许他解放后澄清问题。这个决定通知了本人，他也表示同意。因为，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他也会这样决定的。解放后确实澄清了他的问题。

我们能因为这些诬告谴责这位中央书记吗？我们可以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这样做。特别是因为他在1949年以后的几年里并没有扮演什么光彩的角色。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是冒着生命危险从苏联回到匈牙利的，几乎蹲了十年监狱，但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供出来。有些人在一种情况下是英雄，另一种情况下是懦夫，甚至是罪人。

卡达尔违背自己的意愿把一个受人尊敬的、熟识的领导人推出党的大门，是否应当受到世人的指责？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应当这样做，正如卡达尔自己也对这件事感到内疚一样。但是，必须考虑到，处于地下斗争经常受到危险威胁的情况下，信念和对人的了解不足以成为否定怀疑的理由。谁能因自认为真理在握而拿几十人的生命，甚至整个革命运动去冒险呢？

卡达尔微笑着谈及这些往事，但笑容并没有舒展开他脸上的皱纹。

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党的领导人，卡达尔对他并

---

<sup>①</sup> 当时的匈牙利货币单位。

没有好感，而且认为他的活动是有害的。但当他1956年以后受到攻击的时候，卡达尔还是保护了他。卡达尔告诉大家，解放前，有一次密探押这个人去秘密接头点，半路上，他宁肯扑向驰来的电车，也不暴露同志。

对于这样的运动，只有你了解了它的全部情况，才能完全理解它。

我已经超越了事件发展的进程。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还要花费读者一点时间。我不相信，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个组织，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日常活动，也能理解它的本身。今天，当你听到地下党的领导人竟然通过狱警交谈党的核心机密，你也许会想，要么那时共产党已经拥有庞大和严密的组织，要么他们都已丧失了理智。

事实却要简单得多。在霍尔蒂时期，狱警的工资并不高，他们一般是从农民的孩子成为超期服役的士兵，后来当了狱警。尽管如此，要求当狱警的人仍然很多，因为工资虽然不高，但生活有保障，还有退休金，免费领取制服。总之，比生活没有保障和起早贪晚的农村农民要好得多。但工资低微的狱警是可以贿赂的，这不仅因为他需要钱，也因为他感情上并不同当官的站在一起。

共产党人没有庞大和组织严密的地下组织，但他们非常熟悉并认真地建立了地下斗争的一些渠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渠道是，他们能同被囚禁的领导人保持联系，因为几乎所有领导人先后都坐过牢。这种联系要经过认真的考验。他们从监狱寄出和寄进一些毫无内容的假信，这些信件一旦传递人向警察局告密立即就会被发现。只有经过反复考验后才传递真的信件。

即使这样也还存在被出卖的危险。秘密工作没有不冒风险的。

让我们再回到三十年代。卡达尔参加运动的时候，共产党人主张必须过禁欲主义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左派幼稚病”：为世界

革命事业服务的人不能有个人的私生活。卡达尔十分了解无产者，他知道，禁欲主义对工人来说就象给魔鬼烧香一样不起作用。命运给他带来了这么多的贫困，迫使他放弃了这么多应该享受的权利，难道连生活赐予他的仅有的一点点好处也要自动抛弃吗？

不管卡达尔认为党的纪律多么具有约束力，他无法否定自己的真实思想。

“我曾经苦恼，斗争，但都没有用。”他这样说，“我无法使事实屈从于任何理论。”

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指的是整个党。如果党只有等到工人不酗酒、不抽烟、不打牌、不骂街时才去争取他，对党、对工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他参加共产党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1932年春天，”他回忆这个时期时说，“我作为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北部地区委员会的委员，同一位共产主义青年女工谈话，她是丝绸厂地下支部的书记。当时，这个支部只有四个盟员，而且几个月来一直没有接受新盟员。我向她了解原因，那位女同志说，支部没有吸收新成员，是因为在那儿做工的姑娘对于她们自身的经济状况、政治等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关心。她们感兴趣的只是电影院、口红、漂亮的衣服和小伙子。她还用失望的语气提到，她们也不是最道德的（她用的词比这要厉害得多）。”

“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是无声地望着她，独自思考。最后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想法上。六个月以前她同她的伙伴一模一样，正如今天她在参加了六个月的地下斗争后从较高的思想境界来描述她们的那个样子。那时候，她感兴趣的也是电影院、漂亮衣服和小伙子，但也关心别的东西，否则就无法把她培养成共产党人。如果六个月前，那个对这位姑娘做工作的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盟员，看到表面现象就摇摇手说，不值得培养她，因为她只关心电影、漂亮衣服和小伙子，那就是对革命运动的犯罪。”

这里面已经包括了卡达尔后来执行的政策的实质，用布莱希特<sup>①</sup>的话说，人民是不能排斥的；应当同生长在那个国家里的人们一起生活、劳动和取得成就。但我们离这个时期还很遥远；在实行这一原则以前，等待着卡达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还有许多考验和曲折的道路。

首先是那些在三十、四十年代使匈牙利政策遭到失败的各种因素。不管治理这个国家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对政策起决定影响的有两个因素。其一是，不仅敌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还敌视一切进步的、左倾的思想。其二是重新划分领土的要求。谁不接受这两条基本原则，谁就不能在匈牙利发挥政治作用。

霍尔蒂时期的匈牙利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组织。最终一切都取决于摄政个人的决定，但是，国会里有时也会出现只能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看到的激烈争论。当时实行多党制，但经过多次改头换面的执政党的绝对权力，并不受到任何方面的威胁。这种事情发生在直到1938年才实行秘密投票选举制度的匈牙利并不奇怪。在此之前，以秘密投票不符合匈牙利民族的特性作理由，通过公开投票选举产生了二百四十五个国会代表中的一百九十九个。只有在同一地方连续居住六年和有小学六年文化程度的三十岁以上的公民才有选举权。在相互更迭的政府中占据席位的有几百年来显贵不绝的宦家子弟，有犹太银行家、军官、神父、外交官；起初还有个把“荣誉农民”，但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曾经有过相对的新闻自由，但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通常是在各种秘密、半秘密或合法的组织内决定的。诸如“埃泰克兹”协会<sup>②</sup>、匈牙利全国防御力量联合会、反对特里亚农联盟、觉醒的匈牙利人联合会、双十字血盟会和鸢盟会等。它们的名字表明了当时是什么时代和他们追求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匈牙利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那样的国家，在那里，象“军用地图社”那样的官

①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

② 据传说，埃泰克兹为匈牙利人定居前曾居住过的地方。

方机构，在政府、至少在总理的认可下，可以大量伪造外汇，用于“爱国目的”；后来，只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由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而主犯竟是警察总监。但是，政府并没有因为这种国际丑闻而倒台，而在国会疾呼“发生这种事情的政府不能再执政”的反对派代表，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痛遭军官团的毒打。

德国国社党人的上台也对匈牙利的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仅霍尔蒂，而且亲英国的拜特伦·伊斯特万也知道，只有依靠德国的帮助才能实现他们改变国界的计划。德国也不隐瞒自己的意图。“谁想在餐桌边占据一个席位，起码得帮助做饭。”希特勒对向他作礼节拜会的匈牙利总理曾经这样说过。匈牙利的政策成了它自己的俘虏。它把赌注完全押在修改确实不合理的特里亚农和约上。这样，不仅把国家引入灾难之中，而且使将来调整边界也不可能。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最好的例子，尽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悲惨的例子。

德国先并吞了奥地利，之后又肢解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也从中得到了好处。根据轴心国在维也纳作的决定，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连同一百万居民（其中主要是匈牙利人）回归祖国。根据1940年的第二个维也纳仲裁，四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埃尔代伊地区重新划归匈牙利，居民二百五十万，其中罗马尼亚人一百万。

在此以前，希特勒所宣称的援助只限在经济和政治方面。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时任匈牙利总理的是泰莱基·帕尔伯爵，此人很有时代的代表性，值得略作介绍。他出身于匈牙利历史最久的一个大官僚家族，是一位有才华的地理学家，拜特伦·伊斯特万的挚友，也是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的阴谋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担任外交部长时，他是签署特里亚农和约的代表团成员，他曾经强烈谴责过这个条约。1920年起担任总理。其时，匈牙利重新实行笞刑。后来由于支持了国王查理四世回国，他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他还参



与了伪造法郎，支持过社会调查，是全国童子军的总头头。作为总理，他主持通过了第二个犹太人法，并退出了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力图使英国相信，他同希特勒合作完全出于无奈。波兰被占领以后，他给十几万波兰人提供了人道的避难所。同时却参加了德意日三国协定。同南斯拉夫签订了永不侵犯条约。当希特勒进攻我们的南部邻国，且霍尔蒂和部长会议决定匈牙利参与军事行动时，虔诚的教徒泰莱基采取了不能为宗教信条宽恕的行动，开枪自杀。他写给摄政的诀别信是匈牙利历史文献中悲壮的一页：

“尊敬的阁下！

由于懦弱，我们违背了以莫哈赤讲话为基础的永恒条约。我们的民族感到，我们抛弃了她的荣誉。我们站到了坏人一边，因为所谓的暴行既不针对匈牙利人，甚至也不针对德国人，而是纯系捏造。我们乘人之危，是一个最丑恶的民族。我没有劝阻你，是有罪的。

泰莱基·帕尔”

匈牙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出于国内的原因。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后形成的社会领导阶层的利益，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观，都促进了匈牙利的参战。二十年来，他们向全民族灌输这样的思想：修改国界是国家借以解决一切的根本目标；后来又渲染收回每一寸土地都应该感谢德国人，并且自豪地宣称，在反对共产主义方面他们比希特勒还先进。所有这一切必然导致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匈牙利也参加了战争。

如果不这样做，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也许亲德派会推翻霍尔蒂的统治，尽管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较大的可能是德国迟早总将占领这个国家。如果这样，不仅在和平谈判中，而且在匈牙利历史上，很多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1945年

国家也会在另一种形势下，以另一种认识开始新的篇章。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摒弃了这种可能性。

国社党的上台也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消灭，党员被枪决、活活打死、监禁和关入集中营。这一震撼德国的悲惨事实结束了不幸的兄弟斗争。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反法西斯斗争是最主要的目标，号召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会员及一切民主力量联合起来。社会党国际执委会则早在1934年底就取消了对统一战线的禁令。

然而，实现人民阵线的政策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昨天还相互指责为阶级叛徒的人，今天很难马上承认对方是工人兄弟。此外，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政策、战略、策略、组织机构和原则上无疑仍存在着差别。在匈牙利，两党的区别还在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是合法的组织，它们竭力避免被取缔，而共产党只能继续进行地下活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政治家还不愿意同共产党对话，所以，同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几乎还不可能。

共产国际于1936年解散了匈牙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局势并没有因此缓和下来。共产国际正确地指出，尽管领导机构原则上承认了人民阵线政策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上没有什么变化。库恩·贝拉被非法逮捕，死在监狱，直至1956年才恢复名誉。

中央委员会被解散以后，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根据从维也纳得到的不确实的或理解错误的情报，解散了国内各地的党组织，使整个运动处于混乱之中。共产国际委派的党的临时领导人从布拉格指导开始重建共产党的工作，其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加入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合法组织中去。

获释出狱的卡达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了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第六区组织。他担任过十人小组组长，青年小组的联系人，地段支部书记和区执委员会委员。1941年夏又担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地区委员会负责人。

“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卡达尔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象我一样的无产者。即使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但我们的生活相同，我们合得来。”

卡达尔在社会民主党内度过了五年时间，不仅学会了做党和工会的合法工作，而且还同一个他过去不熟悉的阶层建立了紧密联系。社会民主党的医生和艺术家小组当时编在第六区，有一段时期，卡达尔曾担任过这些小组的联系人。在这以后，在农村出生、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长大的卡达尔可以说，他了解每一个劳动阶层的底细，尽管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这样讲。

卡达尔工作过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一个地毯批发商的铺子和一家草药厂。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说，“童年时候野外到处可见的野菊花竟是一种值钱的商品。”

“要问我干什么活吗？现在可以把它体面地叫做搬运工。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卖苦力。”

我不相信干这种活伤害了卡达尔的自尊心。这首先是因为，那时他主要已在搞工人运动。但是也因为，他热爱劳动，不管做什么工作，要他不好好干是做不到的。这是他的个性。

“不管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是好好工作的。”

韦莱什·彼得<sup>①</sup>在描写雇农和铁路工人时曾经写道：仅仅出于要强，他们也要好好劳动，否则就会感到羞耻。对此，卡达尔有他自己的回忆：

“我曾经在一个小工厂里当辅助工人。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厂里有多少订货。有一次，我们发觉厂里只有两个月的订货，做完了，老板就会把我们解雇。于是我们决定，两个月的工作干四个月。大家都这样做了。在那以前和以后我都做过工，但从来没

<sup>①</sup> 韦莱什·彼得（1897—1970），匈作家。解放初期曾任政府部长。

有象那次那样受到劳动的折磨。我不得不一边干活，一边磨洋工。大家都痛苦，因为对于人来说，不认真劳动就应该感到内疚。”

他还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只有工作得好，才能得到相对的自由。这对他是很重要的。

“进厂的时候，我总是对老板说，您只需要告诉我该干什么，其它不用操心，一切事都由我来做。您准会满意我的工作。”卡达尔这样说。别人对他指手划脚，他很难接受，比接受最困难的工作还难得多。

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总是专心一致和用心学习。注意怎样安排劳动，销售产品，按照什么条件雇用和辞退工人，怎样进行生产，如何增产等等。

他说：“大概我是个有幸者，在很多地方工作过，这样我学到的东西也多。”

但他最关心的还是人，各种各样的人。直到今天，他对人的好奇心仍然是无止境的。

“大概是在六十年代，有一次，一位同志要求随我去参观工厂。他说想见到一些有意思的人。我有点纳闷。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过没有意思的人。人人都是有意思的。”

这种近乎幼稚的话是多么坦率。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对人有多么感兴趣。在我生平第一次单独同他谈话时，整整一个钟头里他只是不停地提出各种问题：谁是我的父母、孩子，我是怎么长大的，怎样工作，每天怎么度过，有什么爱好和愿望。看来，世界上他最关心的是人。

一个百把人的雨伞工厂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从监狱释放出来后，经朋友介绍，他到这个厂去工作。那时囚犯都要剃光头，他无法否认自己从那儿来。他把坐牢的原因告诉了厂主，但厂主还是雇用了他。

“从这以后，我是厂里‘合法的共产党’。这好极了。我再也

用不着装假和撒谎了。”

以后，他还提到和称赞过这个企业。工厂主自己购买丝绸和钢丝，自己出口雨伞，出售给国内的批发商。

对比一下各人的不同命运是很有意思的，它能向我们讲解很多历史：犹太人的工厂主死在集中营里；他的妻子曾在美国学习经济学，并在工厂里实行了平均工资和奖金制度，1945年以后定居在英国。而卡达尔则从一个搬运工、送货员、零杂工和信差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工厂主不仅在决定雇用他的时候对他蛮不错。一天，卡达尔接到传票，必须次日到警察局报到。传票上没有注明原因。不知道是为了某个案子传讯他，还是要他去服完暂缓执行的五个月徒刑。不管怎样，他给老板留了信，请求把劳动证和工资交给他的母亲，如果他重新入狱的话。厂主不仅满足了他的请求，而且在半年后卡达尔获释时——因为确实是为了召他去服完缓期执行的徒刑——给他捎去口信，如果答应不进行共产党活动，就重新录用他。

“我答应了这个要求，别无其他办法。”卡达尔说。

他微微一笑：“但是我没有答应不从事工会活动。我们还通过斗争，挣得了两星期休假的待遇，工资照发。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他在塞格德臭名昭著的星星监狱里服刑。押解去监狱的途中，火车上，他被同另一个囚犯铐在一起。车厢里还有其他乘客，两个狱警看守着他们。火车上，卡达尔也注意观察各种人，态度是那样从容自然，以至旅客刚进包房不能立即发现他是囚犯，后来才发现他腕上的手铐。

卡达尔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发现我们是犯人后，有的人马上退了出去，有的人努力装出没有看到的样子，也有人向我们递烟，但他并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

在塞格德，他们被戴上手铐押解着穿过整个城市。那天是奉

献节，天气很好，街上挤满了人。

“我当时非常生气。大街上人们只是微笑，闲谈，而我们正是为了他们才遭受磨难。”

今天，卡达尔为那时的激动感到可笑。

“根据这种逻辑，当时我可以责备整个国家。”卡达尔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总是有偏见的。”

在星星监狱里，看守们是很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囚犯的。新来的囚犯在牢房的走道上被脱光衣服，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然后打开铁栅，进了第二个过道，这里囚犯领了囚衣、饭盒、毯子。政治犯关在最里边的铁栏杆后面，白天可以自由活动。中午，当其他犯人都关进牢房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出来放风。

卡达尔非常期望会见他的难友，特别是因为他知道拉科西·马加什<sup>①</sup>也在星星监狱里坐牢。拉科西曾经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委员，是国际著名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他受党的派遣从苏联回到匈牙利，1925年遭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服刑十六年后被驱逐到苏联，在那里他成了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领导人。

拉科西和卡达尔的首次会见差一点搞错。当卡达尔走近共产党囚犯们时，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他们中间。

“我想，他就是拉科西。我刚要向他打招呼，一个身材矮小的白脸人向我走来，并自我介绍说，他是拉科西。”

卡达尔回忆说，拉科西在监狱里也是共产党员的领导人，由于他同监狱管理处斗争的结果，政治犯的待遇有许多改善。他还举行了一次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会。卡达尔很感兴趣，因为对这个时期的情况他知道得很少。那时，在匈牙利，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书都是污蔑共产主义的，而亲身参加领导苏维埃政权的

---

<sup>①</sup> 拉科西·马加什 (1892—1971)，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苏维埃政府副商业人民委员。1945—1956年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952—1963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1971年在苏联病故。

人，他现在才第一次见到。

在制伞厂里卡达尔认识了尤若夫·奥蒂拉的同居伴侣珊多·尤迪特，后来，通过珊多又认识了诗人本人。卡达尔的记忆力又一次使我万分惊讶。现在他还记得，1931年9月末的一天，他在有色金属工人联合会卡津茨街总部第一次听尤若夫·奥蒂拉的报告，他当时正在给工人学员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演讲。诗人当时二十六岁，卡达尔才十九岁。后来他在工人文化协会多次听到过朗读尤若夫的诗，十分喜欢。今天，他仍然把欣赏尤若夫的诗当作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尤若夫，1971年卡达尔曾经写道：“他对阶级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感兴趣，特别注意研究当时工人阶级的文化问题。他一直为消除工人运动宗派主义的自我孤立而斗争，总的来说斗争是合理的，但有时候不够耐心。斗争也伴随着争论。对他的种种非议使他忧伤不安，他期待于非议者的本来是支持。他捍卫了不是臆测的，而是坚信不疑的真理。”

珊多·尤迪特是制伞女工，又是朗诵家、共产党员。我们对此不用感到惊奇。当时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很多今天被我们称为奇才的人物。她丈夫流亡国外，与他们的小女儿同住在莫斯科，后来又娶了库恩·贝拉的女儿为妻。

“尤迪特很会做宣传工作。”卡达尔说，“她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在午饭时给女工们朗读她女儿的来信。女儿在信中说，她正在学钢琴，准备夏天去克里米亚度假。”

对此用不着多做解释。工人们都知道，珊多·尤迪特的同居伴侣，同她生活在苏联的丈夫一样是个作家，但他没有任何收入，还得要女伴来养活他，而她的工资也只够他们勉强吃饱肚子。至于付房租和买煤取暖，有时有钱，有时没钱。

卡达尔认识珊多·尤迪特的时候，尤若夫的精神病越来越厉害。尤迪特总担心他会自杀。有一天她显得特别紧张，要求卡达尔到她家去看看尤若夫。她自己不能离开工厂，卡达尔是信差，

走得开。

女工们经常请卡达尔帮忙办点小事，只要能做到的他总是尽力满足要求。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曾经有机会看到过他对别人的关心，直到现在这仍是他的一个基本特点。

但珊多·尤迪特的要求并不寻常。卡达尔按门铃多时，没有人来开门，于是他用尤迪特给他的钥匙开门进去。尤若夫躺在床上。时值中午——中午睡觉对于卡达尔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睡得很沉，但也可能只是看上去象酣睡着的样子。卡达尔很惊慌，用手摇醒尤若夫。

“他是一个瘦弱纤细的人。”卡达尔说，“当我摇他的时候，真担心他会散了架子。”

诗人半天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现在是他惊慌起来了，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站在他床前，而且把自己叫醒？卡达尔费了很多口舌才把这一奇异的处境解释清楚。他们开始交谈起来。卡达尔告诉尤若夫曾经听过他的演讲，喜欢他的诗。这样，尤若夫的疑虑才慢慢消失。

对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来说，最缺少的就是人们对他的爱，爱他和他的诗。如果能得到这种爱，大概不会由一列货车去结束他的生命。

此后，卡达尔还见过一次尤若夫。也是应珊多·尤迪特的请求，尽管那时尤若夫已经不同她生活在一起了。那时，诗人住在他兄弟的公寓里，编辑一份发行时间很短的杂志——据卡达尔回忆，它只出版了几期——，它发表的理论文章卡达尔认为观点是混乱的。

卡达尔说：“我们进行了辩论。当然，这种辩论只能是有限度的。他坚信自己正确，以致不容许有任何反对的意见。那时我第一次听到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感到无法理解。对于我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现在我才明白尤若夫当时的思想。他的想法同列宁强调的民族特殊性在社会主义中的意义没有多少区别。



最多他强调的重点不对。但是，他毕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卡达尔在回忆珊多·尤迪特的时候说，“她默默地忍受一切，但象一个惊叹号。尤其象尤若夫这样敏感的人不会不发现这一点。她在革命运动中也是这样：严格，坚韧，俭朴。这样的共产党员我认识的远不只一个。”

卡达尔继续说道：“使尤若夫感到苦恼的不仅是他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而且还要珊多·尤迪特以艰辛的劳动，以自我克制和牺牲来维持他的生活。这种让别人为自己做出牺牲的事情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

我不想探索尤若夫·奥蒂拉悲剧的秘密，我写的是卡达尔。但是，不论什么人，通过了解他同才华出众的人的关系，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他本人。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匈牙利工人运动高涨起来了。从1936年起，罢工增多了，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了，其速度是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从未有过的；社会民主党很多基层组织的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西班牙内战时期，一千多名匈牙利志愿人员战斗在共和国一边，有几百人牺牲在前线。共产党周密地组织了经过布拉格到马德里的秘密通道。

虽然卡达尔是一个自觉的国际主义者，但他还是决定留在国内战斗。

匈牙利参加世界大战，不仅增加了右派的势力，而且也加强了左派的力量。越来越多的阶层和组织寻求建立反法西斯合作的可能性。1941年秋天发生了两次重大的示威游行：一次发生在纪念1849年被处死的匈牙利第一位独立政府总理的长明灯前，另一次发生在1848年自由斗争领导人的陵墓前<sup>①</sup>。在《人民之声报》著名的圣诞节特刊上，全国最主要的在野派人士都表示要反对法

<sup>①</sup> 1848—1849年匈牙利人民在科苏特·拉约什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于1849年4月宣布独立。但不久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军队镇压，匈重新回到奥地利统治下，1867年成立奥匈帝国。

西斯，反对战争和德国的控制。发表声明的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外，还有代表农民的民粹派作家，甚至前种族主义领袖、霍尔蒂的朋友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他后来成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另外还有当时最重要的保守派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塞克菲·久洛，他是拜特伦·伊斯特万的朋友，1945年以后任匈牙利第一任驻苏联大使。

根据共产党人的倡议，1942年2月成立了团结各反法西斯力量的第一个合法组织——匈牙利历史纪念委员会。3月15日是1848年自由斗争的纪念日。这天，在裴多菲纪念碑前举行了示威。各派进步力量都在匈牙利历史中寻找支持，因为1848年和裴多菲是每一个匈牙利人都赞同的。

以往的示威游行只有数百人参加，但数以万计的人以信任和期望支持和声援他们的行动。这在一个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里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示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要求停止战争。然而，仅仅这些人还不能影响一个拥有完备的镇压机器的国家的政策。这次原来预计有几万人参加3月15日的示威活动，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迫于内务部的严厉警告，在最后一刻决定禁止其党员参加游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是关系到党的存亡问题。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是社会民主党，而且也是匈牙利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

最后还是有好几千人参加了在裴多菲纪念碑前举行的示威活动，有共产党人，不顾禁令的社会民主党人，小农党党员，反对德国的市民，进步知识分子和左派青年。按照事先计划，这是第一次静默的示威，但是很快就有人站出来讲演、朗诵，要求单独媾和，建立工农联盟和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最后，警察驱散了群众。

国家机构进行了严厉的反击。逮捕了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萨卡西奇·阿尔巴德，四百多名左翼社会民主党干部被遣送到前线去服劳役，等待他们的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死亡。1942年4月，所有

国家保安力量、政治警察局、宪兵侦探、军事特务队都行动起来消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六个成员中有三人被捕，其中两人被折磨致死，一人被枪决。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被判刑坐牢，有的被拘留，有的被送去服劳役，后来很少有生还的。

1942年5月卡达尔接到转入地下的指示。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地下组织的进行公开活动的成员。那时他的生活同别人相比，除去从事地下工作外没有什么别的区别；他有经过申报的住房、工作单位和家庭。现在，他成了地下运动的秘密成员，一个月以后又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不久担任了中央书记。卡达尔接替了被判处死刑的科尔文·奥托、被用假营养办法杀害的勒维·山多尔、被处死的绍劳伊·伊姆雷和菲尔什特·山多尔、被折磨致死的罗饶·费伦茨和赖齐·卡罗伊以及被绞死的申海尔兹·佐尔坦。

霍尔蒂在残酷镇压左派的同时撤掉了亲德派总理的职务，任命拜特伦·伊斯特万伯爵的同伙卡劳伊·米克洛什担任总理。匈牙利开始了被称为秋千政策的时期。

很多人认为卡劳伊是一位杰出的策略家，他在两年时间内成功地蒙蔽了日益富有侵略性的德意志帝国。但我并不这样看待他的作用。无疑他认识到了匈牙利应当摆脱同德国的联盟，但是，除了拖延时间以外，任何目的都没有达到。

霍尔蒂和卡劳伊对于以后事态会怎样发展是有预计的，这就加重了他们的责任。早在1942年秋天，匈牙利军队的总参谋长在向将军团所做的报告中就怀疑德国人能否赢得战争。1943年1月，苏联军队在顿河畔粉碎了装备低劣、给养不好的匈牙利第二集团军。2月，德国第六集团军被消灭在斯大林格勒附近。5月，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非洲投降。7月，盟国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垮台。10月，意大利向德国宣战。

在此期间，卡劳伊多次向英美试探过退出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他提出了似乎匈牙利是战胜国的条件。得到的回答是，匈牙利

应该向事实上同它交战的苏联提出停战要求，但霍尔蒂一伙不愿意这样做。

希特勒对其盟国的不唯命是从终于恼怒了。1944年3月希特勒召见了霍尔蒂，通知他德军将占领匈牙利。澄清这次会晤中发生的事情不是本书的任务，每个出席会晤的人对会晤的经过都做了不同的介绍。需要提到的事实是，霍尔蒂没有宣布引退，也没有号召全国和全军抵抗。

德国人不仅向匈牙利开来了八、九个师的兵力，而且带来了经过事先周密调查后开列的黑名单。几天之内，盖世太保就在匈牙利政治警察局的协助下逮捕了三千多人。逮捕了所有德国人认为不可靠的领导人：社会民主党人，小农党党员，资产阶级自由分子，保皇党分子，犹太大资本家。霍尔蒂的前内务部长和亲信也进了监狱。拜特伦·伊斯特万转入地下。卡劳伊总理一时在土耳其使馆避难，后来被捕。共产党人没有遭受逮捕是因为那时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已转入地下。

摄政任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德将军和外交官担任总理，取代卡劳伊，同时发表了一项公报，宣称德国军队是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进驻匈牙利的。

德国占领匈牙利以后，取缔了反对党和工会，并加紧向德国运输匈牙利的工业品和农产品，把匈牙利第一集团军重新派往前线，把十万名德裔匈牙利公民编入党卫军，同时开始放逐犹太人。根据《犹太人法》，匈牙利大约有八十万人被算作犹太人。其中一半惨遭杀戮，大部分死在集中营里。

德军占领的结果是，盟军开始经常空袭匈牙利。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登陆。7月，德国的军官和政治家试图暗杀希特勒。

8月，在苏联红军突破德国—罗马尼亚防线之后，罗马尼亚提出停战要求，后来又向德国宣战，两个星期以后，保加利亚也退出了战争。

霍尔蒂决定采取行动，而且是以真正的霍尔蒂方式。他任命

了一个没有声望、但忠于自己的上将代替无足轻重的亲德上将继任总理。经过长期的犹豫动摇以后，决定秘密向苏联派出停战谈判代表团，此事既不通知政府，也不告诉总理。

长期的犹豫不决为德国人准备推翻政权提供了时间。箭十字党党魁萨洛希·费伦茨当时已在德国大使馆。9月，墨索里尼的解救者斯科策尼到了布达佩斯，其任务是占领王宫和逮捕霍尔蒂。10月初，华沙犹太区暴动的镇压者党卫军将军泽莱夫斯基被调到匈牙利。德国人先逮捕了关键的布达佩斯城防军司令，随后又劫走了摄政的儿子。

1944年10月15日。这一天，匈牙利摄政维戴什—霍尔蒂·米克洛什在广播讲话中向全国宣布，已经缔结了停火协议。德国人和箭十字党在几小时内就阻止了这种以令人吃惊的无知方式组织和进行的退出战争的行动。中午，电台广播了霍尔蒂的声明；晚上宣读了萨洛希·费伦茨的讲话，声称他已经接管政权。

对这不幸日子的细节说法各种各样，但任何一种解释都改变不了事实。很少有人象霍尔蒂这样，在统治一个国家二十五年后，如此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不仅未能挽救他的国家和制度，而且也未能救助他最好的朋友和最忠实的追随者。

一个比他更没有才能的人，箭十字党的党魁萨洛希·费伦茨成了匈牙利新的领导人；他一人身兼拥有摄政权力的国家首脑、总理、最高军事长官，即军队总司令等头衔，他网罗了各种极右党派的领导人组成政府。

箭十字党党徒们肆意进行破坏和屠杀。在这几个月中，匈牙利群魔乱舞，如醉似疯；正如早先的一首流行歌曲唱道：“世界只有一天”。箭十字党的暴徒们——确实无法用别的字眼来称呼他们——到处绑架，残杀。他们竟然把小孩子也武装起来，派他们用步枪去对付苏联的坦克。布达佩斯十五万犹太人中有五万人被他们驱赶徒步前往德国，不少人，尤其是儿童和妇女惨死在途中。七万名首都的犹太人被圈禁在从前住七千人的犹太区。有十

万士兵和五十万老百姓被遣送到德国，当然其中一部分是自愿离去的。有的人有理由害怕将来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但大部分人都相信了宣传机构几十年来向他们灌输的东西：俄国人甚至会破腹取胎。据箭十字党政府各部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从匈牙利运到德国的商品有五十五万吨。

1945年4月4日，终于从匈牙利的最后一块土地上驱逐了纳粹部队。匈牙利解放了。

现在我们回来继续介绍卡达尔：1942年，杰出的雕塑家戈尔德曼·久尔吉去制伞厂找卡达尔，通知他立即转入地下，因为逮捕的范围越来越广，任何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都不会幸免。

但是，转入地下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不能回家去，卡达尔没有钱，也没有替换的衣裳和住处。他找到了工厂的女工资管理员，要求支给他应得的工资并请假两个星期。那个女人什么也没有问，也给了他钱，尽管她几乎完全清楚，卡达尔为什么要突然离去。

找个住处安身是最大的问题。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做好给处于危险中的党员提供秘密住房的准备。到1944年3月德国人占领匈牙利的时候，共产党才成功地建立了他们的地下活动网，并不只一次地帮助了到处躲藏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向他们提供住房、金钱和假证件。善于绘画的卡达尔成了图章专家。他是从沙格瓦里·安德烈那里学来的这种手艺。图章是一块圆木片，用很细的画笔描上字母。起初，他用这个办法给自己造假证件，后来也为别人帮忙。建立这个地下活动网花了很长时间。

党有一个外围圈，他们是一些从前的党员，被捕释放后没有再参加革命运动。可以向这些人要点钱，但要不着住房，他们怕担风险。还有左派知识分子、同情共产党的工人、坐过牢的流浪者，大部分是犹太商人；他们帮助共产党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为了将来得到好处。

卡达尔三天两头更换住处，或者运气帮他的忙，或者全凭偶然。一次，他在街上碰到了制伞厂的一位同事，他们关系不错。

这个人当然知道卡达尔是共产党，而且正在躲避追捕。

“需要钱吗？”他问卡达尔。

卡达尔需要的不是钱，而是住房。这位熟人答应帮忙，他兄弟的房客不久前当兵去了。

“但是，如果我被抓住，你兄弟也要受牵连。”卡达尔提醒他。

“那才好呢！”他朋友的眼睛明亮起来。看来两兄弟的关系并不怎么好。

晚上，他们来到费伦茨瓦洛什区的一所有两个院子的出租住房，卡达尔这位熟人的兄弟就住在那儿。

“那时我已经养成了在进门之前仔细察看一番的习惯。”卡达尔说。

他发现后院楼下有两个男子挨门走进走出。从远处就能看出，他们是密探。

“真行！我还没搬进去就找来了。”

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在搜捕一个小偷。这里也不能久住下去。卡达尔熟人的兄弟有个亲戚是宪兵。这倒没什么关系，因为卡达尔的证件伪造得很好。但是，这个宪兵有个习惯，如果他夜里回到布达佩斯，就一边脚踢房门，一边高喊：“开门，开门！我是警察局！”可以想象，卡达尔还是走开为好。

卡达尔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安排他的母亲。母亲每天要去出版社领取报纸分发给订户。卡达尔回不了家，只能在出版社门口偷偷地等候她。

“妈妈，我走了。”

“上哪儿去？”

“反正我走了。”

这时母亲已经猜到了八、九分。

“那我们怎么办？”

“如果他们把我抓起来，你们更不好办。”

此后，在全国解放以前，他还见过一次母亲。在街上偶然看到了她。她步履艰难，走路跌跌撞撞，背了一大捆报纸。卡达尔不敢走过去。他得到过指示：不能会见任何熟人。地下工作比军队的纪律还要严格。

“她好象比以前更矮小了。”卡达尔说。

后来，他可以在经济上照顾母亲了，比他干活的时候还好得多。

“我从来没有象搞地下工作时那么富有。给我的钱都没有花掉。”

党有很多钱，就是所谓“滚动的卢布”。但是，这些钱不象所宣传的那样从莫斯科得来，也不可能从那里得来。因为战争爆发以来同共产国际和党的国外委员会完全中断了联系。这些钱的来源是一些富裕的资产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捐助。他们有的同情革命运动，有的同情运动的这个或那个成员；也有人公开声明，他希望能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得到“报答”。很多人已经感到，匈牙利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时候，特别是那些钱囊鼓鼓的人，是一点也不会吝啬的。

卡达尔说，在地下斗争时，最糟糕的是白天得出去“干活”，以免房东看出破绽。也就是说，白天得有十小时的闲逛，压马路，乘电车或者钻到电影院、小酒馆，时刻提防有人跟踪，或落入搜查圈套。化装也是秘密活动的一部分。卡达尔平时穿长裤，戴便帽，转入地下后则穿全套西服，系领带，提公文包，拿雨伞，而且还蓄起胡子。据他妻子说，那样子好象脸上长了一把难看的红毛刷子。

1942年，警察局确实已经破坏了整个共产党组织。据卡达尔回忆，到那时，平时和他们有联系的四百——四百五十名党员中，继续同地下领导保持联系的只有几十人。于是三人书记处立即着手联络那些逃避了逮捕的党员，调查党组织被破坏的原因，营救被捕的同志。到1943年1月，已经同七、八十名党员接上了



头，同时获得了不少地下工作的经验。虽然党员人数很少，但它表明，不管警察局如何破坏，党能够一次次地重新组织起来。

他们分析了党组织被破坏的原因，认为党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能力抵御象3月15日示威游行以后那样规模的清查。当时，他们中间并没有特务、告密者或叛徒。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以后只有完全转入地下斗争，才能避免被捕。但这也意味着基本上停止了同其他左派组织的联系，宣传工作也大大减少了。

然而，警察局在1943年初再次对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这年5月，卡达尔会见了萨卡西奇·阿尔巴德。萨卡西奇建议共产党放弃一切形式的秘密活动，只用合法手段同法西斯斗争。这是卡劳伊时期的黄金时代，社会民主党人奢望政府能退出战争。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霍尔蒂每次试探停战都伴随着疯狂的反共活动。即使在这种时候，摄政考虑的也是未来的一个没有共产党席位的匈牙利。

卡达尔没有接受萨卡西奇的建议，并想说服这位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要他们也加入地下斗争，但萨卡西奇也不接受劝告，他害怕党和工会被取缔。此后，两党几乎中断了一年联系，直至德国占领。那时，社会民主党也已转入地下，并接受了共产党的立场。

“一个人光想幸免一死，那无异于自我毁灭。”已经进行了两年秘密活动的卡达尔对刚躲藏了几天的萨卡西奇说。

再回溯到1943年。这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了使各国共产党便于同它们国内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解散了共产国际。但匈牙利党同一年前一样，仍然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当时领导着全党的卡达尔回忆说，他只同八个党员保持着经常联系。他们决定，解散匈牙利的共产党。表面看来，做出这一决定也有形式上的考虑：匈牙利的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支队，而共产国际本身业已解散。但实质上的考虑是，党可以在其工作完全瘫痪的情况下，略为逃避一下警察的追捕。

卡达尔在1956年写道：“我们这些在1943年作出解散匈牙利的共产党决定的人，当时把和平党看作一个更换了名称的共产党，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

和平党的名称并不是卡达尔提出的。他建议改名为工农党，但被其他领导人否决了。

更名的做法对不对？为此曾争论不休。流亡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科苏特电台里继续使用共产党的名称。国内的人以为他们只是消息不灵。直到解放后才弄清楚，原来拉科西·马加什领导的国外委员会，或者叫莫斯科委员会——它既没有正式名称，也没有特定的职责——是要用这种做法让国内的人知道，他们反对更名。

我认为，改名并无多大意义，也没有能瞒骗过警察局。然而，和平党在号召建立和平委员会方面取得了成就，在共产党以前没有起到影响的农村尤其如此。更名在党员中引起了混乱，这也是事实，但党却成功地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和个人建立了联系。当然，这与其说归功于更名，毋宁说是由于德国的占领。1944年秋起，党的名称改为匈牙利共产党。

1944年4月，红军接近匈牙利边境。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必须立即和那些流亡在国外的共产党人接上关系，协调计划。他们原先想派沙格瓦里·安德烈越过封锁线去接头，但最后还是卡达尔去了。

“我担心沙格瓦里会出事，所以没有让他去。”卡达尔说，“谁知道结果正好相反。许多时候好心办不了好事。”

他的表情痛苦。他心灵中不知留下了多少这样的伤痕。

1944年6月，沙格瓦里在同警察的一场交火中牺牲。

卡达尔取道南斯拉夫，想在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协助下找到苏军，但在边境被逮捕了。幸亏他有假证件，并始终一口咬定，他叫卢普塔克·亚诺什，因为厌战当了逃兵。他说，在审讯时，他一再使劲地并拢足跟，蔽得军靴啪啪作响，使军法官感动不已，认

定他是一个强悍的军人。

卡达尔不但担心被判死刑，而且也担心被免刑释放，因为如果这样，释放前要被弄到临时拘留所，而他曾在那里呆过不少时间，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最后他被判处两年徒刑，并解到宗蒂街军牢。他绞尽脑汁，设法让党知道他的情况。最后，他给一位认识他笔迹的人写了一封信。因为收信人不明白卡达尔为什么要署名卢普塔克，把信给他姐姐看，姐姐则和党的领导保持着联系。

计划成功了。党的领导立即聘请了一位律师，答应如能设法营救“卢普塔克”，将酬谢他两千本戈。一位妇女在大门口把钱交给律师，她就是卡达尔现在的妻子。她不得不装出筹措这笔款子是多么不容易的样子。

卡达尔说，那个律师是只再狡猾不过的老狐狸。他一再叫卡达尔放心，说一切事情都由他操办。

“他越叫我放心，我就越不放心。”卡达尔说。

他知道，自己任何时候都可能暴露。而暴露身份对这位共产党书记来说显然就意味着死亡。

后来才知道，当时，差一丁点儿他就可能被暴露。霍尔蒂在退出战争之前想同反对党领导人会谈，他们在共产党人中寻找齐尔毛奈克·亚诺什，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领袖。齐尔毛奈克就是卡达尔——当时这是他的化名——，卡达尔就是关在军牢里的卢普塔克。这点，共产党领导人中也只有一个人知道，但他决定不暴露卢普塔克的身份。总算幸运，因为不久箭十字党就上了台。

这样，卢普塔克还是卢普塔克。那位律师倒是想方设法帮助卡达尔恢复自由，但这时箭十字党上台，宗蒂街狱牢里的囚犯都被转移到玛尔基特弯路监狱。

“叫我们排队集合时，”卡达尔说，“我发现囚犯中有几个认识我的女同志。我竭力用各种手势告诉他们，不要认出我来。幸亏她们没有叫我。”

1944年11月，这批犯人徒步押解去科马罗姆，在那里准备

用火车把他们运到德国去。党的领导组织了几个行动小组准备在半路上营救卢普塔克。其中一个小组骑自行车，带着手枪和手榴弹尾随这支囚犯队伍；另一组乘汽车，穿着军官服。他们找到了犯人的队伍，但却没有看见卢普塔克。原来卡达尔和几个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一起在涅尔盖什新村跑掉了，步行回到布达佩斯。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路上都要检查。卡达尔肩上扛了一块木板，每到检查卡就说，他是到下一个村子去送木板的。他又一次碰上了好运气，终于回到了家。

1944年5月，卡达尔化名卢普塔克关禁在监狱里时，成立了由和平党、社会民主党、小农党、保皇的双十字血盟会和农民党参加的匈牙利阵线。饶有趣味的是，各方领导人在内务部长住的房子里聚会。这时，所有反对党都已宣布要开展反对德国占领者的自由斗争。1944年9月，匈牙利阵线致霍尔蒂一份备忘录：停止战争，对德宣战，成立有匈牙利阵线和军队领导人参加的新政府。摄政在试图退出战争以前接见了社会民主党和小农党领导人，但是，除了毫无内容的一般性问题外，什么也没有谈到。同共产党谈判的是军队反间谍组织的负责人。不久前从监狱获释的党的书记拉伊克·拉斯洛向军队要枪，以便在退出战争后武装工人。而出面谈判的将军则想从拉伊克那里搞到一份亲共的工人名单。双方分手时相互并没有建立多少信任。

匈牙利阵线领导人知道霍尔蒂有退战意图，但不知道确切时间。除了霍尔蒂本人外，别人确实也不知道。阵线准备在10月17日组织总罢工。但是，10月15日摄政发表的声明及后来退战计划的彻底失败，使他们措手不及。

10月15日的唯一积极成果是，在霍尔蒂发表声明后，释放了几位反对党的政治家，其中有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阵线改组为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并委托基什·亚诺什中将组织军事抵抗，但箭十字党的“责问团”——当时的政治警察叫这个怪名字——安插了密探，军事领

领导人被捕，基什·亚诺什及他的两位同事被处决。还逮捕和处决了被剥夺了国会代表资格的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起义解放委员会作为一个组织瓦解了。

然而，在匈牙利，首先在首都，反对箭十字党和德国人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虽然它并无多少军事意义。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青年工人、开小差的士兵、左派青年炸毁德国人的车辆、枪炮，释放犯人，袭击箭十字党驻地。外地也有不少武装小组，从苏联起飞的飞机空降了部分游击队、流亡在国外的共产党人和战俘。约有二千至二千五百人投入了反对德国和箭十字党的武装斗争。

参加斗争的有卡达尔的弟弟齐尔毛奈克·耶诺。他不是卡达尔介绍到党内来的，当时卡达尔也不知道这个情况。直至今日卡达尔仍然对此感到自豪。这个年青人是他自己参加运动，投身武装斗争的。他当然不知道，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最高联系人就是他的哥哥。齐尔毛奈克·耶诺死于1948年5月1日那天，他把一面红旗插到他们住所的阳台上去，不料弹痕累累的阳台坍了。

卡达尔回到布达佩斯后，还得找房子住。不过当时比地下斗争初期要容易多了。一位同大资本家有密切来往的、全国闻名的演员帮了忙。演员的熟人、一位女男爵要给自己在佩斯的别墅雇佣一名管家。女男爵住在乡下——因为当时首都经常有空袭——别墅里除管家外还住着一位教法语的家庭教师、一个女仆和门房里的女听差。这是个理想的隐蔽地。

“我一生还没有享过这种福气”，卡达尔说，“那个女佣人每天早晨把早餐端到我床头。”

事情就发生在女男爵突然回来的那天晚上。卡达尔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他是新管家。女男爵说，听说女仆经常在偷她的床单、被套，所以她回来看看。

“为了几块床单，值得冒飞机轰炸的风险吗？”卡达尔表示惊讶。

“我的东西不能随随便便让人拿走。”女男爵说。

第二天早晨，女仆送早点来时说，女男爵已被逮捕，罪名是她窝藏了犹太人，警察正在门房等着管家。

“他们叫我把管家叫醒，我对他们说，不行，管家会生气的。”

“事后我推断，”卡达尔说，“大概女佣人告发了女男爵，免得偷窃的事给她带来麻烦。”

根据这样的告发居然逮捕了一个家有万贯的名人。当时的特点就是这样。

卡达尔意识到应该立刻离开，他偷偷溜出别墅，不慌不忙地从门房前走过，听见后面警察在喊他。但他没有停步，赶快走出铁栏杆门，从外面把大门锁上。接着，他飞快地奔跑起来。碰到这样愚蠢的警察真是难得的幸运。

卡达尔觉得应该把钥匙交给女男爵的前夫，这也是他为人的特点。他到女男爵前夫的办公室去，但没找到人。于是把钥匙放在一个信封里就走了。

之后，对首都的围攻开始了。这时，活下去确实成了大家的唯一目的。卡达尔同党的另外两位领导人在一起躲藏。那时他们已不遵守保密规定了。单独抓去也好，一块儿被捕也好，反正都要处死。

同卡达尔一起躲藏的伙伴中，一个1945年后成了国家保安局的领导人，1951年逮捕卡达尔的正是这个机构；另一个1958年成了纳吉·伊姆雷案件的第二号被告。这就是匈牙利严酷的历史事实。

卡达尔他们几个人企图越过前线。他们藏在茹格洛区的匈牙利弯路上的一所破房子里，这儿离苏联人只有几条街。但是，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交战双方在这里对峙住了。卡达尔他们不得不在这里度过了两个紧张而困难的星期，终于最后一批德国部队和箭十字党徒撤走了。但苏联人并没有马上到来，半天之后才出现了第一个苏联士兵。卡达尔先前不敢相信的事情，解放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 光明和黑暗

一个过来人曾说，没有经历过1848年3月15日<sup>①</sup>事件的人，可以说是枉此一生，我不妨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在1945年生活过的人，同样也是枉此一生。

当然，这样地相提并论并不准确。1848年匈牙利民族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而奋然站起来了，而1945年匈牙利战败了。首都，以及其他许多地区一片废墟，人们饥寒交迫。给国家以自由的不是奋起的人民自己，而是苏联军队。

但是在气氛上1945年和1848年之间确也还有共同之处：整个国家感觉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感情冲动，到处是激烈的辩论，动情的演说。

“解放的时候，我三十三岁。”卡达尔·亚诺什二十年后回忆说。“我从来也没有相信过自己居然会活到这一天。但那时我想，以后一切事情都将易如反掌。可是，什么事情也不简单。”

就连卡达尔他们碰上第一个苏联部队那事也不那么简单。苏军不了解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联络暗号。说得客气一点，战士们诧异地看着这三个比手划脚，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力图证明自己是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三个男子，至于要证明这点，他们当然做不到。还算幸运，战士们只是摆了摆手，把他们扔在一边就走了。因为这种事在战争中如果产生远为不愉快的后果，也是完全可能的。

翌日，卡达尔等人总算碰上了瓦什·佐尔坦。瓦什当年曾同

---

<sup>①</sup> 指当时爆发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由斗争。参见本书第56页注<sup>①</sup>。

拉科西·马加什一起坐了十六年监狱，后来一起去了苏联。之所以把他同战斗部队一起派到布达佩斯来，是为了寻找地下的共产党领导人，并负责组织城市的行政机构。瓦什以他惯有的大而化之的作风办了这件事。卡达尔说，例如在戈巴尼奥，他任命一个汽车售票员为警察局长，只是因为这个人穿着制服。瓦什也立刻给卡达尔他们弄到一辆由一个年轻的苏联战士驾驶着的敞篷汽车，责成这个战士负责这几位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安全，把他们拉回到匈牙利弯路去，说等一会儿他自己也去。事实上在那之后整整一天也没有见着他的面。

匈牙利当时是个古怪的世界。1944年11月7日在第一个解放了的匈牙利城市塞格德，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党的公开的中央委员会，11月28日在布达佩斯党的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拉伊克·拉斯洛遭到逮捕；12月1日在塞格德成立了由民主党派组成的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12月8日箭十字党徒处决了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军事领导人；12月21日在德布勒森召开了临时的国民议会，选出了临时民族政府，12月24日处决了鲍伊奇一日林斯基·安德烈<sup>①</sup>；3月17日临时政府投票通过了关于土地改革法令，而距离布达佩斯40公里的埃斯泰尔戈姆还在德国人手里。

临时政府是民族团结政府，团结了一切抗德的力量，也包括霍尔蒂的人，甚至，他们在政府中占据了最多的职位。达尔诺基·米克洛什·贝拉上将当了总理，此人曾任匈牙利第一集团军司令，在霍尔蒂发表声明<sup>②</sup>之后投向红军。可惜，他没有率部起义，只带了几个军官过来。霍尔蒂的总参谋长出任国防部长，他也投向了苏联一方，尽管在摄政发表声明后军队没有得到任何命令这一点上他的作用是令人怀疑的。霍尔蒂派往莫斯科签订停战

---

① 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领导人。

② 指1944年10月15日霍尔蒂的停战声明。



协定的宪兵司令也当了部长。取得部长职位的还有自杀的泰莱基·帕尔伯爵的儿子，此人也是停战谈判代表团团员。共产党人得到三个部长职位，社会民主党人和小农党各得到两个，农民党得到一个。

这个比例和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大相径庭。那些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中作为霍尔蒂制度基础的政治力量，到1945年已经分崩离析。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投靠了箭十字党，或者至少默认了这个政权，因此声名狼藉；另一些人被纳粹劫往德国，释放后也没有回国；还有些遁离了这个国家，或者退出了政治舞台。让霍尔蒂派的政治家们参加临时政府，目的莫非是为了瓦解那时还在德国人一边战斗的匈牙利部队，和在还没有解放的土地上的政权机关，但看来收效甚微，因为在匈牙利西部人们一般都不知道建立了临时政府。

1945年11月第一次国会选举的结果，已经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国内政治力量的分野。霍尔蒂分子的党没有参加竞选。小农党获得57%的绝对多数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得选票的17%，7%的选民支持农民党。

小农党的过去同它的现在和未来，一样充满了矛盾。很难准确说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因为它前身甚多，有数不胜数的名称和政治纲领。这个党有时同左翼结盟反对拜特伦，有时则同拜特伦合伙反对社会民主党，但从四十年代起在鲍伊奇—日林斯基影响下，小农党明确执行抗德的政策。1935年是这个党最成功的一年，在选举中获得10%的选票。德国占领匈牙利后，小农党被禁止了。

解放前这个党的名称是“独立小土地所有者、农业工人及平民农业党”，说清楚了，就是“农民党”，可是他们不愿用这个名称，因为当时把一个人叫“农民”等于是人身侮辱。1945年去掉了“农业”这个词，于是党的名称的意思，便是除了工人阶级外，代表国家的全体居民了。

小农党实际上成了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力量的渊藪。当年我认识好些小农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一直注意着他们的发展道路，不少人的情况我现在还清楚。他们中间有农民政治家，银行界人士，左翼知识分子，坚定的反共分子，保守的右翼分子，自由民主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犹太资本家，小资产者，资产阶级的抵抗运动参加者，军官，民族主义者，好心的教师，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无神论者。无怪这个大杂烩党在1945年夏天拥有一百万党员，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共产党在1945年大选中获得17%的选票，在一个国家里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中间，人们听到和读到的共产党人不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便是出卖祖国的叛徒，再不然就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这个被迫转入地下，一再被摧残的党，在好的情况下也不曾超过几千名党员的党，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得到了八十万张选票，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共产党在1945年2月有三万党员，5月有十五万，10月达到五十万。党员主要集中在布达佩斯和几个大的工业中心。我想，在那党员寥若晨星的岁月，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住那艰难的考验，就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着这几十万人，尽管这点当时不是十分明显。

我们手头还有另一项选举结果的情况，即1945年10月布达佩斯举行第一次市议会选举。这次也是小农党人以二十九万张票获胜，但超过联合竞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获得的二十五万张不多。布达佩斯的政治形势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但全国形势最后还是取决于首都。

可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多数人则不这样看。1919年的幻想在这时还有影响。从外国流亡回来的领导人认为，多数人向往工人政权。至于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之后在匈牙利发生了什么，公众情绪如何，宗教和四分之一世纪的反革命宣传，对人民心理有什么影响，等等。他们知道得非常少，或者不愿意知道。他们估计在选举中两个工人党一定胜利。然而选举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个悲剧性的进程：几年后这些人认为他们所管理的是一个法西斯人民，对于这样的人民，任何压迫手段都是合理的。

六个人代表了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关于拉科西，前面已经说过了，1945年2月他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格罗·艾尔诺自苏维埃共和国起就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今天许多人认为他是经济事务的专家。尽管事实如此（当时是他领导恢复经济建设，因此有“架桥者格罗万岁”的口号），但对于这个冷若冰霜，毫无感情，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的作用，我有自己的看法。除了拉科西，恐怕是他应对后来发生的事情负有最大的责任。

里瓦伊·约瑟夫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欢迎。同拉科西和格罗不同，是个优秀的演说家。他也参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最初是个诗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了不错的政论家、信口开河的思想家。为人粗暴专横，刚愎自用。

法尔卡什·米哈伊生于北部山区，从那里去了苏联。他的智力并不超于常人，事后表明，他的政治敏感性也是这个水平。历史让他扮演了最可怕的角色——刽子手。<sup>①</sup>

在最高领导层中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流亡者外，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拉伊克·拉斯洛，他生于1909年。是文学院的学生，出身于最有名的匈牙利厄特沃什学院。23岁时，因为组织共产主义活动第一次被捕。释放后当水泥搅拌工人，是1935年建筑业罢工的领导者之一。西班牙内战时任一个国际纵队的政治委员，在战场上受伤后被法国人拘留，纳粹占领法国后，被带到德国，关进集中营。潜逃后在匈牙利又遭到逮捕。出狱后再次被捕。拉伊克之幸免一死是由于共产党负责人向他的哥哥（当时在风雨飘摇的箭十字党政府中担任国务部长）提出：

---

① 法尔卡什是拉科西时期的违反法制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如果保全他的弟弟，日后可免他一死。这样，拉伊克终于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被投入集中营。潜逃后拉伊克·拉斯洛乘一条多瑙河上的小船重又回到匈牙利。因此1945年后许多人首先是青年和知识分子，对这位身材颀长、蒙古脸型、眼睛闪闪有光的人推崇备至。他了解他们，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另一个领导者是卡达尔·亚诺什。从四十年代起实际上是他们俩人——他同拉伊克交替着领导匈牙利的共产党。他们很少相见，当拉伊克被捕时，卡达尔领导党，当卡达尔坐牢时，由拉伊克来负责。

我和拉伊克之间没有过往来，只是在好多次集会上，游行中，辩论时，见到过他，听过他的讲话。和卡达尔相比，他是另一种性格。他闪闪发光，坦率，诚恳，外向。当年我也不只一次见过卡达尔，听过他的讲话。他安静、沉着，深思熟虑，内向。如果说拉伊克是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那么卡达尔是典型的工人。这样来区分这两个人当然未免有点简单化，但却是事实如此。当时我不知道，首先是当年的地下共产党员尊重卡达尔，在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是重要的干部。卡达尔同他们一起度过了地下工作的日日夜夜。拉伊克长时间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老党员对他了解较少。1945年后的年月里，拉伊克的地位变得显要起来，而这就导致了他的悲剧。

拉科西由于某种原因，比其他几位领导人从苏联晚回来几个月。卡达尔说，他个人也等待拉科西早日回国。在拉科西到达以前党是格罗·艾尔诺领导的。卡达尔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的经历是这样开始的：在一次会议上，格罗宣布因为卡达尔解散了匈牙利共产党，给他严重警告。卡达尔忍住了，可是他不明白，他们这几个人是党的领导人，却不知道是哪里作出的这个决定。

“我可以发言吗？”卡达尔提问。

严厉的格罗发作了。

“您现在还为您作过的事辩护？”

尽管是小事，但却说明许多问题：流亡者们相互间一般用第三人称，而国内的共产党员们则彼此用第二人称说话。<sup>①</sup>尊称带有明显的等级观念的味道，而你我相称则使人感到同属一个集体。

“上帝有数。”卡达尔耸耸肩膀。

他有个特点，如果碰壁，他就停下来，但决不放弃信念。

“我实在不明白，”他说，“如果不允许一个人为自己辩护，怎么可以惩罚他呢？我们已经不是在地下状态了。”

不久之后卡达尔被第二次严重警告。那是因为内务部没有钱给布达佩斯的警察发饷。卡达尔当时是布达佩斯市警察局副局长。

“我已经报告了部长，”卡达尔说。

“不要报告部长，而是应该报告中央委员会。”格罗回击说。

卡达尔沉默了。他不申辩。

这也是卡达尔等待拉科西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他想，如果拉科西抵达，领导作风是会改变的。当时他还不知道，拉科西在莫斯科已经对他的同事们说过：回国以后他们应该把一切都抓起来，因为国内的党领导人一钱不值。

接近拉科西的人都说，此人对于同别人的每一次谈话和会谈都是认真准备的，无怪他了解情况的程度经常使对方吃惊。那时和他见过面的人都认为他机敏、诙谐。如果他愿意，甚至还能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无论如何，他不像冰冷的格罗，尖刻的里瓦伊，爱咆哮的法尔卡什。

卡达尔在那段时间里，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埋头于工作。他先是任布达佩斯市警察局副局长，后任党的组织部长，布达佩斯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接着担任党的副总书记。

---

<sup>①</sup> 匈语中和对方用第三人称是尊称，相当汉语中的“您”，表示客气或冷淡，而第二人称则相当于“你”。

记，又是国会议员。这时卡达尔已经成了他的正式名字；他地下工作时已经习惯于用这个名字了，在得到内务部长的批准后便正式作了改变。

1945年5月卡达尔总算把他的母亲从卡波伊村接到布达佩斯来了。这时候卡达尔终于有了住宅，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单独的住宅。他母亲抱怨儿子不该这么长时间没有关心她。

“你干吗要当警察？”母亲同他争吵，“当警察会出事的。”

“有一次我去匈牙利国营钢铁机械厂的居民区开会，”卡达尔说，“我发现母亲也坐在会场里。她是去看望我当年在监狱里一个难友的双亲。我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坐牢，他们则一起去探监。就这么认识了。”

这是他母亲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听他讲话。

“那时她已经戴了眼镜，能看书了。她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读小册子。想要理解我的思想。”

解放后，口号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一句措词生动，言简意深的口号往往比一本内容深刻的论文起到更大的作用。匈牙利共产党1944年在塞格德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是：“匈牙利将获得新生！”

许多人不相信这句口号。一位有名的匈牙利作家在日记中写道，国家摆脱这场灾难的后果需要一百年。

悲观看法是有根据的。不仅多瑙河和蒂萨河上的桥梁，而且相当部分的公路桥也都被炸毁了。铁路的40%遭到破坏。七万辆铁路车辆中五万辆被劫到德国，剩下的车辆有一半是残缺不全的。三百艘船只剩下六艘。90%的工厂和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全国70%的牲畜被运往西方或杀掉。匈牙利国家财富的40%化为乌有。损失总额相当于1938年国民收入的五倍。战争期间五十余万匈牙利公民死于暴力。

首都遭受的破坏最大。布达佩斯一片废墟，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煤气也没有交通、邮政和电话。残破的家庭在报纸刊登启事

寻找失散的亲人，他们有的被投进了集中营，有的被军队抓走，有的当了战俘，有的在战场上失踪了，而有的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逃离了这个国家。当火车刚开始运营，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农村（有的骑着自行车，甚至步行），带着剩下的衣服、皮鞋、床单，带着工具和钉子或其他只要能找得到的东西去换食品。货币飞速贬值。一百万人的首都在挨饿。当务之急无可争辩地是重建国家。

临时民族政府没有重犯苏维埃共和国的错误，迅速而果断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当颁布关于“消灭大庄园所有制将土地分给农民”的政府法令时，在匈牙利斗争仍在进行。六十五万贫雇农、农业工人和小农平均获得五霍尔特土地。土改涉及的人多达二百万，占全国居民的四分之一。匈牙利农民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还曾遭遇到许多折磨和痛苦，但像1945年以前那样的生活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土改，当然更主要的是新的社会秩序，遭到了一支不小的社会、政治力量——天主教的反对。它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拥有八十多万霍尔特土地。

在匈牙利，天主教会由于它消极的历史作用和拥有巨额财产，从来也不是“民族的教会”（像波兰一度有过的那样）。而新教则和民族要相像得多，它也像饱经苦难的人民和得不到完全独立的民族一样，备受迫害和欺凌。天主教会由于它几百年来政治上的陈腐性，1945年以后，无论是否被剥夺财产和权力，都会起来激烈反对新秩序。

教会的首脑是埃斯泰尔戈姆的主教明曾蒂·尤若夫红衣主教。根据他的一生作为和他亲手撰写的自传，今日已可盖棺论定：不仅政治上，在哲学上他也是个目光短浅、反对进步的人物和教会领导。明曾蒂不仅给国家，也给匈牙利天主教徒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解放后他不但作为天主教会的首脑，而且作为“国家的第一旗手”对国家事务指手划脚，他的陈腐的封建观念不仅使自己

声名狼藉，同时也玷辱了宗教和教会的名誉。

但是陈腐过时的观念，在匈牙利是根深蒂固的，如果在三十年代大商人和银行家可以戴着白鹭羽毛的头饰，穿着狐狸裘民族服装，腰上挂着长剑招摇过市，自命为货真价实的纯匈牙利人，那么在四十年代，一个羸弱的主教，小资产阶级的一个苗裔，为什么又不能自封为“国家的第一旗手”呢？但是政治上的荒唐见解，没有能使数十万不懂政治的教徒、景仰教会的芸芸众生，不去听从大主教的意见。成千赤贫的农民不愿或者不敢接受分到的土地，他们害怕上帝的惩罚，但更害怕的是，像不少人放出的风声一样：地主还要回来，到那时候敢动一动土地的人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匈牙利农民身上固然有多热·久尔吉的造反精神的遗传因子，但他们也没有忘记农民国王悲惨的命运。他们对于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结果记忆犹新：父亲和兄弟的尸体悬挂在村庄的广场上。

但光这样说是不全面的。农民的绝大多数还是以如醉似痴的幸福心情，来接受分给他们的那块土地，从而实现了数百年的美梦。我还认识许多神甫，他们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比他们更好的教师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神甫不仅是教徒的牧师，而且教贫苦人养蜂，种植果树，种菜园子。许多修女像最亲近的家属一样护理病人。我想，这位天主教会的首脑剥夺了他们的使命从而对他们犯了罪。他们想为人们服务，但又必须服从教会。

我不知道，明曾蒂出于什么考虑，决定匈牙利不需要天主教党。其实如果有这样一个党的话，无论是天主教民主党，还是天主教社会党，其影响肯定是不小的。如果光说大主教对民主和社会主义都嗤之以鼻，即使带上天主教框框的事物也不例外，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

明曾蒂依然故我，当着他的教会首脑和旗手，可从来没有想过，他派去进行政治斗争的人们，却需要在业已变化了的环境中活动。当国会在1946年2月宣布匈牙利成立共和国时，只有一个



议员投反对票。虽然红衣主教大人反对取消君主制，在国会中他也不乏追随者，但那年月，如果有谁想当个政治家，就不能公然站在国王一边。因为否则是不识事务了。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由流亡三十年后回国的卡罗利·米哈伊出任共和国总统，却遭到小农党的坚决反对，这里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人事的因素。最后小农党领导人蒂尔迪·佐尔坦成了匈牙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蒂尔迪当过新教的牧师，为人和善可亲，有外交手腕，可是不够坚定。他在战争期间曾同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一起领导小农党。小农党的另一个领导人、农民出身的纳吉·费伦茨出任总理，他比共和国总统强硬，坚定，但他比总统右倾。同时选举小农党的瓦尔加·贝拉为国民议会主席。关于他，除了说当过天主教神父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另一个农民出身的科瓦奇·贝拉成了小农党的总书记，他是党的最有想象力的，最有特征的政治家。

让我们往前翻几页历史，看看若干年以后的情况吧，共和国总统蒂尔迪的女婿因进行间谍活动被处决，他本人也就遭到软禁。1956年他当了纳吉·伊姆雷内阁的成员，后来同纳吉一起被判刑，获释后不久去世。纳吉·费伦茨总理1947年访问瑞士后没有回国，后来在美国经营农场，是匈牙利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956年事件中想回到匈牙利来，但被奥地利驱逐出境。七十年代末一度想回匈牙利访问，但因心脏病发作未能成行，不久死去。关于瓦尔加·贝拉还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一直是美国豢养的匈牙利流亡者领导人。科瓦奇·贝拉1947年被苏联当局逮捕，在监狱里学习俄语，研究马克思和列宁著作，获释后任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1956年身患重病，当了纳吉·伊姆雷内阁的成员。事后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还选他为国会议员，不久因心脏病去世。

关于这几个人的即使是很粗略的叙述，大概已经不难使我们了解到小农党是个什么样的大杂烩。事实上，上述的领导人都属于中间派。党内相当强大的右翼，要求纠正土地改革、力图排挤

左翼政党并阻止实现国有化。至于未能达到目标，那当然不是由于他们努力不够的缘故了。

左翼的回答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和工会理事会建立了左翼联盟。那句“我们不交还土地！”的口号，就是那时候的产物。左翼联盟于1946年3月在布达佩斯召集了三十多万人参加的大会，提出：“把人民的敌人赶出联合政府！”政府中那时小农党有九个成员，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四个，农民党一个。

社会民主党总书记长期来是萨卡西奇·阿尔巴德。他早年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当记者，还出版过诗集。卡达尔说萨卡西奇是这样的人：如果有可能，他就选择那条好的道路。我认为这样说是很准确的。我熟悉萨卡西奇，他是个正直的人，可就是不够果断。他的党什么都有，就是缺乏统一。当年的党的领袖派耶尔·卡罗伊在当时已经不那么能代表右翼了。派耶尔在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一直是热衷于同政府妥协。无怪连德国人把他关进监牢也没有能提高他的威望。眼光炽烈情绪也炽烈的凯特莉·安娜本来是中间派的发言人，但后来逐渐往右转。我不止一次听过她讲话，是个优秀的演说家，浪漫主义者。当年的面包工人和工会领导人马罗山·久尔吉是左翼的领袖，当时他就已经在为同共产党人联合而努力。

我们再看看若干年以后的情况：蒂尔迪靠边站以后，萨卡西奇当了匈牙利共和国总统，不久遭到逮捕，他逝世于1965年，当时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凯特莉也在1950年被捕，1956年她是纳吉·伊姆雷内阁的成员，后来离开匈牙利，死于流亡之中。马罗山也进了监狱，直到1956年才获得释放。同年6月当了政治局委员，11月4日<sup>①</sup>之后任政府国务部长。1962年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这位白发苍苍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今日依然兴致勃勃不减青年，每天围着游泳池游好几圈，还是一个工人合唱团

---

<sup>①</sup> 这天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于索尔诺克成立。

的团员。

民族农民党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影响，但却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是由激进的作家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导人是韦莱什·彼得，他原先是农业工人，坐过牢，后来成了冷静、成熟的作家。在联合政府时期他当国防部长，那时也是穿高筒皮靴，黑外套里面一件白衬衣，不打领带。<sup>①</sup>全国把他叫作彼得伯伯。我非常喜爱他，或许在他的同代人中间我最爱他了，尽管我们两人之间几乎在各方面都不相同。他的党正像其他党一样不统一。党的左翼领导人埃尔代伊·费伦茨是我国最优秀的社会学家之一。党的左翼领导人科瓦奇·伊姆雷是杰出的政治家。

历史这样记载着：韦莱什·彼得到1956年为止担任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10月23日他在贝姆·尤若夫将军<sup>②</sup>雕像下向示威游行讲话。1956年后是国会议员；卡达尔也很尊敬他，在他逝世后写道：“韦莱什·彼得和共产党之间在三个大的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在两个问题上他失误了，在一个问题上他是正确的。”

埃尔代伊·费伦茨解放后担任过好几任部长职务。1956年10月23日从国会的阳台上试图向聚集在那里的几十万群众说话，但被轰下来了。他是11月3日同红军驻匈牙利部队谈判的委员会成员。埃尔代伊事后遭到逮捕，不久获得释放，当时他说，再也不想过问政治了。坦率地说，我当时就不相信这句话。后来他担任爱国人民阵线领导人，再后来是匈牙利科学院负责人。匈牙利农业的繁荣也有他的功劳。

科瓦奇·伊姆雷早年曾经写过一本使人震惊的关于匈牙利农民贫困的书，1947年退出农民党，后来成了一个右翼政党的领导人，以后离开了国家，到死一直是匈牙利政治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sup>①</sup> 这是匈牙利农民的典型装束。

<sup>②</sup> 1848—1849年匈牙利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战争将领。

一。他曾为匈牙利农民大声疾呼，但在他离开匈牙利以后国内的农民发生了多大变化，这点他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

为了让读者感受一下当时政治辩论是在什么样气氛中和用什么样的调门进行的，不妨抄一段国民议会1946年2月8日会议的记录：

“卡达尔·亚诺什〔共产党〕：尊敬的国民议会！我认为在我之前发言的舒约克·贝拉议员作为多数党发言人的讲话，对国家是极其有害的，是坏的（喧哗声，小农党议员们抗议。——叫喊声：那是因为舒约克是匈牙利人！因为他爱祖国！您们想打他吗？——喧哗）。正如我们欢迎总理先生在昨天的声明中，谴责和反对危害国家的沙文主义那样（从小农党席位中叫喊：我们也谴责和反对！——沙里·伊格纳茨〔小农党〕：说得不对！那不是沙文主义！——法尔卡什·米哈伊〔共产党〕：是最坏沙文主义！），我们必须以同样程度的遗憾指出，对于总理的这个如此重要的立场和声明，连在他自己的党里意见也不一致（小农党中喧哗和叫喊，完全一致！）。沙文主义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毁坏了我们的祖国，使她陷于贫困，今天还有人想扶植这个沙文主义，接受这个沙文主义的观点，还不对它感到深恶痛绝。（小农党中一个声音：最好不要让您来议论沙文主义！——小农党议员叫喊：概念不清楚！——喧哗）我认为在国民议会里扶植、宣扬这个沙文主义，对于国家利益是非常有害的（拉科西·马加什国务部长：是这样！——欧尔班·拉斯洛〔共产党〕，您们最好去读读铁托的讲话。——喧哗。内梅蒂·耶诺〔小农党〕：不是铁托主宰世界的命运！——连续喧哗）”。

和这些政治上五花八门的政党相反，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是团结的。在这个党里没有像其他党里那样的右翼，左翼和中间派。这个团结使共产党人在国内具有比大选票数的比例更大的影响，而不完全是因为根据盟国协议匈牙利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缘故。

在左派力量的压力下，1946年3月小农党全国主席团宣布，

开除右翼领导人舒约克·贝拉和其他的十九名议员出党。小农党的崩溃开始了。

无疑，左派力量，首先是共产党人的经常压力，促进了小农党的崩溃，但同样无疑的是，这个鱼龙混杂包含各种各样观点的选民和领导人的党，其本身就带有崩溃的必然性。

那个所谓“匈牙利兄弟会”即“匈牙利会”的被揭发，是小农党崩溃，同样也是匈牙利政治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这是一件包含多方面因素的错综复杂的事件，有些情况直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就这个“匈牙利兄弟会”而言，它本身是个秘密组织，就像不少类似的组织一样，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就成立了。据我所知，它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实质性的活动。但后来，在1947年揭露了一项反对共和国的政变阴谋，为首者之一是霍尔蒂的一个上将，此人在箭十字党接管政权之前，摄政曾内定出任总理。参加筹划这次政变的还有高级军官，小农党的一个前部长和许多有影响的议员。领导这次事件的“七人委员会”，准备以政变来恢复君主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七人委员会”想借助“匈牙利兄弟会”，而这个团体的不少成员是小农党党员。

国家保安机关，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此事有点操之过急了。当他们逮捕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时，只拥有可以证明事属一件小规模阴谋行动，而无法揭露“匈牙利兄弟会”和小农党领导人中间，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到这项活动中来了。

起先联合政府内所有四个党（当然也包括小农党）强烈谴责阴谋活动，但共产党人和左派力量继续施加压力，从而导致了小农党崩溃。党的总书记科瓦奇·贝拉被逮捕，在瑞士访问的纳吉·费伦茨不回来了，国民议会主席瓦尔加·贝拉逃离了国家。小农党开除了许多议员的党籍。不少人被下狱。还有许多人退了党，并成立了几个新党。

1947年的大选，从这样一个观点上来看，要比1945年那次现

实些，就是：不再是一个大杂烩的小农党同左派力量对立，而是有诸如宣传基督教思想的“民主人民党”，接过小农党当年的“上帝、祖国、私有财产”口号的“匈牙利独立党”和“独立匈牙利民主党”。除了争夺议席以外，天知道这些党还有什么别的纲领。所有这三个反对党，都是小农党当年的头面人物组织的。这几个党和若干其他反对派小组，在1947年获得了40%的选票。过去一直占绝对多数的小农党，失掉二百万张选票，其中一百八十万张转到了从小农党分裂出来的各党手中。共产党成了全国最强大的党，获一百一十万张选票，占22%。

卡达尔在这些年里主要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党员的数目猛增。1946年9月，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有六十五万党员，其中十五万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三个报告。拉科西·马加什作关于国内和国际形势以及党的任务的报告，纳吉·伊姆雷作关于农民政策的报告，卡达尔谈关于组织问题。

六十五万党员这个数字并不反映实际情况，因为无论共产党在解放后工作得多么好，多么有成效，不能设想在短短一年半之内会使五、六十万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历史事实是，许多人出于利害关系和想入党做官而参加了党。当然不仅共产党如此，在联合政府时期各党都争相把自己的人派到尽可能多的岗位上去，谁想担任什么职务，就应该属于某一个党。就是借电影院开会也是根据联合的原则分配的。有些人想篡改本人的历史，有了党证，到自己面临审查时，便可指望该党的卵翼；而各党为了增加选票也大肆网罗新党员和拉拢选民，而很少考察谁出于什么动机参加自己的党。于是出现了这样可悲的局面：一方面成批地把当年不堪忍受霍尔蒂警察的非刑拷打而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开除出党，而另一方面又数以万计地吸收对之一无所知的人入党。

此外，还有一个古怪的站不住脚的理论，一位党的领导人后来是这样概括的：只有那些解放后入党的人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

因为老党员，如果当年生活在匈牙利，他就可能是警察局密探；如果在苏联，可能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在西方，则可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个臆造的论点后来在许多可怕的案件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卡达尔则持另外一种看法。在1946年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他这样说：

“某些受法西斯病毒传染的和还没有彻底治愈的人，也同那些想借机升官发财，以及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人，一起混进了我们党内。”

在当时的报刊和文件中可以找到的卡达尔的看法，基本上同1956年以后他制订和执行的政策相吻合。当然我不是想说他一贯正确，似乎他在当时就已经像今天一样看待许多问题了。

卡达尔说：“党在那些年里所犯的错误，也就是我的错误。”

这是就具体政策而言，至于他当时阐明的若干基本原则至今也没有改变，甚至措词也几乎一样，这说明，远在三十年前他的世界观已经升华到了什么水平，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从来不看他自己从前的讲话和文章的。

“健康增长的道路是，让广大的普通人亲身体会到党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存在的。”

“那些不打算承认应该是他们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人民为他们服务的人，给党造成的损害往往比敌人还大。”

“我们深信，敌人低估了我国人民的政治成熟性。匈牙利人民，在过去的困难年代学会了很多东西，政治上越来越发展，目光变得更锐利，从而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正因为如此，那个为人民作最大贡献的党，最后在匈牙利将成为最强大的力量。”

“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一切正直的人都是我们的盟友，不管他是哪一个党的还是党外的。”

“我们的一些党组织的领导——其数目相当可观——还一直

没有真正认识到党群间关系的重要性。拉科西同志在2月1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工人阶级政权的巩固在我们一些党组织领导人那里导致了开始放弃说服教育的有害后果，而代之以用权力和行政命令以及官僚主义的办法来领导群众。这些领导人给党群关系造成了和造成着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引用拉科西·马加什的话倒不是出于礼貌。拉科西在这些年里说的话中同样也是突出强调这些原则，至于在多大程度是出于本意，有多少出于策略，我就无法知道了。拉科西急转直下的变化是后来发生的。

我还想借机指出拉科西和卡达尔之间为人的区别。这似乎无关宏旨，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1946年圣诞节《自由人民报》<sup>①</sup>发表了对拉科西、卡达尔和法尔卡什·米哈伊的采访。这可算是一篇凤毛麟角的文献，因为共产党领导人除了谈政治外是很少就其他事情公开发表意见的。下面是拉科西和卡达尔讲的话。

拉科西：

“对我来说1946年的一个大的感受是共产党员下乡，农村和城市的劳动者相互了解。我们许多同志认为细小的工作没有意思。其实，如果没有这些细小的工作，就很难使那些二十五年来听惯了诽谤共产党的人们相信我们观点的正确性。我总是以最大的兴趣听取党员们下乡时发生的那些零星故事，这些小故事告诉我们，城市和乡村的劳动者相互了解是多么的有意义。下面是特别使我感动的小故事：

在多瑙河畔的一个村子里，下乡的工人带走了一个老婆婆的破窗框，说好下星期天修好带回去。村里的一些落后分子和反动家伙第二天嘲笑这位老婆婆说：‘你再也看不见你的窗框了，因为还没有发生过共产党人把落在他们手的东西送回来过这样的事。’

<sup>①</sup> 当时匈共的党报。



果然，下星期天我们的同志们没有露面。村里的反共分子幸灾乐祸地三番五次对老婆婆论证他们的‘真理’。可以想象，又过了一个星期当我们的同志重新出现时，这老婆婆该有多高兴了。同志们把修好后上了油漆、安上玻璃的窗还给了老婆婆，还请她原谅，因为上星期他们的卡车坏了。老婆婆高兴地对下乡的人说，上两个星期，村里除了窗框被偷这件事外，几乎什么别的话题都没有了。‘可是我告诉他们，我知道，共产党员只要答应什么事，他们是一定会兑现的。这不？我说对了。’”

卡达尔：

“我是个体育爱好者。二十年代我是钢铁工人足球俱乐部少年队的队员，同椴树街的男孩子们一起在人民公园深可及踝的沙土地上踢过足球。我们往往一踢就是三、四个小时，结果经常是15比11。后来我只当啦啦队了，当然，作为一个自觉的工人，特别是钢铁工人，我给钢铁工人队打气。现在多承大家不弃，选我为钢铁体育俱乐部的主席，我对我的球队——最好的匈牙利工人体育团体感到骄傲。我的职务使我对于足球是懂行的。但作为啦啦队我却懂得更多。在这里我不打算详细论述足球球迷的心理学，但看来球迷们自认对足球的阵容，肯定要比教练内行得多，对技巧要比球员懂得多，至于对球赛的规则比裁判了解得多一百倍，那更是不在话下了。你看，在看台上不是经常可以听到这类了不起的议论吗：‘要是我，让西拉吉打中锋’，‘这裁判是白痴！’这时说不定会有人说‘您这个畜生，这难道是出界球？’就这样，我作为球迷品头论足了十六年。虽然我不太在比赛的时候大叫大嚷，但我也深信自己‘会比别人干得好些。’”

“然而在今年夏天却发生了意外。有人建议举行一次匈牙利共产党——农民党足球比赛，交锋地点是于勒伊路足球场。我也披挂上阵。大家排成一行跑进场子，谁也没有摔交，挺顺利。可是接着使人吃惊的事情就来了。克伯尔，也许是奥普罗同志，首先说出了我们的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那时他说，‘喂，从下面

看这球场比平常要长得多，踢一场能受得了吗？’我不想把事情拉长，因为也许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上了农民党的‘圈套’，因为他们一个劲儿地叫喊自己是‘年轻的党’，派了九名大学生参加球队来对付我们。而我们这批老家伙在整个比赛中膝盖就像生锈的钥匙开锁似的，不停地格格作响。无庸细说，到头来我们以〇比三输了。（请排字的同志们把前面的句子用非常小的字排，免得拉科西同志注意。）总之，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的傲气一扫而光，因为我们看到，踢足球难，从凉爽的看台上叫喊和批评那是容易得多了。比赛后好几天我们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剩下那么点力量，来放弃十六年以来一直自认为无所不知的球迷的自以为是。我开始另眼看待比赛了。但也许球迷的秉性使然，这点认识并不持久。在最近的钢铁队——弗劳迪队比赛时我又冒火了。‘如果西拉吉在上半场打中锋，那肯定会是另个样子。’我重新又变成热烈的观众了。似乎我又比教练、队员和裁判更懂足球了。看来，作为旁观者，看法是改不了的。”

区别在哪里？拉科西制造了或相信了一个幼稚的故事。这样的老婆婆只在童话里才有，而不存在于1946年的匈牙利现实中。在匈牙利大概没有一个农村妇女会让自己的屋子没有窗户——如果下雨怎么办？同时任何一个农村妇女不会这样说话：“共产党员只要答应什么事，他们是一定会兑现的。”拉科西想，这样的故事可以赢得人民的好感。他不知道，人们对于这样的故事只是发笑。到后来严峻的日子到来了，他们就不笑了。

卡达尔只是讲故事。他没有说教，也不想用它宣传。但他说的话还是有哲学意义的。对我来说，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对现实的了解到一定程度，便变为智慧的结晶。

在1947年的大选以前，匈牙利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有人曾经认为，匈牙利几十年摆脱不了战争造成的破坏，他们看错了。尽管当时这方面的迹象是很多的。匈牙利创造了通货膨胀的世界纪录。1945年12月流通的货币是七千六百五十亿本戈，到1946年

7月达到四千七百三十四万九千四百九十二兆<sup>①</sup>本戈。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事实是，劳动者用皮包把他们的工资带回家，到第二天这一皮包钱便一钱不值了。几乎在使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里，于1946年8月1日发行了值钱的新货币。一个新福林价值四万兆本戈。我也不知道它的价值，只知道，当时谁也没有兑换钱。在街道上到处是成堆成堆被扔掉的劣等纸印刷的旧钞票。年轻的匈牙利国家称新的货币为福林，代替霍尔蒂制度使用的本戈，起了很好的政治作用。使很多人感到惊奇的是福林站住了，没有贬值。同时慢慢地食物、衣服、鞋也出现了，虽然数量很少，质量也非常差。1947年通过的三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三年内无论生产、无论生活水平都要恢复到战前最后一年水平。

其间，1946年秋，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签订了和约。匈牙利吞下了霍尔蒂和萨洛希之流造成的苦果。这个希特勒德国的同盟者再次退回到特里亚农和约规定的边界之内。尽管不是匈牙利人民而是当年的国家领导人应对战争负责，但是那些决定世界命运的人所着眼考虑的，只是国家和政权，而不是人民和民族。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德国的肢解，南斯拉夫反对第三帝国的战斗一直坚持到最后，罗马尼亚比匈牙利早退出战争，并掉转枪口对德作战。战胜国当然是不会同意由希特勒划定的边界的。

国家也好，政治领导人也好，都接受了和约，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指望得到别的东西。同时国内的政治家们和舆论界所醉心的是党派斗争而不是和约。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说，1947年的大选里有骗局，共产党人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了国家最强的党。

这句话的前一半是对的，后半句却不对。选举时果真使用了名声不好的“蓝色纸条”，不在居住地区投票的人可以利用这种证件投好几次票。但是党的领导并不知道也没有同意这样做。按

---

<sup>①</sup> 百万的立方，1后面加18个零的数。

可靠的统计，共产党用这个办法大概多搞到了两个议席。在四百一十一个席位的国会中，这两个席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无疑，这个既不智、又无益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道义上的损失。同时这也预示着苦难时期的即将到来，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认为，为了工人政权的利益，任何手段都是可取的。正像俗语所说的那样，即使是通向地狱的道路也是良好的愿望砌成的。

1947年大选后，反对派为取得政权还进行了一次绝望的尝试。从小农党中分出来的几个党的领导人试图说服小农党退出联合政府，并同他们组成政府。这一建议同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人想排除共产党人，并以他们的党为主建立联合政府的尝试一样遭到失败。最后是在小农党的迪涅什·拉约什主持下建立了新政府。共产党有五名部长，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四名部长，农民党两名部长参加了政府。

1947年的大选胜利后，共产党人于1948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和中间派的领导人辞职，或者被撤换，不少人离开了国家。两个工人党<sup>①</sup>于1948年6月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的主席是萨卡西奇·阿尔巴德，总书记是拉科西·马加什，副书记是法尔卡什·米哈伊，卡达尔·亚诺什和马罗山·久尔吉。

看来，国内形势趋向稳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的左翼联合政府有可靠的多数，无论反对派，或是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威胁不了政权。于是1947年把银行国有化，1948年初把百人以上的工厂，1948年夏把教会的学校都收归国有。许多迹象表明，在匈牙利行将出现健康稳定的时期。1948年3月卡达尔在国民议会的发言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从第一天起就是为了稳定而迅速的发展实现全体民主力量的团结。即使在匈牙利共产党已经在数量上

---

<sup>①</sup>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看法也没有改变。相反，人人都能看到，从那时候起，联合政府已经更加巩固，那种几乎每两个星期就要重复出现的危机已成过去。我们希望，未来将变得更加没有动荡和没有危机。我们期望，匈牙利一切民主力量更加巩固的联盟将会实现。让共同一致的、创造性的和民主的工作代替无休止的党内争论，这是全体匈牙利人民的希望和国家利益所在。一个真正接受民主制度的、进行建设性批评的反对派与我国的民主制度是相容的，它对国家确有帮助。”

那时对多党制的这种看法并不只是卡达尔的个人意见，而是共产党的立场。权威的思想理论家里瓦伊·尤若夫在1948年9月26日出版的《自由人民报》上写道：“我国存在着人民民主制度，存在着联合政府，也还存在着阶级，工农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取缔其他政党，并不能使我们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一步。”

卡达尔·亚诺什不仅过去有过这种看法，他今天仍然认为，如果当时保留了多党制那就好了。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拉科西在1948年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强调了取消“旧的形式和机构”的重要性。之后，他在1949年3月全会上所作的总书记报告中又明确断言，对于阶级敌人来说，存在多种政党就意味着存在“后备力量”。于是，各个政党先后停止活动，或被勒令解散。从1949年起，匈牙利实际上已经是一党制了。

这种根本性的政治转折并不只表现在取消多党制一个方面。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我于1931年9月成为当时非法的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的成员。”卡达尔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在一次小组会上，那里我们一起五个人，书记作了一次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只要我还活着，就忘不了当时的情景。书记在报告中也用了‘国际形势是复杂的’这个说法。这是早在四十五年前发生的事了。自此以后，我听过许多

次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几乎所有报告人一开始都这样说。”

不管这段历史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多么典型，遗憾的是，事实上，1948年的国际形势比通常要复杂得多。过去，红军和西方列强的军队为反对共同敌人法西斯而并肩作战；英国国王向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者赠送宝剑。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苏联盟友的丘吉尔故态复萌，在富尔顿讲话中重弹反共老调。美国由于它的工业和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还由于它的原子弹，变成了世界上起领导作用的大国。罗斯福去世后，极端保守的杜鲁门登上了总统宝座。他同样把苏联视为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希特勒在他末日来临的时候所指望的，但在当时还不能想象的那种事情终于发生了：西方盟国和苏联敌对地进行着较量。那种认为在经历世界大战无法估量的苦难以后一个安定的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过是一场短暂的美梦，终于幻灭了。

西方三列强于1949年建立了一个与之同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表明，它们已不再把德国，而是把苏联视为最主要的敌人。1948年西欧联盟宣告成立，1949年在这个基础上又成立了命名为北大西洋联盟的军事组织，即北约组织。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1950年，当美国对社会主义的北朝鲜和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南朝鲜之间的战争进行军事干预的时候，北朝鲜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堵截了美国人的挺进。可能更使美国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是，1949年苏联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而美国专家曾预言苏联要到1954年，最早也要到1952年才能制造出来。这样，美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对苏联进行核打击而不会遭到回击的这种经常性的危险就不再存在了。然而，一场核竞赛开始了，它至今仍使全世界处于严重的危险中。

在这紧张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又陷入了那种自它成立以来几乎经常出现的生存受到威胁的处境。时而内战，时而外来干涉，

时而禁运，时而军事进攻。谁也说不上过去三十年间，究竟有多少苏联公民在各种敌人手中死于非命。这个数字估计至少有三千万。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自己的生存流过那么多血。

冷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可能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冷战不仅冻结了外交关系和世界经济关系，而且也冻结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内政。他们认为，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保证民主和个人自由并不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不错，产生这个观点并非必然。列宁在世时，苏联曾经历过它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时代。然而列宁并不认为，对内进行镇压是防御外来威胁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了苏联的领袖，政治手段随之发生了变化。

那些三、四十年代流亡在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体上都知道斯大林的政策是如何对冷战危险作出反应的。但在国内的共产党人对此则一无所知。

“我多次仔细地想过，”卡达尔说道：“如果在1948年有人告诉我，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我必然认为这不过是呓语，或是一场噩梦，是那么不能令人置信。”

我不相信多党制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但强行取消多党制无疑预示着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党制。在苏联，1917年以后，其他政党都因为它们在国内战争期间站到白匪军一边而自我暴露和消灭。但是，在匈牙利，取消多党制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参加匈牙利联合政府的各政党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取消多党制只能表明：不仅反对意见、而且连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了。

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是，千篇一律和对一切都表示赞同，已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最主要的要求。与此同时，开始逐渐形成一种错觉，似乎存在着某种完整无缺的神经中枢，它决定一

切，而企业、车间、机关、公民和农村，除了尽可能好上加好地去贯彻这些决议外，再也没有别的任务了。

在国际关系方面，也经历着一个同样的过程。波兰曾经是纳粹德国的敌人，战时成千上万的国民、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反共分子，都进行过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工业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分割和吞并的时候，存在过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保加利亚是沙皇统治，在罗马尼亚是国王统治，有时候还要依赖法西斯头目的帮助；这两个国家都是落后的农业国，但最后都起来反对德国。在匈牙利是半法西斯和半封建的，在某些方面是自由主义的统治，尔后才发展成为法西斯专政。在这些不同的国家里，怎么能按同一个模式去建立它们的内政、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呢？

只有南斯拉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接受这种划一的要求，而且并不是在一党制问题上。它再次表明，一党制问题并不是关键性的。在南斯拉夫，也象在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胜利后没有别的政党。但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认为，一个国际组织——在1947年作为共产国际的后身而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能在每一个细节问题上决定不同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和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

1948年6月，情报局批判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称南斯拉夫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和反苏分子。1949年的决议则已把南斯拉夫领导人称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南斯拉夫危机几乎肯定成了使匈牙利内政发生急剧变化，并造成一种匈牙利前所未有、但也是难以想象的政治气氛的最终原因。1949年6月，全国人民从报纸上惊悉，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因犯叛国罪而被逮捕。

这是匈牙利工人运动最悲惨的一章。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



进牢房，强迫他们编假口供，严刑拷打并杀害他们。

弄清这些臆造案件的原因、来龙去脉、及其确切的史实，并不是本书的任务。我认识不少人，他们是这些恐怖案件的受害者，其中一、两人可称为我的朋友，我读过他们有关这段时间的回忆录；但我也认识几个案件的执行者。这些臆造案件的一个令人不解之处是，对每个参与迫害的打手或受害者本人都都是一个谜。谁也不能完全知道它的全部原委。我想，即使打开最机密的档案室查阅最机密的卷宗——虽然我怀疑是否有这些——也弄不清楚真象。

至于为什么，我不能给予准确的回答。如果说拉科西等人鉴于不断紧张、面临战争威胁的形势，认为在匈牙利必需实行强硬的专政，因而应该从政治生活中——不止一次地还从生活中——把这些被认为是反对他们的人清除出去，这种解释是不够充分的。如果说他们要以此说明帝国主义危险和反南斯拉夫决议的正确，那也是不够的。国际因素并不能提供准确的解释，因为当时不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处决任何政治犯，这也就使拉科西等人犯下的罪行特别难以饶恕。最站不住脚的解释是他们要消灭党内的反对派。各种解释单独看来每条都有道理，但决不反映全部事实真相，即便把这些说法综合起来也说不清楚。

在1949年，匈牙利并不存在足以颠覆或严重威胁现行制度的反对派力量。唯一能使拉科西等人担心的是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反对他们。这也表现了对政权的粗暴歪曲。他们深信：如果没有他们的个人权力，社会制度的安全也就是难以想象。

这种假设是荒谬的。因为在1949年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任何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不代表别的政治路线，他们尊敬拉科西，承认他是党的领袖。尽管如此，还是这个荒诞的逻辑在案件深处起着作用。对被捕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判处相对地比较轻，对前社会民主党人一般则比较重，而被处死的只是共产党人。其中高级军官和警官占的比例特别大。诚然他们掌握武装力量，但

他们丝毫没有想以此来反对社会主义或拉科西等人的念头。绝大多数被害者是解放前生活在匈牙利国内或某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对于拉科西等人来说，他们是陌生和不可靠的。

根据我们对大多数被处决者和被关禁者的品格、个人历史、经历和政治观点的了解，毫无疑问，从长远观点看，这些人是不会赞同拉科西等人的政策和方法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拉科西等人的本能感觉并不坏。即使两方面的例外都有，但也不会改变这一点。我认识一位卓越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直至在生命结束的时刻也不理解，为什么他竟没有受到迫害。虽然他的一生经历，他在地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他的个性都注定他会成为一个受害者。我认识一家两兄弟，都当上了国务秘书，其中比较能干的一个没有受害，而另一个则坐了好几年牢。

判断是非不是我的任务，我并不确切了解事情的细节。我只想说明一下当时各种机构间的关系。那些臆造案件的实质、内在联系及其政治含义只有三、四位最高领导人，或许国家保安局首长才知道。虽然今天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但确实当时不仅政治局委员，而且案件的准备者和执行者也不了解内幕。当然，这并不能解除犯罪者和承担政治责任者应负的责任。

“事隔多年，现在回想起来倒有不少蛛丝马迹，”卡达尔说。“解放前夕，彼得·加博尔有一次对我说，将来他想领导政治警察局。当时我不明白。如果党派我去警察局工作，我就去，就象我做过的那样。但竟然有人一心乐意做这种工作，那是难以理解的。解放数年以后，彼得·加博尔开始埋怨拉伊克，说拉伊克不放手让他独立主管国家保安工作，什么事情总要插一手。以后他又提到帕尔菲和索尤姆，说他们法西斯军官的本性难改。我对他说，让这种无稽之谈去见鬼吧！但我并没有把这种说法看得太重，即使后来法尔卡什·米哈伊对这三个人几乎一字不差地提出同样指责的时候，我也没有过于在意。”

在这段时间，拉伊克任内务部长，帕尔菲·久尔吉任部队反

间谍组织的领导人，索尤姆·拉斯洛任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彼得·加博尔任国家保安局领导人，法尔卡什·米哈伊任中央委员会负责武装力量的书记。上述这些指控不过为以后更加可怕和更加虚伪的指控增加点色彩罢了。

一个星期天，拉科西请卡达尔去他的住宅，格罗、法尔卡什、里瓦伊已在那里。卡达尔立即发现，作为党最高领导的正式成员之一的拉伊克没有在场。

“后来我才发觉，要提交政治局讨论的一切重要问题，经常由这四个人事先讨论过。”卡达尔说。

很快就清楚，他们为什么没有请拉伊克去。法尔卡什·米哈伊介绍说，根据国家保安局的报告，拉伊克·拉斯洛可能是美国特务机构的人。

“起先，我在惊恐之余不知说什么好，”卡达尔说道，“我能说的仅仅是，那是不可能的。”

法尔卡什解释说，报告是从在瑞士工作的可靠的谍报员那里得到的。卡达尔提出了抗议。格罗和里瓦伊一言不发。拉科西最后结束了这场沉默寡言的讨论。他说，既然对拉伊克有这种怀疑，即使现在还不能完全核实，拉伊克也不要再当内务部长了，让他当外交部长，内务部长由卡达尔来担任。

“我立刻明白了”——卡达尔说道——“拉科西等人已在没有我参加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拉科西叫我去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当时，里瓦伊脸色苍白。恐怕我也是这样。”

1948年9月，任命拉伊克·拉斯洛为外交部长，卡达尔·亚诺什为内务部长。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卡达尔就任时曾发表讲话说：“对我来说，成功地继续和进一步发展拉伊克的创造性的工作，是一项艰巨和光荣的任务。”拉伊克则致答词说，“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我将告退。”

拉伊克当时感觉怎样，人们无从得知。他是否感到受到伤害

和怀疑，这点没有见证人和证据。但我想他并没有这样想。这不仅因为他仍然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的成员，而且还因为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经常调动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我仅在经常出现在政府名单上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举出三个例子。纳吉·伊姆雷，1944—45年任农业部长，1945—46年任内务部长，1950—52年任食品部长，1952年任征购部长，1952—53年当副总理，1953—55年和1956年当总理。格罗·艾尔诺，1945年任商业和交通部长，1945—47年任交通部长，1948—49年任财政部长，1949—52年任国务部长，1953—54年任内务部长，1953—56年当第一副总理。莫尔纳尔·埃立克，1944—47年任人民福利部长，1947年任外交部长，1950年、52年任司法部长，1952—53年任外交部长，1954—56年任司法部长。

调动职务一事本身并没有引起拉伊克的怀疑。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对他的不信任，人们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他当时无法预料等待着他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无法想象，在他毕生为之奋斗、坚信不移和引以为荣的运动中，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也是时代的特点。

但是，1949年5月20日国家保安局逮捕拉伊克·拉斯洛却意味着时代的转折。

他们公开审理了拉伊克案件，表面上做个样子。首先逮捕了瑟尼·蒂博尔和绍拉伊·安德拉什。瑟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在瑞士，战后他根据共产党的指示，与美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联系，以协助逃亡在西欧的匈牙利共产党人返回祖国。绍拉伊是匈牙利地下党员，他在霍尔蒂警察局惨遭折磨，差一点死于非命。他的妻子是南斯拉夫游击队员。

控告是以被告人的生平经历和完全编造出来的假材料作依据的。其要点有三：拉伊克及其同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的间谍和霍尔蒂警察局的特务。加在案件中涉及的国防军将军和警察上校头上的还有第四条罪名，即企图武装暴动。为了

给上面几个人增添一些色彩，被告中还有一个南斯拉夫外交官，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一位领导人和一个左翼社会民主党政治家。

可以肯定，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在拉伊克被关禁和处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仅因为作为这个案件最重要的当事人拉伊克已经死去，而且据我所知，在这以后所有有关被告也都已离开了人间。我相信，即使拉伊克还活着，他也无法说清楚当时的心情。也许只有莎士比亚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有这种本领。他们曾经酷刑拷打过他吗？很有可能。但拉伊克过去多次领教过警察局的审讯手段，从来没有做过懦夫。他们曾经用几天、几星期不让他睡觉的办法来战胜他的意志吗？他们经常迫使他的神经作一百八十度的拐弯吗？例如，有时把他带到死一般的沉寂中去，有时则把他放到地狱般的喧哗中去；有时用耀眼的强光去照射他，有时又把他放到阴森森的黑暗中去；有时对他百般折磨，有时则以同志般的态度同他谈话。他们曾以杀害他的全家威胁过他，以保全他的生命诱骗过他吗？所有这一套对不少被关禁的人都使用过。他们也象给明曾蒂似的（如此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给他用过麻醉剂吗？但那种能使人接连数日在大庭广众招供他没有做过的事情的麻醉剂是不存在的。而起诉人表现得却那样自信，以至敢让电台对审判进行实况转播。

然而，拉伊克站在扩音器面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但嘴里不停地念着捏造出来的口供，他是美国的代理人，为警察局工作的告密者，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要谋杀共产党领导人。

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在听到这种招供以后还能夜里睡得安稳的。

有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他从前是骑兵军官，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解放后成为民主军队的高级军官。1949年他曾经执行命令，指挥过对他的同

伴、朋友和上司帕尔菲·久尔吉中将的处决。后来，他自己也被逮捕。被捕后，他不抱任何幻想，只要求给他一杯白兰地酒和他应该招认的口供。谁也不要称他为犬儒主义者<sup>①</sup>。他不顾安危，为着一种事业而斗争，他并没有违背这种事业，却走上了绞刑架。

一个最普通、最现成的解释是：他们说服了拉伊克，使之相信：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需要他的口供，这案件和这些供词可以使全国人民为之震动，从而加强对敌斗争的力量。

我不相信事情会这样简单，虽然其中可能有些道理，同其他说法比较起来道理还多一些。但无论如何我要补充说明两点。一个臆造案件的主要被告，在利用他的最后发言权时说道：他或许可以免于死，但如果他不再可能是共产党员，那么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卡达尔对拉伊克的悲剧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站在法院审判厅里的是一个彻底摧垮了的人，他被剥夺了尊严、信仰、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他已被党、人民、同志和朋友们所摒弃，他所了解的世界和他所信仰的世界在他的脑海里搅拌。他唯愿一死，别无他求。因为这种生活他再也无法忍受。

卡达尔这个意见所以值得重视，因为打这以后不久，他自己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我无法揭开这个谜，这也不是我的任务。我能说的只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应该来纪念当时四十岁的拉伊克，纪念这个当年的文科大学生、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政治委员、匈牙利的共产党书记、匈牙利共和国部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纪念当时四十岁的帕尔菲，他曾经是匈牙利王国的大尉参谋、地下共产党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匈牙利共和国军队总监、中将、国防部副部长；

---

<sup>①</sup> 哲学史上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此派中人生活刻苦，衣食简陋，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号召人们克己自制，独善其身无所求，认为这就是美德。他们的这种主张后被称为犬儒主义。

纪念当时四十六岁的瑟尼，他曾经是医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组织委员会委员、党的干部部长；纪念当时三十二岁的绍洛伊，他曾经是工程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干部部副部长。纪念他们的同伴们，大家永远不应当忘记他们。生活在比较和平时期和比较安全时刻的、偏见较少的匈牙利公民，并不了解这些受害者，也不了解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因而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不愿意、也不能够忘记他们。

一个明摆着的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会相信这些令人发指的、荒谬绝伦的、与一切逻辑和常理相矛盾的控告呢？说这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供承不讳，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按照法律的基本规定，本人的招供如果没有旁证是不能成立的，而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旁证。全国在6月间得知拉伊克被逮捕的消息和对他提起的公诉，只是在9月间才听到和读到拉伊克的供词。我相信，在招供以前，只有少数共产党人不相信这个控告。然而有不少人是认识拉伊克及其被捕的同伴的。党的纪律不仅麻醉了被害者的神志，也麻醉了党员的神志。而这种纪律在那时还不是产生于命令和恐惧，而是出于信念、信仰和思想。他们还能想象拉伊克是叛徒，但不能想象我们党的领导人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事实也是，后者更难使人相信。这些令人毛发悚然的案件真相，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和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那些把共产党人说得一无是处的人才不相信对拉伊克的控告的原因所在。

“轮到我还得再等两年。”卡达尔说道。

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很明显，就要轮到他了。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个1956年以后编造出来的故事。在不止一篇文章中作为事实报道说，是他劝说拉伊克招供的。也不要相信，他作为内务部长可以了解这个案件的准备情况。那时候国家保安局不归内务部管，它是一个独立机关，直属法尔卡什·米哈伊领导。卡达尔曾对拉科西等人说过，他不相信拉伊克有罪，并对逮捕表示过抗议。我曾在前面提到，在地下活动期间他们很少见面，之后也没有密

切的联系，根据亲身的经历，他既不能驳斥对拉伊克的指控，也不能驳斥拉伊克自己的供词。

“但是我相信，我对人的认识总不会产生这样大的差错。”他说道。

起初口供中有一点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按照拉伊克的供词，他曾在一座匈牙利打猎庄园里秘密地会见过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科维奇。

“拉伊克是一个聪明人。”卡达尔说道，“他懂得不能去冒无谓的危险。为什么他们不万无一失地在南斯拉夫会见呢？”

他也向拉科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这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其他情况就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呢？

这是典型的卡达尔的思想方法。如果他认为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是不真实的，那就无法认为事物的全部是真实的。

拉科西摆了摆手，说细节问题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事情的本质，那就是拉伊克是有罪的。

那时候匈牙利已经相当阴沉的气氛，在卡达尔周围变得冰冷了，这是不足为怪的。他多次要求辞去他的部长职务，因为在这样气氛中根本无法工作。

“拉科西不了解这一点。”卡达尔说道：“有一次一个担任高级职务的同志去见他，这位同志提出，他不能胜任工作，还是让他回去当医生吧。拉科西对他也不理解，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尝到了掌权的甜头，就不会再放弃它。”

1950年6月，卡达尔·亚诺什被解除内务部长的职务，任命为党中央部长。同时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那时拉科西已多次影射说，我也不是清白无辜的。”卡达尔说道，“不仅如此，他还接连好几个月诱使我承认自己的罪行。”

一个从前经常同他见面的朋友说，当时，丝毫也觉察不到卡达尔内心的紧张气氛。表面上他照常生活和工作。卡达尔把遵守



党的纪律看作是自己的本分，这使得他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没有谈起过党的总书记竟怀疑他的副手是叛徒这种荒诞的情况。不过，照我看来，对于卡达尔说，当时遵守党的纪律也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手段。

1951年5月，他被逮捕了。

“请相信，我反而因此感到轻快了。没有再比那种经常不安定的状况要更加难以忍受了。”他这样说。

还有一种传说，不少人也把它当作事实谈论。他们说卡达尔在监狱里曾遭到各种酷刑。这是不真实的。然而他心灵上的折磨要比那更为痛苦。在逼供过程中，一刻也不让他独自呆着，两个警探日以继夜地在牢房里伴随着他。卡达尔以他自己的倔强性格，死抱着一条：不愿意招供任何人。对他的控告与对拉伊克的并没有多大区别。终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那时候，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已不再处决被捕的领导人了。拉伊克案件以后，别的案件也不再公开审判了。这又是为什么？我也不明白。

“这个判决使我万分失望——卡达尔说道，——我受到极度的精神刺激，几乎瘫了下来。”

卑鄙的谎言，对信仰的玷污，对原则的践踏，这一切他都无法继续忍受了。他本来希望会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但这与他1958年的一次讲话是相矛盾的。那时他说：

“我一生中两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看起来我快要死了。一次在1944年，另一次在那以后。对于我，尤其在1956年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卡达尔歇斯底里大发作，得了精神病等等。然而，我是一个娴静的人，经得起刺激。这是我的个性。从前，当我快该死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冷静地回顾往事，回忆我一生去过哪些地方，做过些什么事情。这在1944年没有什么困难，死就死吧！肯定人民将生存下去，苏联军队一定会到来，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但在另一次却遇到了困难。那次似乎我必须在这种处境中死去，即我的所有同事、兄弟——他们的意见为我所尊重，

我曾经作为青年工人同他们一起劳动过——都以为我出卖了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可怕的事。在那种处境下我不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我迫切希望能看到那么一天，那时人们将知道我不是共产主义旗帜的叛徒。”

我认为，矛盾只是表面现象。我能够设想，一个人在生活中饱尝了辛酸，不想再活下去，但同时希望看到有一天自己的名誉得以澄清。无论如何，在判断那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卡达尔在宗蒂街监狱里渡过了三年半时光。过去，他作为开小差的士兵卢普塔克·亚诺什，已经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当时这个监狱通常关禁着最高职务的领导人，犯人不仅与外界隔绝，彼此隔绝，而且也不允许与看守人来往。三年内卡达尔没有听到过人的声音，没有会见过任何人，也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话。

“最困难的不是头三年，而是最后半年。”卡达尔说。

在前三年，他以为这一生除了牢房的白灰墙和铁门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但这不是他最困难的岁月。最困难的是那最后六个月，这期间已经在办理恢复名誉的手续，警探和看守已称他同志；这时他已知道可能被释放，而且不仅将恢复他的自由，还将恢复他的名誉。

“在他们把我当作间谍、罪犯、敌人的奸细看待的时候，”卡达尔说道，“我还有耐心。但当他们以同志称呼我的时候，我就难能忍受下去了。如果他们知道我是无辜的，还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呢？”

那个负责办理恢复名誉手续的警官（他也是负责审讯卡达尔的人，只是当时说话的音调有些不同），一再告诉他说，同志们——这是指党的领导人——很忙，没有他们，他是什么也决定不了的。完全与世隔绝的卡达尔无法知道，那时在匈牙利党的领导人中间正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而恢复无辜被捕者的名誉也将取决于这一斗争的结果。他也不知道，国家保安局长已于1953年

被逮捕，而逮捕原因不是因为他违反了法制。

卡达尔及其同伴们的恢复名誉还有过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有一个被告顽固地拒绝撤销他自己的假口供，正是根据这个假口供他才被无理判决。他说，过去，他每一次撤销自己的口供，他的命运就坏一次。

这个无可奈何的国家保安局军官工作不下去了，只好哀求他的囚犯卡达尔，请他帮助说服那位顽固不化的被告，去承认他自己并没有罪。

“上帝保佑了他。”卡达尔说道。

卡达尔·亚诺什于1954年秋天获释出狱。那时他四十二岁。按理这对男子汉来说是最美好的时期，但是，他的头发稀少了，脸色苍白，眼冒火星，双手颤动。不了解匈牙利历史的人会这样想：他还没有去过的万丈深渊是不存在的。但并非如此。我们还将在那里遇到他。

## 走向悲剧

各种非法案件不过是个导致国内恐惧日益严重的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人不经任何法院判决遭到隔离、拘留，把霍尔蒂时期的高级官员，高级军官、警官、宪兵军官，富裕市民及其家属迁出首都，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动产。在农村建立了富农名册，而入册又往往不是根据真实的经济状况，而是出于某种纠葛、个人矛盾或一种纯粹偶然的因素。“提高警惕性”成了最主要的政治要求。出了问题不去寻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而首先去抓“敌人的黑手”。干部、车间主任，假如忘记了锁办公桌的抽屉，或者没有收拾好一份文件，就会大倒其霉。如果因此只是在“耻辱榜”上列名，他就会感到非常幸运了。谎言遍及全国。指定了一些当摆设的先进工人，用各种邪门歪道的办法让他们完成十倍的劳动定额，并要其他工人相信，如果他们努力去干，也能完成这种定额。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这种被歪曲了的思想作基础的。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家处于战争的紧张状态，拉科西一伙把现实的危险性扩大到无可估量的程度，并以此制订方针和作出社会、经济方面的决策。1950年11月成立了由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米哈伊组成的国防委员会。在以后的几年中，国家的一切重要和许多不重要的问题，都由这个连政府和党中央都不知道它存在的三人委员会决定。全国的口号是：“团结一致，紧跟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拉科西·马加什！”

不仅解放初期在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那种春光明媚的时期已不复存在。1949年，工业生产比战前最后一个和平年增长了28%，

但接着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领导上提出了一个完全不现实的目标：五年内把匈牙利现有的农业—工业结构改变为工业—农业结构。1948年决定五年计划的基建投资总额为二百八十亿福林。这个指标1949年春天提高到三百五十亿，同年年底提高到五百十亿，1950年提高到六百亿，1951年又提高到八百五十亿福林。投资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全部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二用于发展采矿和冶金业。当时的口号是：匈牙利必须成为“钢铁国家”。这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片面和高指标的计划必然会削弱轻工业、服务行业和农业，亦即削弱一切为居民消费服务的部门和行业。

1948年的农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80%。他们想通过强行加速合作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拉科西说：“我们应当在三、四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到使90%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集体合作中耕种土地的程度。”

除了这句话令人吃惊地不象匈牙利话外（当时，这种水平低劣的宣传手册所惯用的术语曾广为流传），这一目标如同高速度的工业化一样，只是一个梦想。1953年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占全国耕地的38%，劳动力占全国农业劳动力的32%。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强迫组织起来的，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人的悲剧，也损害了集体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信誉。

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的增长并没有解决农业增产的问题。大多数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是最穷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缺乏生产经验。他们没有足够的牲畜，几乎没有机器，收割的70%依靠手工。同时，不委派懂行的人担任领导，只要政治可靠或者他们认为政治可靠就行。合作社种什么、产多少都由中央机构根据各种考虑作出决定，完全不顾合作社本身的条件。这样，农民几乎只看到集体经营的短处，而不大感到它有多少优越性。五十年代初，合作社农民的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同单干户收入的下降幅度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用高压手段也不能迫使大多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原因。

他们想方设法加重农民的负担。实行了义务交售制，交售的指标越定越高，收购价格却越来越低。对“抵制”义务交售的人可判处三年以下的徒刑。他们根本不考虑农业往往一年丰收另一年减产的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例如：1952年气候很不好，许多地方连口粮都收不上来，可还是提高了义务交售量。那几年不少农民跑到城里去买面粉、家禽和鸡蛋，以完成交售义务。

事情搞糟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在这个问题上富裕农民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七万户家庭被列入富农名册，对他们规定了高额的税收和交售义务，许多地方没收了他们的机器、经济建筑物，以至住房。这些措施的结果只能使生产再次下降，往往达到同原定政治目标相反的结果。大多数从前的雇农、一无所有的短工，虽然他们并不喜欢那些对自己专横刻薄的富裕农民，也为这种不公正、不人道的迫害愤慨不已。使他们特别气愤的是，为数不少的勤劳正直的中农也被列入了富农名册。

所以，即使发布了种种禁令，凡是有办法的人都逃离农村，便不足为怪了。这些禁令之所以发生不了作用，还因为迅速发展的工业需要劳动力。到1953年为止，仅从生产合作社就有十万农民转入各个工业部门。不寻常的是，农民往往不惜抛弃曾经为之奋斗了几百年才得到的土地。当时全国有三百多万霍尔特荒弃的土地无人耕种。

灾难性的农业形势自然要影响到城市居民。1951年许多基本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开始实行凭票供应，商店门前又排起了长队。当时我在当兵，不得不从兵营里给家里带面包。经常调整劳动定额实际上意味着降低工资，年年发行的和平公债实际上就是苛捐杂税。1952年职工的实际工资比1949年下降了20%。

但是，国家的整个气氛并不像经济和政治形势那样坏——我这样说并不是对过去的美化，也非出自青年人的浪漫——，这要归功于当时全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双重心理。共产党员虽然有的亲属、朋友被捕，但他们知道，匈牙利无论如何总是在向社会主义

方向发展。卡达尔也说，他在监狱里曾经想过，虽然自己是个囚犯，而且看样子将作为囚犯死去，但匈牙利毕竟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这比他个人的命运更加重要。农民虽然每天得不到多少面包，但他们的子女可以上中学和大学，这在从前是无法想像的。工人虽然减少了工资，但他们的兄弟当了厂长、军官。1951年，二万五千名担任领导工作的国家干部中，解放前是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占了一半以上。三年之后，中央统计局调查了十八个工业企业、三个州和八个部领导人的社会出身。十八个大企业的一千五百名领导干部中工农出身的有一千人。三个州的二百八十名各级政府领导人中有二百人以前是工人、农民。八个部的领导干部中，过去做过工的占40%。社会阶层的这种大规模的变化，掩盖了新制度的许多不幸的过错。

实行了普通小学八年义务教育制。1953年，中等学校入学人数比1937年增长了一倍半，65%的学生家长是工人和农民。大专学生增加了两倍半，55%为工农子弟。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几年以前体力劳动者的子弟几乎不可能上中学、大学读书的国家里。此外有四万三千个成年人在高小读书，以弥补儿童时代失去的学习机会，二万四千名职工上中学，九千人上大学，三十万没有文化的工人被培训成为技术工人。

同1938年相比，书籍出版量增加了两倍，解放前昂贵的书籍，现在只要花几个非列就能买到。1953年全国有一万个公开开放的图书馆，发出借书证一百万张；实际上每个乡村和工厂都有自己的图书馆。1949年到1953年电影院增加了两倍，这首先是由于偏僻的农村也通了电的结果。青年和老人在一万八千个业余文艺小组里唱歌、跳舞和演戏。

我清楚地知道，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得到文凭和担任领导职务，这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由此后来还造成了不少人的悲剧。我也知道，工人、农民从图书馆、电影院和文艺队回到家里就咒天骂地，因为他们没有面包，没有肉、

牛奶和皮鞋，因为又提高了劳动定额和义务交售额，因为他们这些每天受到报纸赞扬的“劳动人民”，又受到了傲慢自大和没精打彩的干部们的冷遇。但是他们还是一再去借阅图书，看电影，唱歌跳舞，因为他们知道，在旧社会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即使他们中间有的人过去挣钱比现在多。

孩子是最大的推动力。当时拉科西宣称，“不要在今天吃掉明天会下金蛋的母鸡。”这就是说，为了打好明天的基础，今天要勒紧腰带。马克思把它称之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拉科西的口号则完全是实用主义，在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制造理论根据。但是群众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不像拉科西那样考虑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孩子就是未来。为了下一代甘愿付出一切，牺牲他们的工作、土地、工资和血汗；为了下一代甘愿忍穷挨饿，以至接受不公正的待遇。几年以前，大多数工人和农民把子女能当上邮差或铁路工人看作毕生争取的目标。后来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虽然新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陷，但毕竟他们的子女已有可能当工程师、医生、会计、部长和大学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大林确实是人民的领袖；他懂得人民愿意为未来承受苦难的心理。而拉科西只是寻找娓娓动听的论据和口号来掩盖现实。

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都伴随着极度的痛苦。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表明，它像分娩前的阵痛一样无法避免。

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识别和觉察人民疾苦，不仅是道义责任，而首先是政治责任。这正是列宁的一个伟大之处。对我来说，政治家是否在家里同人民一起流泪，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在政策中体现国家和阶级的疾苦。我控诉拉科西及其一伙，并不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古木环抱的花园别墅里，而老百姓却不得不几家合住一套房子；也不是因为他们享用美酒佳肴，而老百姓连猪油都难见到，几代人也没有见过巧克力、柠



檬。我不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会同受饥挨饿的英国人吃一样的饭，同他们一起钻进简易的防空洞躲避飞机轰炸，像他的同胞一样凭票证购买衣着。但他忠实地代表了大不列颠的利益，在世界大战那个对英国来说最灾难性的时期里，他领导了这个国家。

不错，作为接受人民政权原则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我们期待于他的是另一种生活观。但是拉科西一伙的罪恶首先不在于生活上没有同人民同甘共苦，而在于他们无视国家的苦难，甚至要求别人也象他们那样装出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的样子。由此，谎言成了司空见惯。但是，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制度里，人们都极难忍受谎言，在宣扬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尤其如此。

拉科西个人的特别罪恶是：虽然他自己坐了十六年的监狱，只是由于世界各地同志们的声援才得以免受绞刑，但他却毫不犹豫地一个个清白无辜的人投入监狱，送上绞台。他可以不这样做吗？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仍然认为，他可以不这样做。我不相信，历史竟不能给领导人提供任何选择和活动的余地。我不同意认为个人在历史上不起任何作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所谓个人迷信时期就是一个最好的反例。那时候天天宣传这一理论，而同时无限的权力却独揽在个人手中。我认为，斯大林本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但把所有的过错和成就都记在他的名下，而不究其经济、社会、政治和历史根源，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二十世纪一个最神秘的、迄今还没有给予认真分析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sup>①</sup>约·维·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享年74岁。他的去世震撼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共产党几乎立刻改变了斯大林的政治路线。这一变化对匈牙利的政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953年6月的决议中谴责

---

<sup>①</sup> 本书原文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书记”。

了个人迷信、缺乏集体领导、削弱工农联盟以及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必须大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根本改变轻重工业的比例，对农民提供大量的援助，并减轻他们的负担，大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决议。如果执行了这个决议，匈牙利肯定会避免1956年的悲剧。

中央6月决议提名的新领导人成了全国注意的中心。当时五十七岁的纳吉·伊姆雷<sup>①</sup>接替了拉科西·马加什担任的匈牙利总理的职务；拉科西继续担任党的第一书记。

纳吉·伊姆雷身材矮胖，戴一副眼镜，看上去象个教授。其实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做过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俘虏，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曾经被捕；1928年流亡到苏联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在苏联播音的科苏特电台的负责人之一。他同格罗、法尔卡什和雷瓦伊一起是战争期间从莫斯科回到塞格德<sup>②</sup>建立公开的共产党组织的四人领导小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纳吉是格罗的副手，可见他是流亡组织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45年起任党的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不赞成勉强搞合作化运动而被免去这个职务。在下一届党代会上纳吉再次被选入政治局，并从1950年起任食品部长，后改任征购部长，也就是说，担任了他在一年前不赞同其政策的那个部门的头号行政长官。我不了解细节内情，不知道纳吉是否改变了他的观点，也不清楚为什么他又回到了政治局。

虽然他从1945年起就担任领导工作，1952年出任副总理，但直到1953年全国才真正熟悉他的名字。那时，纳吉·伊姆雷立即以农民政治家和民族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不仅是因为可能他在农民政策方面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并且更加注重民族

<sup>①</sup> 纳吉·伊姆雷 (1896—1958)，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58年被匈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处决。

<sup>②</sup> 匈南部城市。

特点，主要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群众感到拉科西政策中缺少的正是这些特点，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期望接替拉科西担任总理职务的人奉行这些原则。1953年匈牙利政治领导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发生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出于世界政治、个人和政见等方面的原因？纳吉的观点、改变了的党的政策以及公众舆论的压力，在这一变化中又起了什么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相信历史学家总有一天会搞清楚。我现在能够肯定的只是，拉科西同纳吉持续三年的倾轧，不幸的派别斗争，把国家卷入了重重灾难。

起初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没有公开，反而竭力宣传党是团结一致的虚假的神话。然而也正好是它，最后成了共产党获得新生的决定性障碍。在1953年7月举行的布达佩斯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拉科西·马加什和纳吉·伊姆雷都作了报告。我记得十分清楚，全国都收听了实况广播。大家听到拉科西仍然主张要加强工业生产，纳吉则强调党中央6月决议中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居民消费的部分。后者无疑更加受到全国的欢迎。这时，人人都已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区别，而他们自己都装作似乎完全一致的样子。

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4年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护团结的假象。大会上，纳吉·伊姆雷以团结的名义致开幕词，拉科西·马加什也本着同样的精神致闭幕词。纳吉说：“我们党在原则和政治上的团结，是我国劳动人民和我们美丽的祖国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基石。”拉科西则说：“团结就是力量。所以，我们要像爱护和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去捍卫我们党的坚强团结！”

我并不怀疑拉科西和纳吉对原则的忠实，也不怀疑他们两人都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看到自己的历史作用。拉科西很可能认为，他代表了苏维埃共和国以来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法统。共产党人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一运动代表了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我并不认识拉科西，只是象所有匈牙利公民一样，不计其

数次地在群众大会和新闻纪录片上看到过他，听过他的演讲。他没有魅力，但是一个聪明和狡猾的政治家。在日常政务的处理方面远远超过了纳吉·伊姆雷。可以肯定，在这方面他那享有特殊声誉的个人经历对他也是有利的。

我同纳吉·伊姆雷见过几次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为人严谨、矜持，是一个经常对自己的原则冥思苦索的政治家。今天，我再次阅读他1956年春夏写的文章，对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简直无法理解。他的遣词和文风同拉科西的没有多少区别，思路也一样。在1953年他很可能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这样的角色：由他来证明，那个迄今同拉科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政策，即匈牙利有能力新生，是可以实现的。

在事过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我认为，最大的不幸是拉科西和纳吉都没有觉察到，只有扎根于匈牙利现实的那些人，才能代表匈牙利激进派、左派和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连贯性，并使它获得新生。而他们自己，由于度过了长期的监狱和国外流亡生活，对匈牙利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俩人的合作和历史分工都是不幸的。对于他们来说，政治与其说是领导国家，不如说是幕后斗争。

那个正确的纲领曾经初见成效。有的地方栽种了葡萄和果树，而栽种葡萄和果树的人必然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因为果园只能在几年后才有收获。1953年秋天，市场商品供应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职工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20%和10%。解散了拘留营，停止了移民，取消了即决审判。国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人们不仅减少了恐惧，而且出现了劳动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看到了工作的意义，视之为未来的保证。爱伦堡在他那部世界著名的小说中把这种现象称作解冻。

但是，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尽管出现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1953年对于共产党员和其他左派领导人曾经遭到非法审判的这种不公正行为，谁也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话。拉科西清楚地知道，他的任何错误都可以得到谅解，但如果被人觉察，

对那些清白无辜者的处决、监禁和逼供都是按照他的指示或者在他知情的情况下干出来的，他就会彻底垮台。

历史对惨案牺牲者的生命和无边苦难的报偿是拉科西的倒台。拉科西一伙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无法逾越牺牲者的遗体，磨灭人民对死者的怀念和解释降临在受害者头上的千古奇冤。这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人们经常说起这样一件事：一次，拉科西接见一位刚获释出狱的党的领导干部。听了他的汇报后，拉科西问道：“你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

故事显然有点夸张，但它道出了实质。拉科西一伙装作对假案一无所知，似乎只有彼得·加博尔<sup>①</sup>一个人要对此负责，他们也受了他的蒙骗。

卡达尔恢复自由后不久，拉科西召见了她。

“见面时拉科西说，他看到我很高兴。”卡达尔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并不高兴看到他。我高兴的是我还活着，而且已经不在狱中。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不大了解。我有满腹的怒气，但不愿任意发泄。现在国家怎样？人民生活得怎样？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统统不知道。”

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卡达尔是从一位匈牙利女作家的小说里迟迟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的。

拉科西问卡达尔愿意干什么工作，好像可以任他自由选择的样子。

“我告诉他，迄今为止我有过三个职业，我在内务部工作过，但现在对此毫无兴趣。”

拉科西插话说，目前这也不现实。

“我当过工人，我想我现在还可以适应这个工作。”

拉科西说，这也不可能。

---

<sup>①</sup> 1956年以前，彼得·加博尔曾任匈牙利国家保安局局长。

“这点事先我当然也估计到了，他不会因要安排我到钢铁工厂去当工人才召见我。后来我告诉他，我还做过党的工作。”

拉科西说，这是一个合适的工作。布达佩斯有两个区的区委书记正好空缺。他问卡达尔，到八区还是到十三区去。

“我告诉他愿到安焦尔费尔德<sup>①</sup>去。事后才听说，那个区也不缺书记。他们给我安插了一个位置。”卡达尔说。

上午卡达尔办公。下午，那些对现领导不满的人接踵而来：共产党员、前社会民主党员以及资产阶级左派政治家。有的前几年坐过牢，有的当过部长。拉伊克已不在人世，法尔卡什的地位正在下降，里瓦伊重病缠身，格罗习惯地沉默不语。卡达尔的政治作用在日益增强。

拉科西没有愚蠢到连这点也看不清的地步。他用提职的办法来限制卡达尔的活动，任命卡达尔担任佩斯州的党委第一书记。卡达尔表示不赞成这个决定，请求继续留在十三区工作，因为他在那里长大，那里有许许多多他熟悉的人。拉科西没有让步，卡达尔非离开不可。

这是1955年的事。当时，在1953年的正确纲领和经过了一段令人鼓舞的发展时期后，政策又一次失败破产。首先由于工业政策考虑不周，加之决议执行得不够彻底和前后矛盾，使经济形势再度恶化。但最大的问题是党的领导分裂，八十五万党员不知所措。1954年，局外人已经看清了拉科西和纳吉之间的个人争斗。一部分党员还信任拉科西。他们不了解他在非法审理的案件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很多人自己对地方上的违反法制行为，或至少对盲目执行错误政策的做法负有责任。一部分党员把所有的积极变化都归功于纳吉·伊姆雷。今天是这种路线，明天是那种路线，近百万党员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该听哪一个才好。而一个又一个声明、一个又一个指导原则最后都没有得到执行，从而

---

<sup>①</sup> 安焦尔费尔德即布达佩斯十三区。

更加丧失了讲话的信誉。两个领导人及其集团的权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一场全国性悲剧的发生。

最大的难题显然在于，国内大部分人已失去了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同时也看不到任何足以恢复遭到多年损害的信任的纲领。而没有信任和信誉要领导国家是很困难的，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拉科西的过错和谎言已经多得失却了人民的信任。纳吉玩弄手段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卡达尔还不为全国所了解，他的处境不能使他对政治决策有多少发言权。

与此同时，那些仍然没有调查清楚的案件，虽然从不公开提及，却越来越受到群众舆论的关注。恢复了自由的无辜入狱者越多，全国对这个问题越关心。

最后，历史迫使拉科西不能对此继续保持沉默。1955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以解决两国、两党的关系问题。此后，在当年参加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的各个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撤销了情报局1949年严厉谴责南斯拉夫的决议。

现在该轮到匈牙利解决它同南方邻国的关系了。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澄清拉伊克案件，因为案件中的大部分指控，是对准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于是，1955年夏天——即1953年的决议发表后两年——拉科西不得不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及这一案件。但他企图继续维护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讲了假话。他没有公开承认拉伊克是无辜的，甚至还以所谓拉伊克向党隐瞒了很多事情来为自己辩护。在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拉科西重复了对拉伊克的这一诬蔑，并且声言，是彼得·加博尔一伙想用拉伊克案件来诽谤中伤南斯拉夫。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及明显为自己的作用和责任辩解的做法，已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满意。对拉科西一伙的不满与日俱增。

这时拉科西集团在党的领导中再次掌握了绝对的权力。1955年4月，中央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免

除了他的总理职务。当时三十三岁的赫格居斯·安德拉什担任了新总理。在那些年里，拉科西的策略是，把一些相对年轻、无名和缺乏经验的人放在领导的最高层，他们对他的地位不造成威胁。同时免去了法尔卡什·米哈伊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此人在1953年不知怎么竟成了纳吉·伊姆雷的热情拥护者，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以后他又回到了拉科西一边，但已无济于事。12月，纳吉·伊姆雷被开除出党。

苏联共产党1956年2月举行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解决了匈牙利党解决不了的问题。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决议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肯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重要性。赫鲁晓夫在他著名的讲话中第一次详细地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严重违反法制、个人迷信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

1953年以后，对匈牙利政治来说，这是第二次摆脱困境的机会。卡达尔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匈牙利党能及时从二十大中得出结论，1956年的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在这个时候拉科西还不甘罢休，他把个人权力看得比国家和党的利益还高。这是他的致命罪过。他在汇报出席苏共代表大会经过情况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竟然说，二十大证明了匈牙利政策是正确的。在谈到二十大揭发的种种错误时，他说，匈牙利党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虽然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批评了他的政策——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但当时拉科西还有足够的权力去实现他的意志。他在全会上总结说，“我认为党的威望正在增长。”

这是谎言和自欺欺人的做法，以此为基础的政策只能导致灾难。二十大之后又经过了艰难的五个月，但匈牙利领导在任何根本问题上都没有作出决定，全国的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很多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开始公开抱怨。有的党员会议，因为发言的人太多，持续开了三天。此时已有许多基层组织提出要撤换拉科西。



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对现状不满的工人同武装部队发生了流血冲突。对于匈牙利党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最后警告。七月，人们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拉科西·马加什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补选卡达尔·亚诺什和马罗山·久尔吉参加政治局。卡达尔同时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

新当选的中央委员被请到中央委员会议事厅。卡达尔在主席台上就座。台下，坐着法尔卡什·米哈伊。全会上提出了将法尔卡什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清除出党的建议。法尔卡什发言为自己申辩，企图把一切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最后，他竟然放声痛哭起来。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法尔卡什的党籍。

卡达尔说：“我看他弯曲着身子离开了会议厅，我对他毫不怜悯。”

全会通过的决定有三个严重缺点，正是由于这些缺点，决定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首先，作出这个决定已经为时过晚，它已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其次，决议只以健康状况不佳作理由解除了拉科西的职务，并没有公开揭露他的错误和罪过。第三个致命缺点是，选举了拉科西最亲密的同事格罗·艾尔诺继任党的第一书记。期待格罗来彻底清算过去的错误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格罗的当选使国内大多数人都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即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拉科西集团手里，而这个集团的信誉当时已丧失殆尽。

有人认为，如果七月选举时不是格罗，而是卡达尔当选为党的领导人，十月悲剧就可以避免。卡达尔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卡达尔说：“事后分析当时的情况，照我看来，即使这样的一种人事变动也已无法阻止一场大灾难的发生。”

事态已经发展到十分紧张的程度，而留下的时间实在太少了。7月间，卡达尔已经无法挽回局势，虽然如果当时由卡达尔，而不是由格罗担任党的领导，可能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不过，这会使卡达尔一旦在历史的要求下走上舞台时要承担更大的责

任。

格罗一伙几乎没有改变先前的做法，他们甚至窃听卡达尔的电话，拆查他的邮件，以至卡达尔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为此提出抗议，就是一个证明。国内形势日趋紧张，但格罗对此并不关心，却忙于向盟国的领导人解释新领导的良好意愿。党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中国、苏联和南斯拉夫。

10月6日，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隆重安葬了拉伊克·拉斯洛及其他烈士的遗骨。马罗山·久尔吉回忆说，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卡达尔提出要举行隆重葬礼，格罗听了很不耐烦，他同总理和内务部长小声嘀咕了一会后说，不知道遗体埋在什么地方。

成千上万的人在棺木前默哀致敬，悼念那些为被曲解了的人民政权牺牲了一切的烈士们。他们不仅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捐弃了自己的荣誉、名声和原则。参加这样的葬礼，目睹这人潮人海，只要有一点特殊的政治敏感，你就会意识到，这肃穆悲愤的礼仪就是匈牙利悲剧的序幕。不能不承认，当时我们许多人都缺乏这种敏感性。在狂热中燃烧的国家还没有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墓穴的边缘。但是，悲惨的葬礼毕竟引起巨大的震动。政治局当晚召开会议，决定建议逮捕法尔卡什·米哈伊。几天以后，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恢复了纳吉·伊姆雷的党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

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如此可悲，原因之一在于，事件中许多互不相关、彼此截然矛盾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许多真理不仅在当时，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在人们的头脑里互疑互斥。

卡达尔在他六十寿辰时曾经精辟地指出：“1956年出现的严重和危急局势，人们科学地称之为反革命。我们知道，这是对1956年发生的事件的科学论断。但是，还有另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概念：这是一次民族悲剧。对于党，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对于某些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迷失了道路，从而走向悲剧。”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称一次反革命为民族悲剧，这表明，它是一个多

么复杂的进程。

国家和人民的情绪也是同样的复杂。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信仰坚定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有的始终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有的后来却成了极端分子的代言人，甚至成了极端的反共分子，企图以此在公众舆论面前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开脱；正直诚实的人，他们把党的每一个决议，决议的每一个字，都看作不可批驳的真理；野心家，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能过好生活；老地下党员，他们蹲过霍尔蒂的监狱，也坐过拉科西的牢房，仇恨满腔；老地下工作者，他们同样坐过各种监狱，但当社会主义制度遭受威胁的时候，毅然拿起了武器，即使要同过去看守他们的狱警并肩战斗也可以；国家保安局的军官，他们曾经根据上边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折磨过共产党人，但是省悟后竟悔恨自杀；国家保安局的警探，他们曾以施刑为乐，一遇机会便逃往国外；工人出身的经理、厂长，他们有的出类拔萃，有的缺才少德。有的工人继续做工，保持本色，即使粗茶淡饭，也不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有的变得冷漠无情或者起来造反。一无所有的农民，有的从前靠洋葱、面包度日，不知挨过宪兵的多少耳光，但社会主义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只是他们的子女成了医生、工程师或教师；有的自己挨过宪兵的耳光，后来却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的同伴。知识分子，有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党员，有的受不了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的良心责备；有的当时出于一时的冲动顷刻间成了社会主义的信徒，后来又突然变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解放时候的青少年，起初热情奔放，后来岁月艰难，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感到，出身比本人更重要，言论贵于行动。

我不再继续列举下去了。

还有失掉了工厂、小工场和地下室车间的资产阶级；在旧社会穿白衬衣、系领带，在上司面前点头哈腰的当年的中产阶级分子，他们现在不系领带，因为这已经不时髦了；还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们有的曾被关进过拉科西的监狱，有的当了部长，不

一定前者是坏的政治家和不正直的人，反之也不然。有的教师没精打彩地向青年人灌输一些启齿都要感到羞耻的空话；有的教师在这些年月里仍然喜欢并且教育学生们热爱韦勒什毛尔蒂①、奥地②、科苏特③、拉科齐④，热爱数学和生物学。这方面的人物我也不再列举下去了。

有的人利用了种种可能性，有的人滥用了种种可能性，有的人被剥夺了种种可能性。有的人心向着他们的家庭和阶级，思想向着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刚好相反。有的人天真、轻信、易于失望，这不能责怪他们。有的人被告知，一切都是完美无缺；当他们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时，就不知所措，或者起来造反。这也不能责怪他们。

敌人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自始至终仇恨新制度。有的则从1947年、1948年或1949年开始反对新社会，各人的情况不一。还有的从1955年或从1956年开始成了敌人。有的人伺机报仇已经等了整整十年；有的人则已承认失败。有的人按照他的信念本来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但还是拿起了武器反对社会主义。

10月17日，匈牙利作家协会党组通过决议，要求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10月22日，全国几家最大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决定重新成立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小组建议吸收纳吉·伊姆雷参加最高领导。布达佩斯工业大学通过决议：次日举行声援波兰共产党人的群众游行。一天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曾在1949年被非法逮捕的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工业大学要求游行示威的号召得到了在布达佩斯的其他大学的响应。

这时，党和国家的最高当局竟没有一个人留在匈牙利，他们

- 
- ① 十九世纪爱国诗人。
  - ② 二十世纪进步诗人。
  - ③ 1848—1849年革命的领导人。
  - ④ 十八世纪民族英雄。

去南斯拉夫谈判已经一个星期了。这是格罗的一个严重错误。不管解决同南邻的关系何等重要，在这种时刻国家不能没有领导人。10月23日清晨，领导人从南斯拉夫回到国内。留在家里的其他领导人在车站迎候，并要求当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格罗目瞪口呆，几乎不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于是，从车站直接驱车至党中央。格罗、卡达尔、里瓦伊、赫格居斯坐在主位，政治局其他成员分居两侧。首先格罗罗嗦地介绍了在南斯拉夫的会谈情况。他仍未意识到国内局势已经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中途，不断有人来到会议室。他们并不是政治局的成员。这种现象成为以后两个星期里的特点：职权范围日渐消失，任何偶然在场的人都可以参与作出决定。政治局决定不准游行，但也没有给武装部队下达可以开枪的命令。会上指定一些政治局委员去各团体、机关解释政治局的决定。卡达尔被派到广播电台和全国总工会。卡达尔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离开党中央大楼以后，内务部长声称：如果得不到允许开枪的命令，他无法接受阻止示威游行的任务。最后，在场的人还是作出了同意游行的决定。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也为以后所常见。卡达尔说服了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他们终于相信：同意示威游行是错误的。之后，他又赶到全国总工会。在那里，除了向工会领导人解释党必须依靠工人群众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工会领导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卡达尔。卡达尔接到电话通知，要他赶回党中央。晚上七点钟左右，他从全国总工会回到党中央大楼。其间，政治局已经决定：当晚八时格罗发表广播讲话。

“对于城里发生的情况，当时我并不清楚。”卡达尔说。

开始，只有几千名大学生参加游行，但是群众队伍很快就增加到十来万。他们兴高彩烈，欢喜若狂；一边唱歌、呼口号，一边挥舞旗帜。队伍穿过了整个城市。我还记得当时的几句口号：“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错误我们已经厌烦，新经济政策赶快实现！”“苏匈友谊一平等，自由！”队伍来到贝姆·尤若夫的纪念碑前，作家协会主席

发表了简单讲话，但什么也听不清楚，队伍又来到国会大厦，充塞了大厦门前的整个广场。群众要求纳吉·伊姆雷给大家讲话。

纳吉没有来。这时群情激昂。前农民党的一位著名领导人来到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广场上嘘声大作，使他讲不成一句话。群众继续要求同纳吉见面。

据说，纳吉让十来万群众等候了几个小时，扬言只有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请求，他才肯出来向群众讲话。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确实，但看来是可信的。

派出了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去请纳吉。后来，纳吉·伊姆雷终于来到国会大厦。广场上原来人声鼎沸，纳吉一出现在阳台上，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纳吉从我身旁走过，我发现他神情焦虑。

“同志们！……”纳吉开始讲话。这时，突然嘘声四起，淹没了他的话音。人群里传来有节奏的喊叫声：“我们不是同志，我们不是同志！”

相形之下，以后纳吉讲了什么话，就无关紧要了。他在随同人员的簇拥下一边咬着胡子，一边从阳台走进屋里。我难以想象，此时此刻，这个四十年来习惯了同志称呼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未免过于轻率。事情并非如此。当时我也站在广场上，曾经同群众一起游行。游行人群中我认识几百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我也曾看到，成千上万的游行者确实实在为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时期欢欣鼓舞。当然，有的地方我也看到，国旗中央的人民共和国国徽被挖掉了，也听到了当时还会立即遭到斥责的口号：“俄国佬，滚回去！”

广播电台门前发生了武装冲突。究竟谁开了第一枪？这个问题许多人长期争论不休。二十五五年后的今天看来，出现这种争论是令人费解的。在电台受到袭击的时候，国家权力机关试图以武力保卫广播大楼，这有什么过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样做。但是，在匈牙利还要长期向人们解释，电台的警卫部队只是

进行了回击。似乎只有回击才是美德，相反就是过错。

这是十月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1956年，匈牙利每个诚实的共产党人，每个正直的领导人，都在为拉科西时代的罪恶受到良心责备，即使他本人并没有参与罪恶活动，甚至可能是罪恶的牺牲者。他们无法逃避这种集体责任感的折磨。然而，当时人人都已知道，或者已经觉察到，所有这些罪恶推促了起义的发生。至于其他原因，只能在后来才弄明白。领导人一开始就竭力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阻止这次起义。我认为，在这方面，这种集体的罪恶感和对暴力的恐惧与嫌恶，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领导人的愿望可以理解，他们的目的却无法达到。相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事实上，广播大楼门前开第一枪的是进攻者，许多文件和目击者的回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当时也在现场。晚上，有几个人来到国会大厦，手里拿着几颗子弹壳。他们嚷嚷说，国家保安局的武装人员正在电台附近枪杀群众。于是，决定派出小组去电台了解情况。直至今日，我也说不清楚，这是谁作的决定，我为什么竟也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由此可见，当时的气氛已经混乱到了何等地步。

我们走出国会大厦，在大厦门前的广场上拦住了一辆飘着红白绿三色大旗<sup>①</sup>的卡车。至于这辆卡车的来历，它为什么竟然服从了这个七拼八凑起来的小组的命令，我也弄不明白。总之，卡车把我们送到了广播大楼。确切地说，把我们送到了大楼附近，因为，已经有人推倒和焚烧了几辆汽车，堵住了通向大楼的道路。

我们一边挤过人群，一边高声说道：“我们是从国会大厦来的，请让一让道！”“小心点，他们在射击！”一位在人群中偶然遇见的朋友大声向我叫喊。我当过兵，能够辨别子弹飞过的嗖嗖声。国家保安局的部队守卫在电台大楼两侧，战士们枪上已经上了刺刀。

---

<sup>①</sup> 匈牙利国旗。

群众涌向警卫部队。我不知不觉地挤到了人群的最前列，于是我们喊着“挽起胳膊”，因为否则人群会把我们推到战士的刺刀尖上去的。我们同时向指挥警卫部队的一位青年军官呼喊，要他命令战士后退，因为刺刀已经指向我们的胸膛。军官握着手枪站在战士的前列。他也放大嗓门，用吼叫来回答我们的呼喊，要我们让群众安静下来，因为有人在向他的战士开枪、掷石块。我们只能相互大声呼喊，否则根本听不清对方的声音。其时，子弹嗖嗖飞过。不是国家保安队员在射击；他们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离开他们只有几公尺远，看到许多战士在哆嗦，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出于恐惧。不久，大楼里传出命令，战士们下了刺刀后退下去，最后闭上了大门。瞬间，群众拥满了整条大街。

当时，数以千计的人群聚集在电台周围。可能各人的记忆不同，但是，到过那里的人都还记得，一支配备了坦克车的国防军机械化部队曾经开到电台。我们“调查小组”的组长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是在军事学院教授文学课的高级军官，他设法要会见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但遍找不着。谁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记载事件经过的文件和回忆录里可能说法不一，但可以确信无疑的是，这支队伍并未配备任何弹药；坦克也好，手提武器也好，都是空枪空炮。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徒手驱散包围电台的群众。

这时，我们已经回到国会大厦。“调查小组”的成员只剩下一半，其余的都已消失在人群中。我最终也没有弄清楚，我在小组里的伙伴究竟是些什么人。国会大厦门前的广场此时已经空空荡荡；大楼里一片寂静、漆黑。警卫不准我们进去，说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于是我们决定到附近的党中央大楼去，但中途也被便衣警卫挡住了去路。他们虽然彬彬有礼，但神情紧张：“走远点吧，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他们对我们这样劝告。

我们当然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这时正在党中央大楼举行会议。改组了政治局。纳吉·伊姆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当夜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凌晨，纳吉在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他称这次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宣布实行即决审判，声称政府已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部队协助平息叛乱。

1956年10月23日，一方面，成千上万要求和渴望革新制度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一方面，武装分子占领了电台、国际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

24日清晨，我又回到广播电台。夜间，起事者占领了广播大楼。从那时候起，电台改从国会大厦播音，那里有一条通向电台的专线，但只有一个话筒，一个安装在旧收音机顶上的电唱机；一间传达室权充作播音间。广播大楼出入自由。我看见大楼院子里躺着一具具尸体。都是国家保安队战士，几乎个个都比我年轻。僵硬的尸体一个叠着一个，象篝火的一根根本柴棍。

匈牙利的大多数历史撰写者都把10月23日的武装攻击说成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和执行的行动。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事件爆发得如此突然，以至事前根本无法周密准备。诚然，当时匈牙利肯定有受过良好训练、领受了相应指示的外国特务间谍在活动。匈牙利的各种地下组织无疑也有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群众的示威活动，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我不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全面、精确和有领导、有周密准备的计划安排下发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本领高强的秘密组织能够制订和执行这种计划。

在请求苏军进驻的问题上，我同许多国内外的看法也不一样。据我看，匈牙利领导的错误不在于11月4日向苏联提出了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如果要拯救社会主义制度，那时已别无他法。但是，10月23日夜请求苏联干涉则是一个错误。当时如果匈牙利武装部队能够得到明确和果断的命令，也许还能控制住局势。由于前几年的严重错误，本来就不团结的领导集体失去了自信心，而缺乏团结和自信也促成了这场灾难的发生。因为，他们认定，匈牙利共产党人和武装力量已经无所作为。然而，10月23日、24日的情况并非如此。

当我向卡达尔问起这几天的情况时，他字斟句酌地回答我的问题。要说清楚难于理解的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的。

卡达尔说：“不仅我个人，而且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当时出现的局势。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可以借鉴。人们清醒过来，恢复理智，需要有一段时间。”

1957年5月，卡达尔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讲话，显示了他的政治和道义胆略。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的形势。出现这种形势是领导的耻辱，不是人民的污点。当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中央的命令、指示和领导，他们要求得到武器，他们比我们这些身居领导的人更懂得该怎么办。但是，我们没有诚实地给予指导，而这是当时形势下领导所必须做到的事。”

事件发生的头几天，指挥这个国家的还是党的领导，后来，重心越来越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纳吉·伊姆雷无疑是1956年10月的关键人物。终于出现了共产党的总理为反革命推波助澜的可悲局面。

实际上十天来领导人都没有离开过国会大厦，这使得事态更加混乱。他们只是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了解城里发生的情况，而得到的又都是，也只能是一些片面的消息。

10月24日，政府宣布禁止集会并实行宵禁，要求起事者放下武器。但是决定没有产生效果，宵禁令一再停止执行，放下武器的限期也一再推迟。

10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免去了格罗的职务，选举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起初，一部分青年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大部分参加者都怀着崇高的目的。但是，由于混进队伍里的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插手，几个小时以后，这次游行变成了反对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武装进攻。必须击退这次进攻。当务之急是恢复秩序，恢复和平建设劳动的环境。必须毫不延误地解决各种问题。”纳吉在同一天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也称这次事件为反革命。

10月28日，党的领导由一个六人主席团接替，卡达尔是这个主席团的主席。党的领导经过两天的讨论，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的对手曾经不止一次地指责他两度解散了匈牙利共产党。

“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卡达尔说：“党已经崩溃，丧失了信誉，不得不重新组党。我不想为自己开脱，但是不能不提到，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房间里只有六个人，都是领导成员。但在作出决定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三十多人。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

起事者先后占领了各地的党委大楼，开始迫害共产党员。但这并不是一个拥有八十五万党员的党如此迅速瓦解的首要原因。11月的头几天，不少领导人已经转入地下，有的安置好了家属，有的逃亡国外。广大党员处于瘫痪状态，其原因部分是因为上面已经提到的那种痛苦的责任感和缺乏领导，部分是因为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十分迅速地变换了他们的观点，而权力事实上已落在他们手里。10月28日，总理在广播讲话中把他前几天还称之为反革命的事态说成是革命，同时宣布：苏联军队将撤离布达佩斯，取消国家保安局，起事者将被编入各武装力量组织，提高低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成立新政府。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在首都和全国恢复安宁。但事态已经过于恶化。起事者没有遵守停火协议，而在苏联军队撤出首都和唯一有点战斗力的国家保安组织被解散之后，国家政权已经失去一切武装力量。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不仅解散了参与违反法制的国家保安局的侦缉机关——其大部分军官已在10月23日开除或逮捕——，而且也解散了属于国家保安局的公安部队，在那里服役的都是年轻的现役士兵，指挥他们的大部分也是正直的青年军官。是他们保卫了电台，警卫了政府大楼，是他们在保卫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时惨遭杀害。

起事者武装小组的成分十分复杂，而且随着事态的进展不断

变化。在首都，他们大约有几千人，大多数是青年，也有不少犯罪分子，寻衅闹事的流氓和追求冒险生活的少年。他们中间有霍尔蒂军官、警官，箭十字党党员，也有大中学生、工人、学徒工，甚至还有共产党员。随着事态的恶性演变，犯罪分子和极右流氓越来越占多数。

令人遗憾的是，也有截然相反的例子。有个犹太人出身的三十二岁的工人，母亲和兄弟都惨死在集中营；他曾经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党员。但是，在10月，甚至在11月4日以后，他成了一个杀人最多的武装小组的头子。有谁能解释他的这种人生道路呢？

起事者中间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人，杜达什·尤若夫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率领的武装小组占领了《自由人民报》的印刷厂和报社大楼。他还自封为匈牙利民族革命委员会。

杜达什究竟是什么人？现有的材料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早在解放以前他已经扮演过政治角色。据说曾经是共产党员，也有人说他当过警察，是霍尔蒂派到莫斯科去谈判的代表团成员；解放后又是小农党的国会代表候选人，曾作为“匈牙利兄弟会”的成员被逮捕过。杜达什一伙同大多数武装小组不同，他们想方设法扩大政治影响，出版报纸，印发宣言、传单，拒不承认纳吉政府，但后来又同总理谈判，写信给联合国，占领了外交部。同时还成立了政治侦缉组，捉人杀人。在这个小组里，上了年纪、有过极右政治生涯的人比其他武装小组要多。

1956年10月，监狱的大门被打开，释放了所有罪犯，有扒手、前劳工队看守兵、党卫军分子、强盗、战犯、窃贼、箭十字党员，总共九千名刑事犯，近四千名政治犯。他们当中有的认为此地不可久留，立即离开了匈牙利；有的暂时销声匿迹；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武装斗争。任何时候，只要不是全阶级起来反抗政权——1956年无论如何不是工人或农民起义——，流氓地痞分子都会来混水摸鱼。10月的情况也不例外。虽然许多顽固不化的罪犯一时确实

以为自己成了自由战士和革命英雄，他们甚至不从被捣碎的商店橱窗里拿走一块面包，抢走一双皮鞋。在那些日子里，社会上大多数人把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都看作拉科西一伙的牺牲品。这实在是群众歇斯底里和错觉的奇特事例！

反革命武装力量的三个头子的经历，是起事者面目不一的极好写照。毛莱泰尔·帕尔11月3日当上了国防部长。我认识他。这个走起路来总是昂首阔步的职业军官，在世界大战中当过苏军俘虏，后来进过反法西斯学校，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支空降游击支队的司令。解放后是匈牙利军队的高级军官。1956年，他是劳工部队的上校衔“铁腕”司令。在他部队里服役的是从家庭成分来看不可靠的青年人，他们应征入伍，但不发给武器。10月25日，毛莱泰尔得到命令，率领装甲部队去占领起事者的重要据点——一个在上世纪建造的、围墙一米半高的兵营。这个兵营当时以玛利亚·特利莎女皇<sup>①</sup>的名字命名，解放后被授予英勇牺牲的游击队战士基利安·久尔吉的名字。毛莱泰尔起初同起事者开火交锋，后来倒向了他们一边。对老百姓来说，除纳吉外，毛莱泰尔是10月份最出名的人物。事后他被处决了。

科帕奇·山多尔上校1956年任布达佩斯市警察局局长。我曾经一度尊敬过这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警官和司令。拉科西时期他一直身居要职。1956年10月他是共产党七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是他向警察下达了不许向起事者开枪的命令，后来又向起事者提供了大量武器。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几年以后大赦出狱，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护照出国。此后侨居在西方，写了一本回忆录。对本回忆录的最客气的评价也只能是：不符合事实。

基拉伊·贝拉少将是根据纳吉政府和起事者达成的协议由各武装小组成员组成的民族护卫队的司令。他曾在世界大战期间任总参谋部参谋，解放后是匈牙利国防军高级军官。1951年因间谍

---

① 十八世纪奥地利女皇。

罪被捕，1956年获释。11月4日以后试图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但没有几天就逃亡国外，成了匈牙利国外右翼流亡分子的头子之一。

袭击和占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是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顶峰。同党中央大楼和国会大厦的混乱局面相反，布达佩斯市委大楼里显得比较平静。这主要是麦泽·伊姆雷的功劳。麦泽出身农民家庭，兄弟十人。自幼生活贫苦，成年的时候才学会识字。因为找不到职业，早年去比利时谋生，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时当了军官，后来参加法国海外反德武装部队，是巴黎起义的筹划者之一。解放后担任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后遭贬。1954年起又任市委书记。卡达尔和麦泽相互十分尊敬。10月29日晚上，卡达尔来到共和国广场上他也十分熟悉的市委大楼里探望麦泽。

卡达尔回忆说：“当时我不知道该劝告他些什么，只对他说，不管名义上谁是市委第一书记，你要抓好市委的领导工作。”

卡达尔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部表情十分痛苦。看得出来，他是爱麦泽的。

第二天，各武装小组协调一致地袭击市委大楼。守卫大楼的大约有五十名公安军战士，大多数只装备了步枪。警卫战士向国防部、内务部，甚至向纳吉本人要求支援，没有任何结果。下午，市委大楼被攻占。麦泽和他的两位战友打着白旗走出大门，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接着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景象。当时拍摄的电影、照片传遍了全世界。被俘的警卫战士有的被开膛挖心，有的被倒吊在大树上，有的被卡车拖着穿过广场，有的被活活打死，也有的怕受折磨从三层楼上跳来自杀。

起事者说，袭击党委大楼是因为大楼下面有一个秘密监狱，关押着几百名无辜者。连续几天，用大马力的挖土机挖掘，用十多架仪器探测，报纸、电台天天报道，说已经听到了从地下墓穴里传来的受害者的求援声。尽管爱国人民阵线的机关报《匈牙利民族》不是一张庸俗的报纸，但这家报纸的记者竟然也这样写道：“星期四，在一处挖坑道的劳动者终于听到了轻微的说话声。从

老远的地方传来了呼救声：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是被俘者！他们还从地底深处听到了低沉的呼喊：我们要活下去！你们有多少人？——上面问道。一百四十七个。——下面回答说。”

党委大楼底下没有任何监狱，但是，群众的歇斯底里已无法控制。而且，这不仅是煽动者的特点。它也表明，人们不仅把一切坏事归罪于拉科西一伙和国家保安队员，也笼统地归罪于共产党员。

1956年的又一个基本矛盾是，在那些反共歇斯底里猖獗的日子里，匈牙利有着共产党的总理，共产党的政府。但后者没有存在多久。纳吉·伊姆雷10月30日宣布取消一党执政，三天后——中途有两天匈牙利实际上已不存在政府——组成了由共产党、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于是，形形色色的党派不断成立，估计为数在五十个以上。

1956年联合政府的特点是，组阁的政党中，除一、二个外，都由党的右翼代表参加。例如，社会民主党担任了几十年总书记的萨卡西奇·阿尔巴德和副书记马罗山·久尔吉，虽然两人都蹲过拉科西的监狱，但没有丝毫发言权。他们被斥为过于左倾。至于那些观点比社会民主党更右的人，他们对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则更是可想而知了。

国际政治事态也在疾变。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乘匈牙利混乱之际向几个月前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埃及发动了进攻。苏联领导人访问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商讨匈牙利和埃及危机。前总理纳吉·费伦茨从美国到达维也纳。霍尔蒂·米克洛什呼吁联合国“以保卫人权的名义”干涉匈牙利。国内，纳吉·伊姆雷宣布匈牙利中立和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明曾蒂·尤若夫在布达佩斯电台讲话，称政府为“那个已经失败了的制度的继承者。”

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小插曲：曾经打算11月1日在布达佩斯一家最大的影剧院举行前政治犯大会。按照计划，一起与会的将有战争罪犯，共产党员，箭十字党人，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

翼分子，霍尔蒂警察局的打手，资产阶级政治家中的极右分子和温和派。

卡达尔也接到了邀请，但没有出席。这天，他在电台发表讲话，宣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讲话的主要内容有助人们理解当时的形势和卡达尔以后的政策，令人注目。他说：

“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向你们呼吁。过去，你们怀着对祖国的忠诚和为社会主义的纯洁思想服务的愿望，加入了党的队伍。但是，拉科西及其集团的盲目和罪恶政策，已经使党堕落为暴政的工具。这一冒险政策肆无忌惮地破坏了你们在旧社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的斗争中用光荣的战斗和鲜血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思想传统。”

“我们开诚布公地对你们讲话。人民起义已经来到十字路口；要么以足够的力量去巩固匈牙利各民主党派的斗争成果，要么面临一场公开的反革命。匈牙利青年、战士、工人和农民流血牺牲，不是为了让反革命统治来替代拉科西集团的专横。我们进行斗争不是为了让他们从工人阶级手里夺去矿山、工厂，从农民手里抢走土地。或者让起义为我国人民保证民主的基本成果：集会、结社的权利，人身自由和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或者重新戴上旧世界的枷锁，沦为外国的奴隶。”

“新成立的党永远彻底地同过去的罪恶决裂！”

“党现在和将来都要保卫民族荣誉和祖国独立，反对任何人的破坏干涉。在民族独立这一基础上同全世界一切进步的社会主义运动及政党建立兄弟联系。在民族独立这一基础上同一切远近国家，首先同社会主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

“党现在和将来都要保卫匈牙利共和国的斗争成果，保卫土地改革，保卫工厂、银行、矿山收归国有，保卫我国人民无可争辩的社会福利和文化成就。”

“党现在和将来都要保卫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奴颜卑膝地抄袭外国的做法，而要采用符合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的方法



和途径，依靠摆脱了一切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继承匈牙利历史和文化的革命和进步传统。”

但是，大多数匈牙利人都未曾意识和感觉到：这里已经有人高高举起一面大旗，宣布了纲领。在人心浮动的混乱时刻，给人以鼓舞的往往不是冷静、理智和现实的抉择，而是华丽的辞藻，诱人的幻觉。动荡中的国家没有注意倾听这一坚定果断和沉着镇静的声音。

想必我没有搞错，卡达尔的这个讲话反映了他一天前的想法。那时他还希望通过重新建党来阻止反革命。但是，在历史如此迅猛发展的时候，一天也是很长的时间。

事实上，卡达尔讲话刚刚结束，抉择已经作出。麦泽·伊姆雷及其战友的壮烈牺牲对1956年匈牙利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使卡达尔毅然作出了决定。

“作出这样的抉择是万分困难的。”卡达尔说，“对于我们来说，时间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度过。疲惫不堪，又得不到确切的情报。只能凭借自己的本能和经验，而不能相信那些难于知道或了解不确切的事实。人总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不能继续指望事件不发展为反革命的時刻终于到来了。尽管作出抉择和抉择以后出现的情况何等困难，总比下不了决心，看不到解决办法要轻松得多。”

1956年11月1日晚上，卡达尔·亚诺什同明尼赫·费伦茨<sup>①</sup>一起离开了国会大厦。第二天，五、六位领导人随之离开。有趣的是：政府在寻找它的国务部长，后来又不得不宣布部长已经失踪。<sup>②</sup>

---

① 明尼赫·费伦茨（1886—1967），匈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解放前长期流亡苏联，参加过苏十月革命和西班牙内战。1945年后曾任驻外使节等职。1956年10月后任副总理、总理。1965年退休。

② 卡达尔当时在纳吉政府的名单上列为“国务部长”。

## 新 生

1956年11月4日黎明，在索尔诺克电台的波段上收音机传出成立了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消息。政府由八名成员组成，它的简要纲领是：保卫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律秩序和安宁，保持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政府宣布：已经向苏联提出，请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

这是一个精干的内阁，这是一个简要的施政纲领。

卡达尔说：“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被列入政府成员名单，有的人则是我们还不确切知道他在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的观点同我们一致。当时要制订一个详细的纲领根本就来不及。我们不能等待，必须行动。”

卡达尔在1957年6月是这样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的：

“11月1日我同纳吉·伊姆雷他们断绝了联系，尽管他们在2日，也许是3日，在一个政府成员名单上依然列上了我的名字。其他人，明尼赫同志和另外一些人，也和我一样做了。11月2日我们已经间接地或直接地同苏联同志、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领导人，就必须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和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提供什么支持的问题开始了会谈。这些会谈是在2日开始的，3日已作出决定，必须不失时机地行动。于是11月4日开始了进攻。因为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优秀共产党人和忠实的匈牙利爱国者在丧失生命。”

据一位可信的南斯拉夫高级外交官的回忆，赫鲁晓夫和铁托于11月2日在布里俄尼岛举行了会晤。赫鲁晓夫向南斯拉夫国家

元首通报了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中国领导人商谈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意见；如不进行干预，匈牙利势将发生内战；如果联合国部队像几年前开进朝鲜那样来到匈牙利，那么将可能发生世界大战。铁托对此表示同意，并且强调说，对反革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要战胜它。赫鲁晓夫告诉他：卡达尔和明尼赫已经离开布达佩斯。

卡达尔在1958年请求免除其总理职务，并推荐明尼赫继任时，是这样向国会报告的：

“1956年11月1日和2日我们已经看到，必须成立一个新政府，必须同叛徒决裂。当时明尼赫同志——如果需要和可以提到这件事的话，——是倡议者之一，而且差一点由他出任总理。现在我作为‘内部秘密’透露这一点。明尼赫同志当时建议由我担任总理，出来抓工作。因为他长期不在国内，人们不那么了解他的立场和行动。”

当索尔诺克电台报道新政府成立时，纳吉·伊姆雷正在国会大厦。他用四种语言在广播声明中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他的政府依然存在，部队正在战斗。然后立即离开国会大厦到了南斯拉夫使馆，同二十几名同事一起，得到了避难权。

当日黎明，苏联部队重新开回布达佩斯。战斗实际上只进行了四、五天，而且主要在首都。苏联人既没有使用空军，也未使用炮兵，只动用了装甲部队。坦克在没有步兵掩护的情况下，进攻并袭击了起事者麋集的地方（可惜一般是居民住宅遭殃），然后继续前进，但之后起事者又重新聚集起来，并且向坦克掷汽油瓶。不少坦克兵被烧成焦炭，缩成一团，躺在大街上，真是一幅可怕景象。

卡达尔说：“1957年我参加了莫斯科布基洛夫工厂的一次集会，那里人们向我介绍了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1944年，儿子在1956年牺牲在布达佩斯。当时我真不敢看她。”

武装斗争所以能在几天内就结束，不仅是因为国防军没有对

苏联人作战，而且也因为从11月4日以后任何人都看不到战斗的意义了，虽然盛传只要坚持几天联合国部队就会来到。一部分起事者这时就抢劫商店，其余人在一、二天后放弃了战斗，有的回家，有的离开了国家。遗憾的是出于各种原因，同他们一起离开匈牙利的几乎有二十万人，而且绝大多数是青年。有些人毫无根据地怕事后受到惩罚，也有人害怕再次出现一个拉科西式的专制统治，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逃跑的人中间有不少犹太人，他们被反革命期间这里或那里出现的排犹主义吓坏了；还有不少追求冒险的青年，他们以为到了西方会生活得更好一些，或者认为这样可以解决自己的家庭问题。大多数青年人几乎自己也不确切知道为什么要出走，只是因为出于恐惧，出于无所适从，便跟着走了。

1958年卡达尔在国会上讲：“对于因思想混乱而在1956年从这里逃走的人，我们由衷地感到惋惜。”

11月中，当枪声停息以后，首都有几条主要大街又象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街上瓦砾成堆，疮痍满目。到处是没有玻璃的窗户，和弹孔累累的房屋。商店紧闭，断了的电线在空中摇曳。人们为了买面包、牛奶、土豆要排几个钟点的队。交通停止了，实行了宵禁。街上武装人员来回巡逻。于是，又有人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几十年内生活不会转入正常。

常常可以看到草草挖成的战斗中的牺牲者的坟墓。可是连谁躺在里面也没人知道。不时有颤巍巍的人弯着腰在草率钉成的木十字架旁，吃力地读着架上已经模糊了的姓名。他们在寻找失去的孩子、兄弟或丈夫。卡达尔在1957年5月说：“我对由于上当受骗而在对面的阵地上死去的人感到痛惜。”

一时还根本谈不到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局面。罢工在继续，全国——主要是首都——的居民，实际上从1956年10月23日起就没有工作过。宵禁直到1957年4月才取消。在反革命事件期间和以后成立的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在许

多地方接管了工厂、机关，甚至国家行政部门的领导。来自国外的压力是相当强大的，而且远远不只是宣传方面。联合国不断地企图干涉匈牙利的事务。国内有不少地下组织在活动。各种西方情报机关派遣代理人到匈牙利，又给钱，又送武器。他们提出口号：“三月份我们将东山再起。”

如果使用暴力，政府可能会较快地控制住局势。在当时已经有能力这样做。装备良好的、可靠的武装治安部队纷纷成立，警察局也重新组织起来了。但暂时还在谈判解决问题。新的领导人必须先制订出政治措施，并取得一致意见。暂时还没有详细的纲领和完善的战略措施，而且局势还在不断变化。常常需要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在不少问题上他们举棋不定，众说杂陈。有人建议同在南斯拉夫使馆的纳吉·伊姆雷谈判（其实纳吉本人对此也没有兴趣），也有人认为，不妨让纳吉·伊姆雷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党。

聚集在索尔诺克的领导人在11月6日夜里乘坦克去布达佩斯；12月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二十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是谁选的？当然是自己选自己。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我们开了三天会。”后来卡达尔说：“每人都发言了，而且不止一次。会议厅气氛极其紧张，可以说一触即发。因为在当时，我们二十三个人只有在必须拯救社会主义这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至于如何拯救，几乎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设想。而我们共同的设想则是在争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卡达尔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二十五年之后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又重新提到了这一点。

“今天还值得思考这次会议的经验教训。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但我们坚持各抒己见的原则，终于取得了一致。最后，也是在最重要的，在决定性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的立场。持久的、真正的团结产生于活跃的、坦率的、原则性的

争论之中。有了它别的也就是水到渠成了。在结束争论之后我们取得了统一的立场。从而保证了我们在较长的时间内据此进行一致而一贯的活动。这条经验对今天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

这里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以理、而不是以力服人。所以同各种人物、团体、组织一再讨论，力争把所有能吸收到领导班子里来的人都吸收进来——不仅是共产党员，对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小农党党员和农民党党员也都这样。开始成绩不大。不但普通人，就是许多有经验的老政治家和领导人也都心怀疑虑，很难使他们在几天、几周内建立起信心来。有的人表示不同意新领导，有人说以后再也不谈政治了，有人声称不愿再次弄脏自己的手，也有些人在观望。后来许多人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虽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源源到来，但当时国家的经济局势是灾难性的。武装冲突的破坏给国家造成了三十亿福林的损失，因生产停顿造成的损失是二百亿福林。食物、燃料、衣服都极少。如果生产不恢复，匈牙利的经济将全面崩溃，然而中央工人委员会宣布在12月11日举行新的总罢工。

1957年5月卡达尔向国会作政府半年工作报告时说：“谁也不能说我们还不够耐心。我们的政府成立后再次向仍在顽抗的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停止那种对他们来说是毫无前途的抵抗，放下武器。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我们的忠告。于是我们被迫诉诸武力。当反革命看到武装斗争已经事无可为，就转用政治手段继续斗争。目的仍然是企图推翻政府。为此建立了所谓‘中央工人委员会’，成立了各种‘革命委员会’进行活动。为了使可能是出于好意而参加这些组织的人重新回到正路上来，我们愿意等待。为此政府在11月12日的决定中只说，希望‘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类似名称的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各地作为政治协商组织活动，帮助工作，但不要替代有关领导人进行领导。比如它们无权辞退和录用工人。但是这些委员会不但没有执行政府的这一法令，甚至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央指挥委员会’这一新的反革命中央领

导机构，进行对抗。这样我们便别无他择，于12月8日以政府命令取缔各类‘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类似名称的反革命组织。”

“同中央工人委员会和地方的工人委员会，我们也进行了类似的长时间的政治斗争。在这些工人委员会里有诚实、正派的人，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反革命势力想用这些工人委员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政府对他们也表现了耐心。同中央工人委员会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谈判。我们力图说明，他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们的行为帮助了谁和为谁效劳。但是这些会谈并没有什么结果。局势发展到——同样也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中央工人委员会最后已经明目张胆地按西方的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指示行动了。”

“这样，我们必须解散中央工人委员会和地方的工人委员会。”

在这炽热的、达到爆炸程度的紧张气氛中，当心灵的创伤和良心责备、当痛苦和猜疑、当困惑和不安折磨着人们的时候，建立分散的权力机构，谈论公民的发言权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形形色色的民族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却在致力于所谓社会主义匈牙利的革新，致力于推翻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12月中旬在外地的一个城市里示威游行同治安部门发生了冲突，多人死亡，一百人受伤，两天后一位区党委书记被杀。

只能诉诸武力了。逮捕了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头目，以及一些无名的和著名的人物。纳吉·伊姆雷一伙被送到罗马尼亚。宣布实行即决审判。困难时期来临了。

在那激烈的气氛中社会舆论无法清醒地判断事物，他们把每个遭到逮捕的人不是说成被冤枉的好人便是可耻的罪犯。在那时我本人也进了监狱。我知道同狱的是些什么人。有一个是十七岁的技工学校学生，他因手执步枪被捕，判了十五年徒刑。审判后，监狱看守安慰他说，如果在狱中劳动得好可以提前释放。有一个是被判处死刑的某外地城市的民族委员会主席，曾是霍尔蒂时代的官员，他翻来复去地对我说，如果早知道纳吉·伊姆雷政

府没有向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宣过誓，他绝对不会在一个法律上无效的制度下任职。后来此人没有被处死。有一个是两次杀人、六次被判过刑的罪犯，同牢的人对他畏之如虎。他们曾向看守报告说此人藏有刀子（这是监狱中最严重的控告了）。有一次我们两人在一起时他谈了一生中最大的感受，讲了把他从一切罪恶中清洗出来的革命。有一个将军，一度是霍尔蒂时代的军官，解放后毕业于苏联的军事学院，按上司的命令给起事者发了枪。还有一个年青的中学校长11月23日在他所在城市的广场上向群众朗诵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这件事被副校长、早年的神甫告发了。有一个强壮的、神气的年青人，为了不使其他人听到，夜里他悄悄地告诉我，1950年他从国内逃跑时，曾用藏在大衣袖中的匕首杀死了一名边防军。后来他当了外国雇佣军，在非洲、越南打过仗。11月1日带着一支短冲锋枪、六盒子弹和四个手榴弹越过边界进入了匈牙利。一位大学生在某一个民族委员会大门前值勤，救了十几名警察。他用的办法是，先把他们俘虏，然后叫他们脱下制服，换上从同伴那里弄来的普通衣服。有个神甫，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用来作祈祷。他对一位小农党议员说：“先生，小农党的特点是永远也不会为了原则而把自己的脖子钻到绞索上去。”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逮捕他。还有一位司机，说自己在布达佩斯市党委门前救了四个人，还把他们送到医院。他无法证实这点，但好几个人却说他到过共和国广场<sup>①</sup>闹事。一个旋工从工厂的大门上取下了红星。因这个罪名许多人被控告，这种人在监狱里被称作“摘星人”。一个大学讲师的罪名是呼吁学生争取自由和民主。一个小偷每天用四个小时练手指，以免技艺生疏。他靠行窃生活。他说，他别的什么都不会。此人后来因行凶杀人被处决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不幸的是纳吉·伊姆雷的命运了。他和其他三个同伙一起被判处死刑后处决。案件的其他被告者被判了

<sup>①</sup> 布达佩斯市党委所在地。



徒刑。每个政治案件判决的正确性往往是有争议的。但这次不像拉伊克案件那样是莫须有的冤案。至于这个有四十年党龄、一生三分之一在苏联渡过的纳吉·伊姆雷，开始他自己也把这件事称为反革命，后来又怎样会走到11月4日，走到绞刑架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这无疑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成为元凶之一的国家的悲剧。

无论怎样苦痛，但是必须说，政治案件还是需要的。在那种局势下只有用强硬手段才能使生活正常化。不过在几年之内所有政治犯，包括被判无期徒刑的也都释放了。所以需要政治犯进行审判还因为，党如果想清除教条主义的反对派，就必须清算右派。

11月4日不少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也被吸收到新的领导班子中来了。12月1日党员人数为三万八千，可供选择的干部也很少，当时的形势是必须同那些愿意合作的人一起工作。这在许多人中间造成了一种恐惧心理，好像虽然没有了拉科西，但新的拉科西时代将重新在匈牙利出现。

卡达尔不希望这段历史重演。按他的评价，十月事件不仅是反革命，而且是民族的悲剧。他希望，1956年不仅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失败，同时也意味着新生的开始。工农革命政府发布的第一个号召说：“政府不仅决心竭尽全力捍卫过去十二年的成果，而且也决心同过去年代中在我国使社会主义建设倒退的一切错误彻底决裂。”

1956年12月，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指出：反革命事件有四大原因：拉科西及其集团从1948年末起霸占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并且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周围的党内反对派听任人民政权的丧失；在匈牙利存在着可观的反革命势力；帝国主义分子参与了匈牙利事件，而其最终目的是要推翻整个社会主义集体。

这一当时作为政治决议产生的文件规定了党的政策。事过二

十五年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历史的分析它也是正确的。在一个混乱时期中作出的政治分析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种例子并不多见。无疑，当时的领导对许多问题看不准、看不清，但基本原则的准确性推动了日后的发展。

卡达尔多次强调指出，只有这四个原因一起才导致反革命。但有些人不这样认为。1957年夏天一次我被传去法庭作证，在那里法官敲着桌子说，他只是现在才看到，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政治案件多么有道理，释放为此服刑的人是多么大的错误，因为正是这些人策划了反革命事件。

公开的争论爆发在1957年6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三百四十八名代表中四十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按照出身工人占百分之八十。

第一次交锋发生在当里瓦伊·尤若夫对别人插话的时候，卡达尔一反常态，生气地敲着桌子说：“里瓦伊同志，在我们党内没有打断别人发言的习惯，今后也不会有！”

里瓦伊和另外几个领导人在拉科西时代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只是因为卡达尔坚持才被吸收到临时中央委员会里。

卡达尔说：“我想，如果党内有意见分歧，那么领导机构中也应该反映出来。”

里瓦伊在拉科西时代是主要理论家，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得了中风。一只手瘫痪了，支着拐杖跛着脚走上讲台讲话，很吃力，但调子非常强硬。他声称：对过去错误的批判将削弱对反革命的斗争。他指责说，许多老的可靠的党员被排挤掉了。

他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反对，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尽管卡达尔今天说，他估计当时与会者的三分之一是赞同里瓦伊的。

“如果你有道理，为什么要叫喊？”卡达尔在一个人发言后这样问。

他确实是冷静而沉着的，但非常坚决地表示反对里瓦伊的意见。他说：

“在党的旗帜以外还存在另一面旗帜——垮了台的领导的那面旗帜。但这面旗帜被粉碎了，倒在泥淖之中了。我相信它永远也不会再飘扬了。垮台了的领导（我不是随便使用这一措词，这在政治生活中并非罕见），以那种万劫不能复生的方式失败后，永远也不会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了。”

苏联共产党也在这些日子里从主席团解除了斯大林最亲近的助手的职务，更使这次辩论增加了分量。拉科西时代的复辟——不管有没有拉科西——那时在匈牙利是现实的危险。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以出乎意料的迅速取得了成绩。党员人数到12月末已有十万人，1957年4月是二十二万七千人，6月已达到三十四万五千人。我并不断言，其中没有野心家、机会主义分子和谋私利者，但他们的大多数肯定不是这种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人，在1957年夏天他私下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之所以入党，是为了飞黄腾达；但我知道这些年的光阴已把他雕琢成自觉的共产党员了。党如同1956年10月那样迅速地瓦解一样，以同样的速度获得了新生。这更说明，垮台的是领导而不是党。

被搅乱了的、失去了信念的国家也安定下来了。在1957年，工业生产已经超过了1955年，国民实际收入提高了14%。1957年5月1日近五十万人汇集到英雄广场<sup>①</sup>听取卡达尔的讲话，而在半年前这些人曾经以罢工、抗议反对过他。这不是一次事先组织的游行，来的人都是自动来的。

卡达尔在十年后说：“我想，这五十万布达佩斯人，就是1945年初为劳动人民建设布达佩斯的那五十万人，也就是在1956年悲剧性的秋天，决定不让劳动人民在多瑙河两岸用血汗创造的一切遭到破坏，并且决心使未来是社会主义的和美好的那五十万人。”

这次大会的照片今天还挂在卡达尔的办公室里。

卡达尔说：“当时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已经摆脱了困难。坦率

---

<sup>①</sup> 布达佩斯的中心广场。

地说，我曾经认为困难持续的时间将会长得多。”

当1958年5月赫鲁晓夫在卡达尔陪同下到多瑙新城去访问的时候，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当时赫鲁晓夫说，他对此很高兴，因为他曾经担心，苏联士兵的武器在匈牙利人民中留下了比较深的伤痕。

卡达尔说：“当时我回答道，我高兴的是，要是在一年半以前，这些人中的一半还可能要高喊：俄国佬，滚回去！”

1958年1月，即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后十四个月，为巩固政权而斗争的阶段结束了。那时卡达尔请求国会解除他的总理职务。他希望把全部精力和时间用来从事党的领导工作。

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卡达尔·亚诺什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内讲过那么多的话，那么多次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他有理由感到，他的露面是不可缺少的，他从中也吸取了力量。

如果读他当时的讲话、文章、言论，我们会吃惊地从中发现他日后政策的雏形。我不是说，在1957年他对一切事物看法已同十年或二十年以后一样。许多东西今日已经系统地体现在他所制订的政策中间，而当时还仅是他个人的经历和一些不完整的想法。但是我想说明：二十五年前，不仅卡达尔的世界观，而且他的思维体系也已经形成了，这点后来基本上也没有变化。为什么他的某些想法只在几年或几十年后才实现，为什么有的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实现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匈牙利历史的特点。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体系，从认识、通过制订直到实现。它的两极是真理和可能性。

他1956年11月4日以后向全国发表的第一次广播讲话在报纸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我们站在负责的岗位上不是为了讲漂亮话，而是为了说真话，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动》。这几乎具有象征意义。

关于过去的错误，卡达尔是这样写的：

“如果我们不想对党和人民的利益犯严重的罪行，那就不应

该忘记过去的错误。我们没有忘记这些错误。我们知道，前领导人的错误给党和国家的威望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损失。我们的任务是以一切办法阻止错误的重演。我们同样也知道，这些错误妨碍了发展，削弱了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从而引起了群众的愤懑；这些错误也为反革命能够离间党和一部分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便，从而使反革命向人民共和国发动全面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政权，卡达尔写道：

“事实说明，政权不仅是巨大的力量，而且无论对党或某些共产党员来说也包含着危险。对党来说，在取得政权以后，骄傲和自满意味着很大的危险。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最大教训，这点在十月事件表现得特别明显。取得政权之后，在一些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们身上（但是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们身上也这样），一种错误的幻觉占了上风，好像政权的一切工具：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军队……如此等等，都在我们手中，于是——不妨这么说——他们认为对付敌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了，不断地争取群众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认为错误的根源主要在这里。如果这种意识当时没有在整个党的活动中或多或少地占上风，而是经常地倾听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对我党工作的意见和评论，如同1945—1948年之间所做的那样——当时对群众的一切问题必须作出答复——，那么掌握政权的年代就不会同时也是出现严重错误的年代了。”

“有句俗话说：如果你要了解某个人，你就把权力交给他。无疑，权力是对一个人秉性的重大考验。但是我认为，对共产党人来说，有两大考验。共产党人单独面对敌人时遇到的是第一个大考验。这是艰苦的考验，因为要冒生命危险。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被霍尔蒂警察局逮捕过的同志们就够了，他们中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惊人地经受住了考验。拉科西也是属于这种人。1947年遇到了另一种考验，我们不妨称之为接管政权的考验。某些人

英勇地经受了第一个考验，然而在第二个考验中失败了。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于是开始脱离了长时期为之奋斗的那些群众。随之而来的是掌权的那些人被一味歌功颂德的人包围了。如果某个人天天在书报上读到的只是说自己是天才和明察秋毫，到头来连自己也会相信起来的。”

关于党，卡达尔说：

“党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得了一种绝症：参加党的活动就像教徒在办得不好的天主教教堂里做礼拜那样。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一个主教式的人站起来，说一通他需要说的话。其他人虔诚地倾听，听完就回家。在这些报告会上，打个比方，就像教会规劝人们不偷钱财、不做坏人、不要当野心家，要好好干活，尊敬人民，孝敬双亲，诸如此类。然后每个人都说一声‘阿门’。但一分手后，不少人便开始捣乱、做坏事，正好和集会上说的相反。后来，为了良心不受责备，他们便去忏悔。而我们共产党人，也有我们的忏悔，那叫做自我批评。有过一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他们认为，可以象一个坏的天主教徒那样行事。可以整年胡作非为，但在复活节到教堂去忏悔一通，便自以为得到新生了，便可心安理得地走上大街。但复活节后的礼拜二又从头开始，依然故我了。”

“目前在党的威信增长的时期，要谨防宗派主义倾向。必须保证每一个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牺牲、大公无私、有能力进行战斗和工作的诚实的劳动者，首先是工人，找到通向党组织的道路。但是我们只欢迎这样的人！希望任何人也不要出于面子或其他个人想法来参加党。对党和工人阶级来说，如果有广大支持者和朋友团结在它周围，要比在党内有一群一有风吹草动便惶惶不可终日的动摇分子好得多。对我们来说这是十月事件的教训之一。”

“如果不断地向人民灌输说，一切功劳都属于党，那么人们也会把一切坏事都归咎于党，其实那并不是党干的。从1949年起

我们经常强调，一切赞扬都是属于我们的。每做一件小事我们也想要人们歌功颂德。群众习以为常地认为党对一切负责。这一来，一切缺点，哪怕有的事情明明是历史的罪过，人们也会记在党的帐上。”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好像是在统治人民，或者站在人民的头上，那他就不是好党员。一个好党员应该是在工作和战斗中，在困难中，站在人民的前列，同群众风雨同舟，并且领导着他们。最重要之处是党员要尊重党外劳动群众，把群众看成是和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要让自己的行为表明，共产党员的党性决定了他不能比任何其他入有更多的权利。”

关于领导和人民，卡达尔说：

“如果现在允许我对政府和党的现任领导讲些好话，那么我想说，这些领导人知道，自己不是完人，因此他们严格遵守一条原则：要求努力做到群众理解领导，领导理解群众，以求共同前进。无疑，现领导在群众心目中，不具有前领导长期所享有的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像他们那样通体圣光和无所不能。可以说，而且也应该说，群众是闭着眼睛跟着从前那个领导的，今天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在人们的意识中，旧的始终束缚着新的，过去束缚着现在。回顾一下历史就清楚了：比如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把一个被认为和魔鬼合伙的女人烧死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愿为人民进步而奋斗的人该怎么办？他难道应该同意这种火焚女妖的做法，仅仅因为习惯和传统如此，仅仅因为群众同意这样做？我认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人民和进步的利益所在，只有据此行动才是正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另外一条基本要素，即无论他的行动人民是否理解，他应该敢于向群众说明：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群众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办不到的。”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和使命。我

们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学习，倒过来说就不对了。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实践不是为理论服务的。实践就是生活本身。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因为在科学界也存在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们的运动中也曾发生过。一些人认为，群众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可以让他们用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殊不知，需要群众并不是为了试验他们那种脱离生活拼凑起来的理论和论点。固然，在试验中有的理论证明是对的，但那是极少数。而更多的情况则是试验的对象一命呜呼，然后群众起来把拼凑重理论的人打得粉身碎骨。”

关于农民，卡达尔说：

“我想，在1945—1949年间，在为取得土改胜利，为建立社会主义工业而努力的几年中，在保卫胜利果实的时期中，工农联盟也得到了加强，比如：在1946年为保卫分到了的土地而斗争的时候，一直到取得政权的时期。接着这个联盟由于两个原因松弛了：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使用了错误的方法（这里我指的是强制、压力和类似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由于征购制度中的错误，就是说，不是由于实行了征购制度，而是由于征购制度中出现的错误。因为征购价格和征购制度在执行中的问题使这个制度事实上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从而在工农联盟中引起了严重的松弛。当然，因违反法制而引起的某些错误也起了作用。”

“我们的普通供销合作社的主要毛病是，它没有真正起到供销合作社的作用。与其叫合作社，还不如称之为二等国营商店。因为它不具备合作社运动的灵魂。如果供销合作社真正起作用，它就应该帮助农民解决购销问题，起到它特有的作用，甚至还可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对农村居民说来设立国营商店还是合作社都一个样，因为两者的职能都一样，那么这算什么合作社，还叫做什么合作社运动？那不是真正的合作社。”

“如果我看到一个个体农户，他紧紧地抓住自己的那点土地不放，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他是坏人或者是公众的敌人。因为他



抓住那块土地不是为了想当合作社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从孩提时起，脑子里就深深地印上了他在其中生活的困苦景象，和他作为一个穷人的惨痛经历。他就学会了这一条：如果抓住这小块土地，那他就能留在水面上，如果失去土地，他就要淹死。这就造成了一部分个体农户不是那么容易加入合作社。这点必须理解，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同他们讲话，因为他们总有一天会进来的。决不能使用强制的手段。重要的是耐心启发。人们是不喜欢把他们推到某个大门口去的。”

关于外交政策，卡达尔说：

“我们赞成和平共处原则。这从我们方面来讲同样也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同一切国家——不论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这对我们是合适的。”

关于教会，卡达尔说：

“我们认为，把神甫和教徒从内心矛盾中解放出来的那些教会领袖是有头脑的。也可以把他们解放出来。这方面需要的仅仅是坚持他们的信仰——不这样就没有神甫和教徒了，也就不成其为神甫和教徒了——此外，就是要接受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并把他们当作社会纲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会产生内心矛盾，不必为此大伤脑筋：现在我是听从教皇去违背公民的职责呢，还是坚持公民的职责去违背对教皇的忠诚呢？”

关于经济生活，卡达尔说：

“每个劳动者必须知道并且应该按照这一点来劳动：生活水平和生产相互关联，只有当他由于劳动提供了更多的产品时，他才能多分、多得、多消费。”

“在党内也好，在国家领导方面也好，关于经济生活的管理方法都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于过去那种使地方的积极性陷于瘫痪和一切都高度集中的老办法，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能说，无论在头脑中还是在实践中，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正常了。例如上级组织还没把那些应该下放的职权下放给下级组织，使地方也能积极

而自主地为国民经济的利益工作。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现象，削弱经济上的统一领导，威胁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这也是理论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诚然有一些现成而清楚的理论，例如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正确的经济领导，也应该是民主集中制的论断。但是这个论断如何在我们的环境中运用，如何教育人们运用它，这又要在今后等待党去解决的任务。”

“每个正派的人都知道，那种收入大于贡献的情况是不正常的，长此以往肯定不会带来好结果。同样每个人也都知道，维持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工资制度也是不公正的。”

关于青年，卡达尔说：

“十月事件过程中在匈牙利青年中间发生的情况对青年是个教训，但对老一辈的教训更大，要大得很多。我看，对于老一辈人说来，教训是：青年经常倾向于理想化，他们为自己树立理想，有时也寻找作为榜样的人物。这是不能改变的法则。但为了不使人利用这点，要十分注意避免在青年心目中把任何人神化，也不要生活现实理想化。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与其说出于认识，还不如说出于感情上的因素而信仰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是会看到矛盾的。不错，从书上看，社会主义是很美好的，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到来，它现在正在痛苦、斗争、问题和困难中诞生，就像任何别的新社会诞生一样。如果我们告诉青年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我们就没有说真话。谈到人物的时候，同样也要注意，因为如果年轻人在感情上失望，那对他们是个严重的打击，而且事实上他们遇到过这样的事了。因为他们不是从认识而是从感性出发的，他们便经历了这样的失望和感情上的震动。在今后这应该引以为训。要少说些大话，少用些高级形容词。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如果要用‘最最’时，要慎重考虑一下。因为如果事后证明此事或此人连中级或低级形容词也不配，人家是会找我们算账的。”

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卡达尔说：

“我认为，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假民主是从外部强加给我们和混入我们队伍中的敌对观点，政治上的教条主义理论和宗派主义则是我们自己的产物。从理论本身来说，这是工人阶级内部和党内产生的，不是敌对观点，但却是有害的观点。前者是敌对的观点，是阶级敌人的产物，而后者是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的。我们必须据此进行斗争。但在党内首先还是要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它们直接地妨碍我们为反对阶级敌人的观点和政策而进行有效的斗争。”

关于人民阵线政策，卡达尔说：

“我们共产党人不希望单独担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过去的岁月教育我们，把非党人士排除出政治舞台是不正确的。我们愿意同具有各种见解的人物一道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社会主义。”

关于民族团结，卡达尔说：

“我坦率地说，为粉碎十月中出现的‘民族团结’我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什么必须粉碎这个‘民族团结’呢？因为它是在反动的纲领上成立的，其领导人是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我们处在争论阶段，要使这个阵线纯洁，要弄清楚谁站在这一边，谁站在那一边。争论必须运用思想和政治手段，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民族团结。但是实现这目标还要好几年。”

关于民主，卡达尔说：

“党对军队、警察和其他机构可以具有而事实上也具有影响。但光凭这一点还不等于已经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争取到了工人、农民和居民的大多数，不等于已经解决了领导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想以权力手段来代替思想影响和政治说服，真正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将会减少，即使在看不到反抗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些问题上有意见分歧，这是每个了解生活的人都知道的。在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在共产党人内部，也可能有意见

分歧。思考问题的人们之间有微小或是大小不同的分歧，这没有什么不对。不对的是我们对之不闻不问。”

下面是一点政治上的论述，但这已经是哲学范畴了：

“我没有忘记作家们大约在十个月以前所作的伤心的论断，他们说，语言失去了意义。我的看法是作家们（包括那些我们有理由训斥和责骂的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回顾前几年的生活，我们也必须承认许多话因为脱离了内容实质，确实是失去了意义，但如果我们今天的现状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特点之一便是：语言重新获得了意义。”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列宁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我对他的五十卷著作做了认真的笔记。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脱离了历史背景，而是光凭摘录和引证，可以描写出多少个不同的列宁的形象。我希望，用上述这些摘录所描绘出来的不是歪曲的形象。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实践使我有把握这样来引用二十五年前的话。

政权巩固后有两个因素对匈牙利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卡达尔·亚诺什的一句话。

1945年后匈牙利农民是怎样得到土地的，这方面已讲过了。但是，1955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工业生产比1938年增加了两倍，农业生产却基本上没有任何提高。问题不在农民，而在于对农民执行了错误的政策。

拉科西时代农业政策的基础是不断地用征购、征税以及不合理的价格政策来压榨农民，直到他们被迫加入合作社。很能说明问题的是，1952年专门成立了征购部，以加强农产品的征收。但事与愿违，1953年生产合作社已拥有全国可耕地的30%，可是合作社的产量却只达到个体农户的三分之二。当压迫一松动，勉强成立的，领导不当的，同时也受到国家压挤的合作社开始解体了。到1957年春，留在生产合作社里的可耕地已只有10%。

1956年11月4日以后，政府最早发布的决定之一是取消义务交售制度。中央认为，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是不合适的。虽然农

民在十月事件中的表现是那么令人吃惊地沉着，但对“城里人”那种亘古以来一贯存在并被拉科西时代加强了的不信任感，要求新的领导努力去取得他们的信任。

关于农业政策，在党的领导中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一种意见是应该依靠政权，采用经济强制办法迫使农民加入生产合作社。

“在195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卡达尔在1962年说，“这一宗派主义政策体现在那个把下一年农民的税收提高七亿福林的建议中。德盖伊明确地表示，必须使那些已经小康的农民贫困下来。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点甚至想起来也可怕。我们将会一下子失去党的政策在前一年半中所取得的一切。我们不要忘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也有知识分子）对过去年代的沉痛经历还记忆犹新，心中的疑虑也未消除。”

卡达尔提到的德盖伊·伊姆雷原来是个无地的农业工人，狂热的共产党员，他是在1956年11月第一批站到卡达尔一边的那些人中的一个，1960年前曾任农业部长。

另一种意见是：合作化必须当国家在物质上、经济上已经充分作好准备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关于这点后来卡达尔的意见是：

“要我们在一个个体经营的村庄里先建好新的牲口棚、猪圈、种子库，然后着手号召农民组织合作社。这样来组织合作社是不可思议的。”

争论最后的结果是，确认政治条件比经济条件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人民信任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而且应该实现合作社。卡达尔是最坚决地反对强制办法的，但是他提醒大家，自愿不等于自发。不能等待农民“自动”加入合作社。他对农民是十分了解的。

“这里我不想引经据典，”卡达尔说，“但是列宁关于农民在灵魂深处既是工人，也是资本家这一十分准确的论断是众所周知的。当他劳动时，他和工人一样，但当他成为商品的主人和有可

能把商品拿到市场去时，他便以资本家的方式考虑问题。这个农民整年在困难条件下劳动，受苦受难，他咒骂上帝，咒骂国家和税务局。他不止一次地下决心什么也不干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过的是牛马一样的日子。但一当粮食进仓，他便顿时变成了资本家。即使宣传鼓动部门工作得非常出色（今天还没有到这程度），以致使农民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成熟了，那时农民肯定也会在一年中的十一个月里决定参加合作社，但到第十二个月粮食到手可以出售时，他还是会说，再等一年吧！”

任务是困难的，因为非常多的农民感到别人要夺去属于他的东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卡达尔说：“农民一生含辛茹苦就是为了自己至少能获得一小块土地。他看到和体会到，土地是唯一可靠的保证，土地是生命。他抓住土地不放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原来我记得合作化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那时我亲身经历和看到了可怕的，不止一次是流血的悲剧。看到过儿子因为父亲加入了合作社而翻脸不认，看到过父亲因为儿子加入合作社而把他逐出家门。也看到了令人遗憾的暴力——不是鞭子而是心灵上的强制。我也看到宣传员们如此残酷地对待农民，好像他们不是人似的。看到过和庄户一起痛哭的人。也看到过女人离开自己的丈夫，丈夫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也看到农民在递上入社申请后上吊自杀了。整个国家像一个受了干扰的蜂房。

在查阅了文件以后，我不得不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是多么差。事实是：1958—1959年冬天三十四万三千农民参加了合作社，可耕地的34%成了合作社的产业。1959—1960年冬天，又有三十八万农民入社，那时合作社已拥有全国可耕地的56%。1960—1961年冬天社员又增加了三十四万。这样匈牙利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当时匈牙利土地面积的93%属于合作社或国营农场。卡达尔在1961年写道：“在粉碎了1956年的反革命后，除了加强工人政权之外，在匈牙利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事件了。”

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这三年的记忆模糊了呢？也许是因为我只是在其中的一年里生活在农民的这一变化之中吧？在当时听到了他们的谩骂，疑虑和诅咒。是啊，任何人也不要有一点幻想：一切涉及几百万人的根本变化总是伴随着无可估量的痛苦的。这不仅是因为要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形式是多么困难，也是因为确实需要有集体的牲口棚、种子库，而绝大多数地方却没有这些东西。牲畜死亡了，粮食毁掉了，如果农民为某种东西而哭泣，恐怕往往会比哭自己更厉害。何况他们不懂集体经营，也没有兴趣这样做，也缺乏合适的领导。

让别人来详细地记录匈牙利历史的这一段时期并写下苦难和日后由此产生的一切吧！我现在只写卡达尔·亚诺什。他在1959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当合作化方兴未艾时说：“我说过，我不会透露各州的进展数字的。因为如果在这方面出现了任何不健康的竞争，反而会把我们的许多可能性都毁掉了。但如果对目前的势头诱导得当，那么今后几个月内很可能使合作社制度在农业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这样告诫同志们，要充分注意到我们的可能性，同时以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方式去考虑问题。我们建议各州的负责人，当完成一定的工作时，暂时停一下，检查一下，在实现他们的设想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把经验小结一下，然后继续工作。”

卡达尔提醒这一点是有其充分理由的。1956年来第一次发生了大批地方组织不执行党的领导的决议的情况。1959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暂停继续组织生产合作社。因为春夏期间，压倒一切的是让农民党安心地劳动。

卡达尔说：“我至少重复了十多次：不是为合作化而合作化。目的不是为了有更多的合作社，而是为了农村更多、更好地进行生产。但是，我的讲话没有发生作用。”

尽管发了禁令，尽管提醒了大家，但地方组织还是成百地建立了新的合作社。这在不小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同时，由于操之

过急，差错也不少。在坡上往下冲的大车失去了控制，连减速也很困难，辐断了，辐散了。

今天，事过二十年，当不仅生产的业绩，连农村的精神状态也雄辩地证明了合作化的正确性的时刻，说那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当然很容易。但是，如果今天没有这样的成就，不是这样的气氛，那情况又将如何？那么问题不仅是应该怀疑一个决定的正确与否，而且是这一错误的决定大概会毁坏整个国家的经济，至于破坏几十万人的生活就更不在话下了。

当今世界各地对于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干预自发的社会、经济进程或者说干预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意义的这点，争论得很激烈。社会主义大概是主张国家干预最激进的代表（这里且不谈通常是极右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应把社会引向既定目标，这就决定在发展的阶段上（而且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力求把社会引向集体的目标。这种集中的指导也有可能带来畸形的后果。遗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中不乏这类例子。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仅这个原则是正确的，而且实践也是必需的。据我所知，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产生于分散之中。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国家的指导不要专横，不要只把政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摆在眼前，而要在现实和理想、要求和可能最紧密地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干预社会、经济的进程。

匈牙利农村——乃至整个匈牙利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之一不仅取决于一个正确的决定，也不仅在于作出决定的时间非常合适（虽然这点也很关键）。如果合作化是在政权还未巩固，新领导还未取得信任的1957年开始，农民大概会像1956年以前一样坚决地反抗的。但如果推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则要引起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一个决定的正确性总是和时间选择的正确性相关联。但如果没有一条正确而又相对一贯的农业政策跟上，1959年的决定即使正确也是徒然。如果今天的现实充分说明了二十年前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么从那时起所执行的政策的正



确性也应该包括在内。正确的决定往往能被错误的执行所破坏。

1945年，匈牙利的左派，首先是共产党员，怀着“明天我们将扭转乾坤”这类救世主式的想法走向了新的生活。这一信念在头几年看来得到了证实。国家几乎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站立起来了。但是，在1949年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信念变成了思想意识形态，抹掉了它的实际内容。

1957年，任何人身上也不存在这种盲目的信念了。每个人都把摆脱灾难的路程想得比较长、比较痛苦。卡达尔至少是坦率地承认了这点。至于何以能以不可置信的速度，实际上在1957年春已经巩固了政权，到1957年末已经恢复了国民经济，其原因留待历史学家去分析吧。我只是如实地记下事实而已。

农村中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也同样出乎意料地快。在合作化的巨大的震荡后十年，匈牙利农业稳定了，开始了蓬蓬勃勃的发展。1970年生产超过了六十年代的30%，1980年超过了80%，集体经营在匈牙利无疑比个体经济要好。

如果在开始阶段在思想上被搅乱，慌张的农民不是较快地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不那么容易。数以万计的人感到，生活的意义，唯一的财富——土地被剥夺了。我没有忘记那眼神暗淡的农民和哭泣的妇女；也没有忘记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飘过的痛苦但又寄予一线希望的问话：“是不是，以后会退还给我的吧？”我同样也没有忘记自己那痛苦的回答：“不会，土地是不会退回的，你们设法安定下来吧，承认现状吧。准备今后在集体的土地上共同劳动吧。”

不仅失去土地对农民是可怕的震动，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可怕的。迄今为止由他自己安排日子、时间，哪怕需要起早摸黑地劳动，他总还是生活的主人，可是现在必须习惯按其他人的设想和指示劳动。这确实是很困难的。但在十年中，即在短暂的人生中不是那么使人感到漫长的时间里，匈牙利农民习惯了、接受了集体生产经营。我相信，今天希望重新要回自己过去土地的

人恐怕为数极少了。对我来说，这至少像生产成绩一样，是农民政策正确性的证据。

为了达到这一点，也需要贯彻卡达尔所表述的政治原则：

“新的社会制度、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不会没有震动和痛苦。我们党认为，在为新事物而战斗、为实现新事物而努力的时候，无论对社会和个人都不要给他们带来超过实际需要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否则既对社会不利，也无助于加速这个新事物的诞生，而这是要力求避免的。”

无疑，这点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和始终如一地得到了贯彻，但从根本上说却是这样做的。

仿照约翰·里德的名著<sup>①</sup>的书名，我可以激动地说：一句话震撼了匈牙利。这是卡达尔在1961年12月讲的一句话：“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

这句话并不出自卡达尔。斯大林、拉科西也经常说过一句类似但却是相反的话：“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列宁这两句话都讲过，而且不止一次。但很可能他们之中谁也不知道，这句话——和这个思想——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在《圣经》中，三位福音传道师，路加、马可和马太，借耶稣的口说：“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耶稣也说了相反的话：“谁不同我在一起，谁就反对我。”<sup>②</sup>

根据《新约》记载，约翰对耶稣讲，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因为谁不反对你们，谁就同你们在一起。当人们怀疑耶稣的权力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撒旦时，耶稣要求大家无条件地信任他，于是他说，谁不同他在一起，谁就反对他。

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思想是人类的基本要则之一。无论对人与

---

① 指《震撼世界的十日》。

② 出自《新约》，《新约全书》中分别译为：“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不与我相结合的，就是敌我的。”

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还是对集团、阶级、国家的关系来说，它都有效。无怪列宁都曾引用过这两句话。当苏维埃政权进行着生死存亡斗争的时候，谁不支持他们自然就是敌人。而当危险最终消失时，谁不攻击社会制度谁也就成了同盟者。拉科西的口号之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和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他不是在政权受到根本威胁的情况下使用的，这就把成千上万的人推离了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些人本来是可以耐心和谅解争取过来的。

为了理解卡达尔的这句话在当时激起了多么大的风暴，我把我在卡达尔讲话几星期以后，在一家布达佩斯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转录在下面。

## 同我们在一起还是反对我们？

### 一篇讲话的附注

有一段时间，有人硬要那些宁愿在菜园子里为草莓除草的电车售票员高举红旗，其实他举的只是旗子，而不是旗帜。有一段时间，有人要本来想带自己的三个孩子去看电影的会计读《资本论》，其实他并不理解书中的意思，反而被艰深的文字吓倒。有一阵，一个油漆工，本来应他的朋友之邀星期天去粉刷房子，但有人却要他在工厂墙上刷标语，其实他在灰色的楼房上粉刷的只是口号，而不是自己的信念。有人向我们强加这样的观点，说什么：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不表示赞同的人，他就在反对。由于人往往有些坏天性，实际上心里并不那样想的人，也随声附和地表示赞同。可是谎言变不成信念，被逼出来的热烈场面甚至会破坏人们对真理的信仰，于是在不得不大声颂扬的人群中那些大量明明是衷心拥护的人的声音也显得不那么可信了，踌躇者和怀疑者、迟疑者和胆怯者只是俯首听命而已。

而现在人们所听到的却是：每天工作八小时，你就完成了作为公民的义务，你去设计机器，去建筑桥梁，去开电车，去为病人治病，去耕种土地，而且做得尽可能多些，尽可能好些，为的是让你自己生活得更好，让

大家生活得更好。如果你有兴趣，你还可以给草莓除草，去看电影，为你的朋友粉刷房子。可是你不要在信念问题上说谎，如果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不要宣称你是《共产党宣言》的信徒。你不会因此而吃苦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是在培养小资产阶级，在培养为草莓除草的人、上电影院的人、买冰箱的人和建别墅的人吗？教人们跳摇摆舞，而不是唱革命歌曲，让他们懒懒散散，而不是唤起他们火一样的热情？

我想，所发生的事情只是：现在终于是由那些相信人民的人受人民的委托在领导国家。因为再没有比把已经成长起来的人民当作毛孩子来对待，使人感到更可悲和更屈辱的了。但是，相信人的人知道，清规戒律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那些为和睦相处共同生活所必需的禁令才会阻碍建立秩序的自由。相信人的人懂得，直不起腰来的奴隶最多只能建造金字塔，但不能创造未来。相信人的人会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每个人早晚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经验，基于自己的意志按照客观存在找到正确的道路。相信人的人也相信，人们将有智慧和力量做到这一点。

当然，根据人民授权来领导国家的人的耐心来自这样的认识：他们管理的政权是强大的。特别是他们懂得，在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方面，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是正确的。

我想，所发生的就是这些。情况是：在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和那么多艰苦的斗争之后，智慧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毫无根据的和有害的法则被修改了，同时提出了，并且我们也听见了：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现在人们终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在那里虚伪的赞同是比沉默更大的罪恶，不是争论而是假装同意才算过错；在那里作为一个人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不是点头，而是他区别于动物的——富有创造性的思索。正因为思索，人们使虽然在延长但终究是短暂的一生越来越有意义。

这只是第一步，任何人都不再被迫举旗，手中不再总是握着旗杆，当不确信某件事是正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必表示赞同。但这只能算是第一步。如果在赞同者中去掉了因被迫而伪装的人以及唯唯诺诺的人，他们的力量只能因此而增强。因为现在和将来都有人宣称：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意志的实现。而新的法则正好是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要不断扩大。力量和真理像磁石一样，本身就具有吸引力，那些认识并且宣称今天在这个国家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是什么功劳而是职责和义务的人，他们的这种信念必将对踌躇者和怀疑者、迟疑者和胆怯者以及那些不反对我们，也就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产生影响。

可以发现，文章中没有提到，这指的是谁的哪一篇讲话。显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整个国家都在谈论这句话。但如果加上一句：匈牙利新闻界中有不少人为这篇文章而哗然时，指出它的时代背景便有点意义了。有人写了篇文章批评我，题目叫做《过甚其词》。在一次作家协会会议上我还因此受了教训。一个党的领导人就像画解剖图那样，列举在这篇短文中有多少病毒在毒害匈牙利的精神生活，诸如：无政府主义、右倾、否定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贬低意识形态的作用、小资产阶级思想……其他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谈谈这篇文章以及它引起的风波之有意思之处，只在于它有助于人们感到卡达尔的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使舆论界和政界为之轰动了。我无意袒护自己这篇短文的任何错误，但是在今天，差不多过了二十年之后，同卡达尔当时以及后来的思想和政策相比，我仍然认为，这篇短文没有曲解卡达尔的思想的实质。不同意这篇文章的人，不可能同意卡达尔，也不会同意他的政策，这种人并不少。

卡达尔讲这句话后一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谈到这个问题，也证明了上面这种情况。

“我想就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口号说几句话。这个口号是说，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也必须肯定的最重要之处是：这句话不是科学定理，而纯粹只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政治上的提法。”

卡达尔下的准确定义说明了开始时许多人不理解的原因。并不是这些人不同意他的政策——当然也有这种人——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口号中寻找历史哲理，不是在政策中探寻现实生活的反映。

卡达尔阐述的论点是无可辩驳的。这当然是在今天。当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我们从历史上，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考虑问题时，我们常常会不理解二、三十年前自己为什么要那

样做。使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是多么健忘。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一个阶级和一个领导阶层的政治意志，不了解这种意志如同经济或社会形势一样是某一历史时刻的决定因素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在党代表大会上，卡达尔是这样论述的：

“让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靠劳动为生的人——而不是白天黑夜都搞阴谋、制造炸弹的人，——早上去上班，去工作，实际上是同我们在一起的，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情况仍然是这样。因为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总的政策是对头的，那么，在工业、农业和精神劳动方面就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凡是工作的人，都在建设社会主义。”

卡达尔认识到的是一种客观的、无可辩驳的现实。从这时候起这一认识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命运。过去，许多不理解和抵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多地考虑了人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却不怎么看他们在做什么。何况在拉科西时期，被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往往是脱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原则的。

卡达尔继续论述的却是主观上的东西了，因为根据同一现实可以产生不同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大处着眼之所以正确和有好处，是因为共产党人——但实际上所有正常的政治流派都应该这样——不要树敌过多，不要把那些根据其地位和观点可以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的人推到敌人那边去。”

这就是卡达尔政策的基本原则。它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不管人们是否从灵魂深处赞同现有制度，也不管他们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忠实信徒还是随波逐流的人，他们都通过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完全可以对社会舆论不予置理。遗憾的是，我们已经看到过毫无意义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专政的做法。

说到这里，不妨顺便谈谈：似乎很少有过像“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被多次错误理解和解释的政治概念了。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中叶日常用语“专政”一词基本上当作法西斯的同义语以后起，作为政权制度，专政成了专制统治。无疑，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某些阶段，也存在过专制统治的特征。

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政权制度，而是社会范畴。马克思把所有阶级社会都称为专政，同时把所有国家都称作压迫政权。因为在他看来，自由的基本条件是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政权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正如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我们再补充一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通过消灭剥削为消灭自己的阶级统治、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和消灭作为统治阶级的压迫机器的国家创造可能性。

我只是想通过这一概括的介绍，引起大家的注意：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使用的词汇，时常与这些词汇在日常生活的含义不一致，这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上是这样。例如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家不仅具有本义上的压迫职能，而且还有行政、立法和其他方面的活动，虽然这一些最终也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马克思把这些职能称之为压迫，它在日常用语中，而不是在哲学意义上，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暴力。

只要存在阶级社会，无论在哪个国家，受益的都是统治阶级，他们以此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特权，在资产阶级社会则是物质上的有利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即使当前尚未完全定型的形式下，它也远为复杂得多，过去和现在都造成了不少困难。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质决定了，即使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最富和最穷的人之间的物质差别都远没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大，而在那里，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别也是其制度决定的，合乎规律的，因而也是自然的。统治阶级的

具体人员，并不拥有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统治的物质力量。因此，我认为，这个迄今尚未很好研究的矛盾，也使得在年轻而脆弱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暴力、压迫和专制过去和现在都在起作用。

在匈牙利，在四十——五十年代，统治阶级的直接受益首先表现在许多工人、贫农成了政治、国家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他们处于执政的地位，从而亲手保证了本阶级的统治。同样，在中学和大学入学，在工作单位的晋升、任命和评定工资中，工农出身的也优先得到照顾。这样，其他的公民由于其阶级地位就处于不利地位。

卡达尔的口号改变了这种状况。卡达尔认识到，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利益不是维护，而是消灭自己的阶级特权。他是这样讲的：“这一政策只能由全体人民在实践中执行，社会主义只能靠全体人民来建成。”

在组织合作社的过程中，在处理阶级关系方面发生了转折。过去在农民问题上总是翻来复去地灌输列宁关于工人政权要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和反对富裕农民的理论。对这一原则进行历史性的修改，卡达尔是这样解释的：“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要依靠过去的贫农，联合过去的中农和反对过去的富农。”这表明了他的现实感和辩证的世界观。在成立合作社以后的最初几年中，在各种农民阶层之间也还曾出现过一些矛盾——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在人们的观点和特性中，这矛盾同样会得到反映的——，但富裕农民过去那种受歧视的地位以及贫农的、经常只是理论上的特殊地位在实际上是消除了。

后来取消了所有在出身方面的歧视，首先是对儿童和青年。卡达尔说：“解放后出生的儿童，如果由于在他来到人世间以前六、七年，在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社会里发生的事情而对他在无论哪一方面进行歧视，都是不公平的。”现在，在大学招生和工作单位晋升时阶级观点已经不起作用，虽然这远非一蹴而就而是克服了重重强大阻力的结果。



卡达尔说，“我曾经考虑过：大部分当年的资本家、地主和资产者对他们失去了工厂、土地和企业觉得反正已是无可奈何了，但对于他们的孩子得不到发挥才干的机会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置之度外的。我理解这一点。我想：如果我们人为地制造这类紧张，对工人有好处吗？如果有作为的青年只是由于他们的父亲过去是剥削者而不能为国家发挥其才干，这样有好处吗？”

政治术语把1947—1948年叫做“转折之年”。在匈牙利历史上那时确实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尽管在此之后有许多事情向坏的方面转化了，事实还是如此。在这以后，教徒都感到受歧视，不管他们是伯爵还是旋工出身。这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按照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宗教是灵魂的鸦片，过去以为，可以而且必须用强制的办法使人们放弃这种毒品。此外，教会的大部分领导人不接受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而且一部分神甫时而公开地，时而隐蔽地对它进行攻击，这也是事实。教堂虽然没有像有些人恫吓的那样被关闭或者改成党的办公室，也没有禁止人们上教堂，但政权的回答是，信教的人不能指望发挥才能。现在这一点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卡达尔说，“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有的人用小写字母写上帝的名字，另外一些人用大写字母写上帝的名字<sup>①</sup>；共同点是，人的名字我们都用大写。”他把这一美好的原则通俗地说成：“我们认为，不能单独为唯物主义者建设社会主义，然后再单独为教徒建设。社会主义是劳动者共同的社会，它是为每个人建设的。既然这样，每个人都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首先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同信教的人取得一致。因为每个人都懂得，两间一套的住房比一间一套的大。无论是教徒住或是无神论者住都是这样。住两间一套的住房比住一间一套的舒适，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先在是否有上帝问题上同信教

---

① 用大写字母表示尊敬。

的人达成一致意见，那就需要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如果在意见一致以前把社会主义建设停下来，就大错特错了。”1961年国会选举一位天主教神甫作副议长，显示共产党人和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当年阻碍全面彻底解决国家和天主教关系的是，明曾蒂·尤若夫甚至长期对抗教皇的意见，不愿放弃其教会首脑的地位。直到1971年当他离开美国大使馆<sup>①</sup>和匈牙利后，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才算解决了。

政治犯被释放了，大部分是大赦释放的。1962年，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刑的人有95%获得了自由。1963年，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匈牙利时，卡达尔是这样谈这个问题的：“当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很强硬的，但后来我们可以宣布大赦了。我们能够实行大赦，是制度的力量使然。今天，在匈牙利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政治罪行坐牢的。我们进行惩罚时也是遵循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因为当我们被迫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宁可严格处理一些人，而不要在后来使更多不论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还是因受骗上当而头脑发昏的普通人，成为不是自己所主动采取的行动的牺牲品。”

既要惩罚却又谈论人道主义，看来似乎是荒唐的，甚至是虚伪的，但实际情况是：当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时，秩序已经巩固到如此地步，以致即使这些人再次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也不是构成政治威胁了。（事实上除了极个别例外，并没有发生过这类事。）卡达尔没有重犯拉科西的错误，他没有忘记监狱的面包有多么苦。

1956年10月以后离开这个国家的人也得到了赦免。“我们等待每一个希望在匈牙利生活和工作的人回来。”卡达尔说，“至于那些已经在国外扎下根的匈牙利人，我们希望他们做故国的好朋友，维护匈牙利的名誉。”我想，自那以来，没有回国探亲的人

---

<sup>①</sup> 1956年11月4日明曾蒂躲进美国驻匈使馆政治避难。

为数不多了，每年有许多人在匈牙利休假，退休后回来定居以及留下遗愿希望把遗骨安放在祖国的土地上的人越来越多。

今天，当每年有成百万西方公民到我国来以及匈牙利公民去国外时，想起卡达尔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sup>①</sup>上，作为成就所谈到的旅游者的增长情况时，人们往往会粲然一笑。请看：1958年有二万六千，1961年已有四万三千个匈牙利公民去西方。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49—1957年实际上没有一个旅游者越过匈牙利的西部边境，无论是从西方到这里，还是从这里到西方都是这样。那么，这些数字就不那样使人发笑了。

对党和党员任务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在贯彻这句“妙语”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无论在1956年前和1956年以后，党一直是国家的领导力量。按照列宁的提法，共产党是那些了解工人阶级的作用和目标，并代表其利益和政权的人的自愿联盟。1949年以后，党的这一作用受到了莫大的歪曲。一部分原因是少数几个人成了党的主宰。坏榜样带有传染性，尤其是被体系化以后更是如此。于是，在国家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小霸王越来越多，发号施令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党有一百万党员，但远不是一百万共产主义者。许多人是由于有根据的或是没有根据的恐惧入党的，不仅那些担心自己地位的人是这样。我的当保育员的母亲在1956年前是党员。尽管她出身于最穷苦的工人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可以把她叫作落后的小资产阶级。我的当小职员哥哥过去也是党员，可是对政治毫无兴趣。但不是他们，也不是与他们相似的人是最坏的。最坏的是那些投机钻营、滥用职权、胡吹胡捧、打小报告、见便宜就占和拍马屁的人。质量上很差的党既对自己估计不足，也不可能真正的威信。但他们宣称，党员是不同于任何人的特殊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绝症的根源在于：它认为，它必须统治全国。

---

<sup>①</sup> 1962年召开。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956 年底有十万党员，1962 年是五十万。我不能说，在这些人中没有无原则的、想入党做官的或机会主义者。但我认为，绝大部分党员是共产主义者，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们不是明察一切的超人。

“我经常说，” 卡达尔道，“如果我们接受他们具备入党条件的党外人士越多，不具备条件的党员越少，那样就好了。”

为了不让人们把党籍作为向上爬的阶梯，必须使党外人士也能充分发挥才能。

卡达尔说，“这一点不容易为许多人，其中包括正派、诚实的共产党人所接受。他们不理解：我们宣称党的领导作用，但却要让党外人士领导党员，并担任重要的国家和经济方面的领导职务。”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除了旧思想和个人利益外，被错误理解了的理论不仅在人们的思想上，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公开宣称和承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时更是这样。

在匈牙利早已禁止党的机关向国家和社会机构发布指示。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党着重宣布：它的任务不是统治人民，而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作诡辩法，因为政权的实际领导者仍然是党。但鉴于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我们还是不能这样说。因为执政者以什么样的认识去行使权力，并非是无关重要的。

当然，决定性的因素是，怎样使领导体制制度化。这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党不再由三、四个人独断专行。诚然，卡达尔始终是平等者中的首要人物，但事实是，领导机构，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重新成了真正的指导机构，党的地方机关的职权范围大大扩大了。

党还有一个严重的历史包袱。它必须阻止并且使全国相信，不再重犯 1956 年以前在违反法制的案件中达到高潮的 错误和罪行。与这些错误和罪行有关的一些人，包括法尔卡什·米哈伊和

彼得·加博尔被送交法院并判了刑。1962年大赦时，他们也被释放了。拉科西·格罗及其他二十多名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人被开除出党。凡与非法的做法有关系的人都从内务、监察、法院和党纪工作部门清除出去。同时为专制统治的牺牲者昭雪，对其家属给予抚恤，不仅为进过监狱的人，而且为无辜受到排挤，其中包括苏维埃共和国和西班牙内战时的一些老战士恢复了名誉。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当时确实也是出现了——难道不需要把最主要的罪犯拉科西·马加什也提交法庭审判吗？我想，这不需要。即使在法律上是合理的，也不需要那样做。消除那种下台的政治家必然要进监狱的可怕的实践，是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切身利益。即使花的代价是罪犯在法律上不受惩罚，也必须停止这样做。拉科西再也没有能回匈牙利。他在1971年死去。

怎样才能保证过去的罪过不再重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绝对的保证。没有任何宪法、法律、社会和政治制度可以根除专制统治在一个国家——不仅在匈牙利——抬头的可能性。当然，政权体制越完善、越民主，就越能阻止专制统治的出现。但改变国家的政治准则，让人民学会，并让人们刻骨铭心地痛恨专制统治，也是同样重要的保证。而且让政治家们也牢牢记住，不要以为个人统治是灵丹妙药，不要迷恋和追求它。要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需要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但匈牙利在过去二十年中在使其公民具有这种抵抗本能方面迈出了不小的步子。

以这句“妙语”为基础的政策，既不是什么自由化或权宜之计，也不是被迫的过渡措施或妥协，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有机部分。为了使大家接受这个观点，卡达尔不得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我们也不要错误地认为：今天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在二十年前也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对许多人来说，远非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学的是另外一套，也习惯于另外一套。那种以为在匈

牙利一切都由一个中央的意志决定、没有观点分歧和斗争的人大错特错了。卡达尔的政策只是在许多人在相互的厮杀中，受到了大大小小的挫伤以后，才被认识和巩固起来的。

“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的政策实质是信任。拉科西一伙在初阶段的振奋以后，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们那时想，如果国家想的非他们所想，国家不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那么，人民不是敌人就是傻瓜。这个谬误的想法就是他们政策的基础。按照这个臭名昭著的提法，他们不得不依靠九百万法西斯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决定了他们的行动和手段。拉科西欣赏的一句话是，乌鸦成不了凤凰；他不相信人们会变化和可以使之变化。

“所有坏事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卡达尔说，“但人民不应该被怀疑。这个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共产党人是为这个人民服务的。在负责岗位的人，他担任领导职务是为人民服务。既然要为人民服务，就不应该做反对人民的事。”

匈牙利解放后二十年，这些暴风雨的年代使民族经受了真正的考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每隔三、四年发生一次根本的变化，他也很难忍受，何况一个国家。但到1964年，卡达尔已经有理由说：“过去是梦想的事，今天正在成为现实。一个真正的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具备了。”

这是一个严谨的卡达尔式的提法。他没说已经实现了民族团结，而只是说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具备。在1956年以后的八年、农村改革的后三年，这是个巨大的成就。由于卡达尔的口号，全国绝大多数人在基本问题上确实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经受许多考验之后，安定、健康的时期将会出现。我们多少是乐观的，我这样说并不感到惭愧。

“如果我们看一看1956年11月4日早晨是什么情况，”卡达尔在1963年夏天说，“那我仍然要说，我们为经过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还希望在工

业、农业、教育、文化和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什么成绩，那我们应该感到很满足。”

情况确实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面临一个新的巨大问题，即改革经济的必要性。

普遍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弊病、错误和困难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不是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是在经济和社会发达的国家中，而是在不发达的国家出现的。从四十年代末起，匈牙利就处于一个冷战世界和在深感威胁的病态心理状态中。这也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设法使我国成为一个“钢铁国家”。在一个原料贫乏、主要是农业的国家中，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匈牙利曾经是奥匈帝国的粮仓，当时工业主要在奥地利和捷克。三十年代，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联盟中这种情况也曾经出现过。

尽管这样，匈牙利在十五年内成了一个工业—农业国。但花的是什么代价啊！四十年代末开始，以极为勉强的速度首先是在重工业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其结果是：1950—1952年，工业生产增长50%，居民生活水平下降20%。

完全集中的经济管理也不好。所有经济指标都是统一决定的。他们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在首都，在一张办公桌上准确地规定国家的所有生产单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和权力结构相一致的，在那里所有重大决策都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与原来的设想相反，几乎把全国所有的生产单位都国有化了；不仅把工厂、企业和银行，而且把糖果店、饭馆、鞋铺和钳工作坊、理发馆和副食商店也国有化。这种做法也是不合适的。我可以稍许夸张地说，展现在当时的领导人面前的理想景象是，全国只要有一个钢铁厂、一个面包房、一个食品公司和一个生产合作社就够了，只要一按电钮就可以统一进行管理。

属于当时时代特征的还有，生产中的唯一观点是数量。这也

有它的现实基础。因为开采的煤、铸的钢、制作的衣服和烤的面包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需要。甚至在出口商品方面也没有质量观点，因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存在商品短缺问题。因此，任何商品都有买主，无论多少都能卖出去，不管质量如何。至于匈牙利，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可就是做不到自给自足，必不可少的原料还是需要进口，而匈牙利需要用出口商品来换取这些原料。

这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庞大的机器虽然在转动，但到处都是杂音，不仅轮子坏了，人卷进轮子里去了，而且整个机器面临倒塌的危险。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取消了物质利益原则，当然无从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一方面整天价地宣称完成了定额的几倍几倍，实际上，在本专业工作的人都很清楚，这是撒谎；另一方面，随着工作量的提高，定额也随之提高，但又必须超额完成任务。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凡是企业、生产单位、劳动队和工人尽可能完成 103% 的工作量。因为已经超额完成计划，便可得到表扬，但又超过得不太多，以致用不到修改计划和定额。“在我们这里，劳动是受尊敬和光荣的事”——过去的口号是这样宣称的，但它把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利益排除于经济生活之外了。

行政机构也随之不可避免地以难以置信的程度膨胀着。这在匈牙利是有传统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社会阶梯上最小的职员地位也比最有技术的专业工人高得多。一个是“老爷”，另一个是“苦力”。那么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为什么不努力使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也成为“老爷”呢？许多人是奉命去坐办公桌的，其实他们宁可留在工作台上和地里。这种人我认识不只一个，好几个人生命以悲剧结束。

中央集中管理铁面无情的要求提供成百万的表报、报告和统计材料，而且这些材料需要有人制造、加工、登记和存档。我本人也曾多年从事制造、检查和转送各种表报；我知道，过去匈牙利的经济是根据文件堆里挑出来的数字进行管理的，它们很难反



映现实。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是以歪曲的形象出现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去美化他的报告。即使存在一架无所不能、能够决定一切的中央电脑，它也会发出错误的决定，因为它得到的材料是虚假的。

六十年代，经济生活中最明显的错误虽然减少了，但结构实际上没有变化，而且出现了新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劳动力。飞跃发展的工业有两支后备力量，即农村劳动力和妇女。1950—1965年，工业的职工人数增长了一倍，而农业劳动者人数却减少了一半。在这十五年中，女职工人数增加近一百万人，其中大部分进入工业。但到这个时候，潜力已经挖尽，再也不能通过增加数量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了。

全国居民那时吃饭穿衣已经没有问题，而且不愿意见东西就买，企业也不愿购买，外国更是这样。这就成了大问题，但是工厂却依然大量生产着商品，因为它们首先考虑的是生产数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有买主，对它们是无所谓的。仓库越来越挤，滞销的商品堆积如山。

当人们每天都能吃饱，而且有衣服有鞋穿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要忘记，1945年以前，这对全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就开始买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小汽车。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被人为地破坏了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平衡已经大体上恢复了，居民的商品供应越来越好，但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缺乏服务性行业。迁进有卫生间住宅的人希望，如果洗澡盆的水龙头坏了，要及时修好；有小汽车的人需要经常保养小汽车；洗衣机、电视机和收音机坏了要有人修理。只注意生产数量的大、中型企业是不适宜完成这个任务的。现在才真正感到缺少被停业的钳工、管子工、木匠和其他作坊了。

这就导致产生了所谓的第二经济。也就是说，管子工、木匠和油漆工在工作时间之外，有时甚至在工作时间内，在其他地方承担工作。有时价格虽然很贵，但用户的困难得到了解决，因为

他们不能等到国营企业和合作社规定的日子。对于国家来说却放弃了向这些工作征税的权利。

统一规定的价格同成本和世界市场价格都不相适应。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产品都由国家补贴，因此，不仅弄不清楚生产什么产品合算，同样也弄不清楚哪一个企业盈利，哪一个企业亏损。

对经济体制的研究，揭示了许多关于匈牙利政治、精神和科学生活的问题。早在1957年改革的必要性就被提了出来，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被否定了。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中央委员会1964年12月全会上强调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卡达尔1965年初在国会上宣布，一年后将把彻底改革经济管理提到日程上。几百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专家参加了讨论、计划和准备工作。卡达尔在1966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从1968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经济体制。他在1970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改革开始了，并且进行得很顺利。七十年代初，改革过程似乎停顿了一下，但过了几年，又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力量继续进行下去。

卡达尔在1965年国会上讲话时是这样阐述改革的实质的：

“在最近几年，我们除了合并工业企业外，没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机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工作得不错，另一方面——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力求稳定。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我们的经济管理制度，同时要提出今后进一步合理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设想。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反应迟缓、笨重。从而部分地造成了使以昂贵的原料和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商品不太符合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而积压在仓库里。正当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同时又是贸易竞争日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商品的现代化程度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必须把在价格和质量上经得起竞争的、现代化的商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否则我们就要失败。这指的是西方市场。但我要补充说明，在社会主义世界内部，别

人购买我们不好的或没有用的商品的时期已经结束，正如我们也不会购买这种商品一样。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鼓励手段也是主要有利于超额完成数量计划，而不是有利于经济地生产和改进产品质量。甚至有时奖金和奖励制度还对质量要求起反作用。”

在他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还谈过不少改革的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卡达尔很少使用专业名词，连最简单的也很少用。这不仅是性格问题。

他说，“政策的任务在于用普通人的头脑考虑问题。而人们接触的不是经济学和哲学概念，而是现实的形势和状况。”

卡达尔在一次讲话中引述了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匈牙利人讲的话。他说，他希望在匈牙利工作，在加拿大领工资。由于物质刺激不起作用，人们在工作单位不太卖力。这就反映在国民收入以及以此为根据所支付的工资中。卡达尔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得十六福林，他就根据这十六福林来评价社会主义。如果得四十二福林，他就根据这四十二福林来评价。关于工作，卡达尔说：“从前有一次，拉套车的马中间，有一匹偷懒的马，它只要装个样子就行了，因为车子的另外四匹马正拉着呢。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不能像四匹马拉车，而一匹马只摇摇鬃毛那样生活。”关于补贴，他说：“六年前，一个人走进小酒馆，要了二两葡萄酒。他喝了这二两酒，就得八十非列的国家奖金。因为喝酒的人付的钱比国家酿酒所花的钱少。”关于服务行业，他说：“请允许我引述一个妇女从首都给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写的一封信：‘你房间的墙壁上的那个窟窿还在。工人本该星期一来修，他们没有来，因为参加婚礼去了。星期二是节日。星期三他们来了，但那时下雨，他们说，下雨不能干活，要等雨停。我现在正盼雨停。但我相信，等你回来时，那个洞总会修好的。’我是在一本写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书中读到这封信的，作者是生活在巴黎的、世界著名的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妻子。但是，今天布达佩斯的许多人也同样会写这些话的。”

我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中期，国内一部分人迫不及待地要求进行改革。而另一部分人却十分担心。

卡达尔说：“制定改革方案用了三年时间，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主张。经济计划也是有的，但在考虑改革时还必须注意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开始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不统一，全国的意见也不统一。当时，保持国家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毕竟1956年的动乱离开我们还很近。为了求得团结，宁可讨论得仔细一些。”

卡达尔的作风和思想方法是很有特点的。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是这样一种战士，即当我喊一声向前冲的时候，我总是想知道，有多少人会跟着我来。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战斗。如果有五个人跟上来，我就向我用五个人就能包围的堡垒冲锋；如果有一百五十个人冲上来，那我就可以考虑其他任务了。”

1956年他同样是这样做的。当时他谈了又谈，但我相信，一开始他就知道，一部分谈判对手他说服不了。后来在农村改革时也是这样，宣布民族团结时还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所有新建议、新思想都是卡达尔提出来的。他也在学习，他从实际生活中和从别人那里都学到了不少东西。即使当看法形成以后，他也知道，如果许多人不同意，即使他说的话是对的，也没有用。他力图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但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看法。

新经济体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直到现在改革的第二个繁荣时期它还没有真正被舆论所接受。但是，早在1962年卡达尔就论述了这个要求：“必须停止生产不经济的和过时的产品，必须合理地利用因此而解放出来的生产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有计划地调配劳动力。”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这些话以后已经过了十七年，全国一个最大的工厂，由于不能合理地使用劳动力，解雇了三百名职工。这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以致报刊和电视台一连几个星期都谈这件事，说什么三百人流浪街头。当然实际上任何人也没

有流浪街头，但是这些人必须改变工作单位。不过二十年来这种事情在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过去三十年里，匈牙利的许多事没有搞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六十年代起，公民已习惯了没有任何一丁点威胁他们生活的东西。要把某个人从工作单位解雇，他至少必须进行偷盗。一个人不管其工作好坏，不管他的工作需要不需要，他都在单位里呆着。法律保护了他，劳动力缺乏保护了他，坏的调节手段保护了他，被错误理解了的人道主义保护了他。从这个角度看，使用人的单位和被用的人之间无疑是后者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他同领导搞不好关系，在周围同事中感到不愉快，如果其他地方答应给更多工资，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换工作单位。大部分职工、辅助工人和技术工人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总能找到新的工作单位。

可以理解，在一个失业曾经涉及和威胁到数十万人的国家，充分的生活保证是个巨大的成就。无怪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顽固地坚持原有的东西，而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其中某些不利的东西。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实行改革如此困难，为什么改革有阻力，为什么有停顿，为什么今天还会遇到种种困难。

卡达尔说，“我多次说过——实际上并不需要说，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认为匈牙利缺乏劳动力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是，劳动力没有用在需要的地方。当然，任何时候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可是他们回家后却在那里坐等其他入给他们扫门前雪。”

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每个爱思考问题的人，当他看到一个单位因为人手不够，工作进展不顺利，而另外一个地方的职工却闲得没事可做；一个企业生产亏损，另一个企业则不能充分利用昂贵的机器设备，他会感到气愤和骂人的。可是如果在那里要设法改变这种状况，而这种变化又涉及他们自己时，他们就会愤怒地反对，并说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和人道

主义的原则。

当然，错误主要不在于人，而在于结构。改革初期最大的问题也许是，谁也不清楚，需要以什么速度和在多大程度上来改革经济制度，同时又不至于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有的人敦促从速进行，有的人则要求慢慢来。不管怎样，196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卡达尔的以下看法，充分反映了他对这一点赋予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我看来，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为一项任务，同我们在1956年为了保卫工人政权和六十年代初为了改造农业所做的工作同样重要。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如果我们以列宁的精神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象共产党员那样工作和生活，那么，就必须经常提出一个对革命来说是实质性的问题：什么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最重要的环节？我不是说——希望谁都不要误解——，政权问题或农业改造问题无关紧要，只有经济改革重要。但我想强调，现在和今后几年中，从国家内部发展来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得以相应发展，和工人政权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的决定性环节。我请求大家把它当作这样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并与之相应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无须作很多解释。人们注意到，人民民主制度已经确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合适的条件下通过合适的方法实现，大家认为这些都是好事。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走？对我们来说，下一步就是改革经济领导。表面上看起来这是经济问题，但是它可以反过来影响政权和制度的巩固，以及我国工人阶级的情绪，影响人们以什么样的信任看待党，跟随党和共产党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在七十年代初期还是停顿下来了。1974年解除了不少公众舆论称之为主革派的领导人的职务。各种消息和谣言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地。人们谈论着什么“强硬”政策又要恢复，改革已经失败，政策僵化，等等，甚至说卡达尔要退居二线。中央全会结束后几天，一次在国会大厦举行的

招待会上，我匆匆地遇到卡达尔。他显得疲劳、焦虑。

“有什么新闻吗？群众是否有点惊慌？”他问道。

“没有惊慌，”我说，“但大家都觉得心里没有底，许多人担心走回头路。”

卡达尔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态度十分坚决的时候别人是可以感觉出来的。那时他十分坚决。

“确实有许多事值得我们担心。”他说，“但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这点你可以告诉大家。”

当时工人和农民之间关系比较紧张，这是事实。六十年代中期，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是城市里所没有过的。农村里设备齐全的住宅，犹如雨后春笋一幢幢平地而起，代替了旧的小土坯屋。七十年代我访问过不止一处农舍，那里除了各种农机外，全家还有两辆西方小汽车。这在匈牙利收入最优厚的知识分子中间也是罕见的。

有人认为，经济改革给农民的好处要比给工人的多。他们忘记了农民物质上的起点比工人低得多，而从自留地经济获得额外收入，不能只靠每天八小时劳动。工农混合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要把两个阶级的利益截然分开已不可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安全感外还要通过物质鼓励来提高，而只有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才能逐步改善对工人和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和国民经济的平衡，从而对全国群众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企图通过降低对农民实际的物质鼓励来解决关系紧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代替它的应当是制定对工人阶级的比较实际的物质鼓励办法。想以削减农民收入来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人，只能达到相反的目的，这在改革停顿期间已有所表现。如果农民从超额劳动中得不到好处，那农民就会放弃它。

确实，实行新经济体制后，个体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开始增多，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工人。但是，以高收入触怒了其它劳动者作借口，来限制个体经济成份，也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事实已经证明，机构不够灵活的国营企业无法完成对居民的各种服务工作，而不解决这一问题会引起全国的不满。不仅会在经济上，而且也会在社会和道德方面造成后果。日益强大的第二经济<sup>①</sup>的不断发展，清楚地表明，这一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三十年前匈牙利摆脱了特权起着决定作用的半封建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今天，平等精神统治着全国；而且不少人认为，在一部分人要为每天生活发愁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建造高级别墅、夏季避暑住所，购买小汽车，去海外旅游，是对社会主义的嘲讽。对于这种情况，我无法表示明确的谴责。但是，这种平均主义忘记了一个事实：除特殊情况外，高收入都来源于非凡的才能或超额劳动，也就是说，它产生于国家不能成功地建立合适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地方。不合理和不道德的额外收入以及小费、酒钱的不健康增长，大多数基于这个原因，而不象很多人相信和承认的那样，是由于被新经济体制从魔瓶中放出来的那个小资产阶级思想。

早在新经济体制实行之前就发生了所谓“冰箱社会主义”的争论，扰乱了整个社会舆论。许多人认为，福利是危险的；如果匈牙利也宣扬消费观点，如果人们追求小汽车、电冰箱和小别墅，如果私人财产不断扩增，那么，社会上就要重新产生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有合理的成份，也为过去的实践所证明；但是，不致力于提高社会福利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提倡人民禁欲，在困难的情况下也有必要，但从长远和持久的观点看，这样做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不应通过减少收入，而应通过其它办法，使人的生活目的不只是为了发财致富。计划和实现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几十年来我们承认这一原则，但没有遵守这一原则。

---

<sup>①</sup> 指近年来匈牙利把职工在业余时间内进行的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服务等劳动称作第二经济。



这里也有平均主义的表现，它从某种意义讲也是正确的。有的人给国家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平常人创造的一百倍。我不相信让他得到一百倍的收入是明智的做法。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拿着这么大一笔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且不说别的理由了。然而，对工作好与坏，认真与不负责，有才能与没有才能的劳动者一概不加区别或只是作很小的区别，也是错误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社会主义不可能有普遍的合理。有的人生来强壮或有才能，有的人生来虚弱或没有才能。这些基本条件社会无法平衡。

一般说来，人人都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实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其原因不仅在于强烈的、在许多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平均主义思想，还在于贫穷和错误的经济结构。社会主义一般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那里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工资，是社会上的合理要求。但其结果却是，任何人也得不到超过一定数量的工资。匈牙利至今还未陷入经济危机，是因为坚守了一条基本原则：对居民的分配不能超过社会的生产量。

围绕经济体制的争论，改革的停顿和动摇，都有其一般的政治原因、思想意识和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经济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平均主义与利益原则，中央领导与自主权，抽象的社会利益与具体的个人和集团利益，数量与质量，价格补贴与国际市场价格，因循守旧与承担风险，等等，两者之间存在着斗争。

上述困难并不意味着匈牙利经济已经濒临破产。相反，几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断发展，以致今天要改变这个居民已经习惯了的非轻而易举。

同1950年相比，1980年的国民收入等于当时的五倍，工业生产总产值等于八倍多，建筑工业生产等于六倍半，农业生产等于两倍，外贸进出口额等于二十倍多，实际收入等于三倍多，住宅建设等于两倍半，托儿所床位等于十倍多，幼儿园床位等于四倍，中学和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等于三倍。1950年，来匈的外国旅客只有三万七千人，1980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万人，超过匈牙利本

国人口。出国的匈牙利人1950年为一万九千人，1980年增加到五百多万人。1950年只有47%的居民享受公费医疗待遇，1980年已经全民享受。1960年全国只有六十万台收音机和一万六千台电视机，1980年各有二百五十万台。

我还记得我的童年，那时候好几家邻居围在一个个咔吱咔吱响的收音机旁，收听布达佩斯电台节目，因为收不到别的台。在我成年的时候，楼道里的居民一起蹲在一个个电视机前看节目。解放以前我所认识的职位最高的人，一位是上校，一位是匈牙利广播电台台长，他们谁也没有汽车。1980年匈牙利居民有一百万辆小汽车。

七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世界经济价格暴涨，使匈牙利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今天为了进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要比五年前增加20%的出口，比1950年增加35%，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增加60%。1957年以来，首次在1980年出现了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进出口和居民实际收入比前一年略有下降的现象。

世界经济危机决定了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命运，虽然时间上迟了一些。这是一条前进的道路。对此，1976年卡达尔曾经这样说过：“不要再为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化抱怨和空发议论了，倒是应该坐下来仔细研究使国家保持收支平衡的办法。需要提到的是，现在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一系列问题，但坦率地说，即使不是这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迟早也要把这些问题提上日程。”四年以后，他又在党代表大会上归纳说：“外部经济条件的不利变化更加尖锐地暴露了我国经济的弱点和工作上的失误。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也完全能够用改变产品结构和有选择地发展工业的办法，来有效地对付各种不利条件，但是，我们的经济管理还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以足够快的速度和灵活性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向内涵经营的过渡，生产效益的改善，以及生产和产品结构的现代化，在速度上都落后于形势的要求，而目前国民经济的工艺技术水平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说今天处于更加恶劣的世界经济条件下，我们也能比七十年代中期乐观，主要是因为国家和领导已经认识到，经济结构和体制的重大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即使它会引起新的社会紧张。尽管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工作中的拖拉现象也十分严重，还一再要同落后、保守和疏懒的作风发生冲突，同个人、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发生矛盾。世界政局也很不利，但是，认识和承认变革的必然性已无可置疑。因此，人们可以期望，匈牙利不仅能恢复经济平衡，而且能形成一个同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经济结构。

众所周知，卡达尔不很喜欢旅行，他多次公开这样讲过。如果我没记错，他四十八岁那年才第一次去西方。那次去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国家领导人的亲自会晤能促进和平共处，个人之间的了解，即使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也比不见面的对抗要好。1960年10月社会主义国家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由政府首脑率领。卡达尔乘“波罗的海”号远洋轮到达美国。

1958年10月卡达尔曾经说过：“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会好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即美国的执政者注意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多瑙—蒂萨河畔居住着一个民族，她信仰、建设、并且永远也不会放弃社会主义”。

当卡达尔讲这些话的时候，美匈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明曾蒂·尤若夫在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得到了庇护权。匈牙利政府驱逐了美国驻匈牙利的公使<sup>①</sup>，并照会要求使馆减少人数。可以看出，美国领导人对匈牙利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还不死心。联合国内“匈牙利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列入大会议程。在国外的匈牙利流亡者的头目得到了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他们扬言卡达尔政府是非法的，并向国内派遣了许多间谍和代理人，企图在匈

---

① 当时两国间是公使级外交机构。

---

牙利组织一次新的起义，至少是制造混乱。但是，匈牙利的组织也不袖手旁观，一个在十五年后公布的材料说，当时匈牙利流亡

过去。而我，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员工人，还一直在这里，甚至在纽约。我敢预言，这种现代的行动限制也不会比那时霍尔蒂高级官员对我的限制有更大的前途。”

卡达尔在联大全会上发言。在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改变了语调，使一个注重客观事实的发言变成了个人的自白：

“我们代表团是在联大会议期间到达的。美国和匈牙利之间存在着外交关系。美国当局有加倍的理由根据国际惯例在纽约为我们保证相应的条件和权利。但是，与此相反，美国当局却向我宣布了对我国人民和政府带有侮辱性的、限制我个人行动的措施。这一措施不会给我和遭受同样待遇的我的同事们带来耻辱，也不会给我国人民带来耻辱，而唯一应该感到羞愧的是这一措施的策划者。但是，从原则出发我抗议这种做法。在这个讲台上我个人曾经多次受到攻击。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谈一点个人的想法。我是一个匈牙利工人。由于我的世界观和信念，我受过霍尔蒂法西斯制度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不少迫害，但我总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良心行动。一个人可能做错事，也可能有失误，但我觉得，我在为正义的事业服务。使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历史的严重时刻，我与忠诚的同志们一起，为了工人阶级和苦难深重的匈牙利人民，站立在我应该站立的岗位上，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时，联合国会议厅里掌声四起。这个机构里，在有人对1956年10月后的匈牙利制度表示忠诚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景象，还是第一次。

纽约之行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它并没有给人留下愉快的记忆。但是，不大喜欢旅行的卡达尔，尤其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到过很多国家。1975年8月他率领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12月去波兰和古巴。1976年2月访问苏联，4月访问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5月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6月去柏林参加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晤，12月访问奥地利。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接见外国首脑、政治家和党的领导人。我

这样说，也许不是民族自大：一千万人口的匈牙利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因素。

十年来的政策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基础。对此，卡达尔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希望，同我们接近的和有距离的国家都能理解和知道，如果匈牙利人说‘是’，那就是‘是’；如果说‘不’，那就是‘不’。凡是我們接受的东西，我们都真诚地支持；凡是我們不能同意的观点，我们也要说清楚。政治领导人都希望自己有说话算数的伙伴。我们将坚定地努力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伙伴。我们要做我們盟友的忠诚盟友，我们也就是这样的盟友！我们要做我們朋友的忠诚朋友，我们也就是这样的朋友！对另一方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就是好的、遵守信义和诚实的伙伴，而且今后也是这样的伙伴。”

对于卡达尔来说，不管接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孪生概念，还是接受和平共处的思想，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他的青春、教育和个人经历都没有鼓励他去这样做。

“在我成长的时代，”他说，“国旗是霍尔蒂时期的象征，祖国的概念就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我仇恨这一统治集团，蔑视它的象征和制度。但是，经过很长时间我才懂得，红、白、绿三色是民族的象征，而不是霍尔蒂的象征，祖国是匈牙利人民的土地，而不是霍尔蒂制度的土地。”

爱国主义首先是感情问题，国际主义则产生于理智。但卡达尔的感情也是国际主义的，他是无产者，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那种人。

卡达尔青年时期就仇恨一切剥削制度。只有当他懂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就是他的阶级、人民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利益的时候，他才真正成为合格的国家领导人。特别在这些国家的发言人多年来一直咒骂和污蔑他之后，他还能坚持这一看法，是不容易的。

对他来说，同苏联的关系从来不是什么问题。他经历了滥用

个人权力的错误时期，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信念：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没有苏联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卡达尔说：“有些人不知有多少次把我说成是苏联的仆从。让他们去说吧！这对我来讲是一件简单明瞭的事：如果我不在匈牙利生活，而在澳大利亚，我的看法也仍然是，苏联是社会主义最强大的力量。”

他笑了。

“他们不理解我所说的意思：如果莫斯科下雨，匈牙利不必打伞。因为他们不懂得国际主义的实质。不需要互相抄袭，这对谁都没有好处；但要尊重别人好的方面，要从别人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从来不为向别人学习感到羞耻，却为有可以学习的人感到高兴。”

大家知道，卡达尔喜欢赫鲁晓夫。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斗争的基础上的。我还记得赫鲁晓夫免职时在许多匈牙利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斯大林时期还过去不久，人们担心这一变化可能导致恢复旧的政策和做法。

这一天卡达尔在波兰。他返回匈牙利时，全国都期待着他发表讲话。他从乘坐的专列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也在火车站。他不先回办公室，也不先同人商量，向人打听情况。一回来他就向全国讲话，态度十分沉着、诚恳。

“本星期发生了很多事件。有的消息使人高兴，有的令人惊愕。我想诚恳和坦率地提到这一点。诚如大家知道，苏联最高领导层中发生了人事变动。赫鲁晓夫同志鉴于本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提出辞职，他已经被免去职务。选举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继任。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政党，哪个国家，都由本党、本国作出决定。我个人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在维护和平方面，有过重大的功绩。他曾经为和平而工作。过去和今年，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有机会欢迎过他。赫鲁

晓夫同志作为苏联国家和人民的代表，和平事业的不倦战士，在我们这里受到了衷心的欢迎。我相信，人们这样做是对的，事后想来，也不必懊悔。对于我们来说，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是，在各个大家所熟悉的问题上，在和平、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各国团结方面以及国际共运的那些人所共知的问题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将来也不会有变化。”

车站上爆发了一阵阵的掌声。卡达尔轻轻地干咳了几声，又继续说，“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因人而异，因为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强调指出，匈牙利共产党员和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匈牙利人——这种人占我们的大多数——总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和建立良好的同志般合作的愿望，去会见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代表，并同他们一道工作。他们是我国人民最忠实的盟友，国际生活中最强大的支柱。这次在领导岗位上接替赫鲁晓夫同志的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友谊把我们和他们连结在一起。迄今他们也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现在再次重申的那一总政治路线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他们重申，今后指导他们行动的仍然是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在国际生活方面则是保卫和平和团结进步力量。这些都没有变化。今后的匈苏关系也不会有变化。”

拉科西也不断欢呼过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重点总是放在“伟大”上。但他的政策使人们完全丧失了对这一形容词的信任。虽然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确实是伟大的，而且这不仅是量的概念。卡达尔懂得如何使全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主张大国和小国的关系不是依附和从属的关系，而应该反映现实，因为他的政策恢复了人民已经失去和受过损伤的自觉性，因为言辞确实重新获得了原有的含义，因为对卡达尔来说，同苏联和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意味着对别国人民的尊敬，意味着感受深切的国际主义和真正代表民族利益。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致力于同匈牙利和平共处的年代里，卡达尔仍然坚持这一原则。没有比这更能说明，对于他来说，和平共处绝不是什么华丽的词藻。卡达尔曾经不止一次地受到卑鄙的攻击、侮辱和诽谤，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他总是将个人从属于原则。他曾经精辟地指出：我们并不把和平共处简单地看作无战事状态，它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存的方法，其条件是建立正常的政治关系，进行最广泛的经济、文化合作和人员接触，达成互利的协议。

时间证实了他的话，即使当今世界政治上又是凉气逼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同一百二十六个国家——实际上同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进出口额都已相当于1957年的十三倍。

“我不认为，世界命运取决于匈牙利。”卡达尔说，“我们是一个小国，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改造世界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任务和责任。”

事情恰好相反，两大世界体系的出现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加了小国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一个小国的错误政策可以迫使其盟友陷入它并不喜欢的处境中。

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许多不同的利益、意愿和见解也必须在联盟内部得到反映，以促使各国都采取忍耐、灵活和谅解的态度，否则世界易于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这是小国的任务，至今从未有过这种可能性。小国的政策的好坏，不仅可以改善或损害本国人民的命运，而且还能影响有几亿人口的整个联盟体系。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它们的人口、军事或经济力量本身所赋予的能力。

卡达尔认为，不仅考虑本国的命运，而且也考虑世界的命运是他的权利和义务。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决定命运的时代，它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带来灾难；可能成为人民幸福和不同民族融洽合作的时代，也可能成为各国人民可怕

地彻底毁灭的时代。人类的命运现在就要决定。保证人类的未来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一边是各国和睦共处、扩大富有成果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令人鼓舞的前景；一边是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热核战争危险。显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阻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我衷心希望，我们的时代将以为人类的和平未来奠基的时代载入史册。这样的时代才有可能使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得到顺利贯彻，各国社会繁荣，全世界共同的困难得到解决，每一个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这一谈话是卡达尔在纽约受到侮辱、被喝倒采后十八年发表的，刊登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一家最主要的日报《纽约时报》上。

近来我不止一次听到访问匈牙利的政治家、记者和游客对匈牙利的过分的赞扬。事物从表面看来，往往要比那些身历其境和了解内部困难、问题的人看来显得美好和简单得多。当然，我也不喜欢来访的外国人透过黑色眼镜观察我们的一切，而且他们不仅在了解情况方面有应该改正的地方，如同不久前一家西欧有名望的报纸发表的通讯那样。这篇通讯竟然说，匈牙利没有面包，买不到糖，燃料只能在黑市上买到，也看不到任何书店。

匈牙利有面包，有糖，有燃料，也有书店。但我们对这些还不满足。

七十年代初期对国家名称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建议把国名改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

卡达尔在党代表大会和国民议会上都反对这种主张。

“国家的正式名称，”他说“不应该反映目的，而应该反映现实情况。”

至今匈牙利的国名仍然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我们喜欢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卡达尔说：“我们有社会主义的信念。我们总是讲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社会主义商业。按词的基本意思，这样讲是对的，我国的工业、商业和农业从实质上看都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如果从局部看，从可能或者已

经发生的错误来看，暂时宁可笼统地讲‘工业’、‘农业’、‘商业’，一直到千百万人开始承认这是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社会主义商业为止”。

匈牙利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历过四个决定性的时期：生产资料国有化，巩固政权，农业合作化和实行新经济体制。前后花了三十年时间。谁都不能确切知道，我国经济什么时候才达到可以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我也不相信存在一条想象中的终点线，只要冲过这条线，就可以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社会。尤其因为在社会关系、绝大多数人、普通的精神道德和社会观点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很难说得上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

关于这一点，卡达尔是这样说的：

“社会主义的完全建成，要求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工具，需要更高水平的科学、公共教育和文化，还必须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此外，我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更多的面包，独立的住宅，电冰箱，甚至小汽车，而首先需要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经济任务，而且还必须保证人的生活得到彻底和真正的发展，个人和集体之间建立和巩固融洽关系。”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关系。如果消灭了剥削，如果有吃有穿有工作，物质要求至少可以得到中等水平的满足，如果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如果巩固了法制，男女公民之间再也没有区别，如果每人都至少能学完八年小学，到那个时候，人是要起变化的。但是同建立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结构一样，建立公共生活的社会主义结构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从字面上解释，民主这个词最广泛的意思就是人民统治。从这一意义来讲，匈牙利是有民主的。

从另一种意义讲，民主是国家机构。群众语言一般指的是这一含义。民主一词的字和概念都源于希腊，但它的意义却是在资

产阶级社会里得到发展的，在那里，针对封建专制、贵族等级制度，建立了权利平等，立宪政权，普遍选举权，国会和政党制度，等等。这个时候，民主以国家结构的概念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实际上成为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的国会制的同义词。在本世纪，作为法西斯专政的对立面，对许多人来讲，民主又是自由的体现。

我完全无意缩小这种政治制度在扩大自由权方面的意义，但社会主义民主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不同的含义。因此把两者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不仅资产阶级社会的信仰者向社会主义提出实现这一结构的要求是一种误解，而且共产党员根据自己的精神道德观，去否定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不恰当的。一种社会制度的优点、缺点、错误、进步、落后，都应该同自己的标准，而不应该同另一种类型的国家结构作比较。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不在于人们定期选举别人来代替自己行使权力，而在于人民亲自参与执政。

制定和确立直接的人民代表制，肯定是一个比国会制度更加复杂和长期的进程。它并不一定要求实行，但也不排斥多党制，它的政治活动领域要比在党派斗争中反映的不同利益和意见广泛得多。人民代表制的古典形式是巴黎公社和俄国的苏维埃。

匈牙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结构：一方面建立了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制，另一方面保留了通过普遍投票选出的国会。但是国会代表不是按多党制的规定选举产生，而且匈牙利宪法规定，“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政党是全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再加上各种全国性社会团体，如工会，爱国人民阵线，那么，可以看出，匈牙利人民政权的国家组织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构制度的帮助下形成的。

“民主不能光靠做决议的办法来实现。”卡达尔说，“实行国会制之所以比较简单，是因为大多数人参与公众生活，在国会主要表现在每隔几年对某个党投一次赞成票，而人们普遍地——即使

不是每天——参与公共事务就要复杂得多。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权利，同时还要有使权利不致成为一纸空文的可能性，还要使人们有运用这种权利和可能性的要求。”

在匈牙利，权利和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且，根据我对国家情况的了解，人们也有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要求。我认为对于政治机构制度缺乏彻底考虑和它的不够完备，是我国国家最主要的缺陷。

根据马克思的概念，激进就是深入事物的根底，而人的根底就是人。社会主义不是目的，而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中我们深深懂得，人的改造是最困难和最缓慢的过程；不仅改造几个人，而且改造整个民族，尤其如此。

有过一段时期，人们把问题看得很简单。那时大家认为，谁把个人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谁就是社会主义者。这种自我否定在短时期内是可以想象的，但不能当作一项基本原则。“英雄的时代”已经结束。安定稳固的社会主义社会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那些曾经为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敬仰那些衣衫褴褛、忍饥受寒和日以继夜地艰苦劳动的先锋战士，但是在今日的社会主义中应该树立的榜样，应该是那样一种人，他们努力使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协调一致，把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融为一体。社会主义的人是集体的一员。制定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不以某种形式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主义者是不存在的。

卡达尔在回忆韦莱什·彼得时是这样写的：“这位从不间断思考和从不安于现状的人认为自己事事处处都是当事人，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有关系。无论小事大事，他都不会采取冷漠和不关心的态度。他认为，不管看起来问题多么困难，甚至不可解决，‘都不能对之熟视无睹’。有人说：‘彼得伯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对什么都想发表意见’。这不是出于什么高傲和喜欢自我表现，也不是想突出自己，而是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热情和关心。他

始终清楚地看到，建立、改造历史和社会的是劳动人民。懂得和参与讨论各种生活、道德、经济和政治问题，并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发表意见，是人民的义务和权利。”

各种需求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出现，此外还有各种设想、愿望和理论。而它们的实现还需要等待。

如果为在世的人书写传记，总要在某个地方，多少是有点武断地告一段落。本书也不例外。卡达尔·亚诺什除了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和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理事外，还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最高机构党代表大会最后一次是在1980年举行的。上面我追溯了卡达尔的生活道路，并作为背景资料介绍了匈牙利历史。党在匈牙利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不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既是群众性的政党，但根据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它又起着社会领导者的作用。人们通常把政治局当作实际上的国会。这种比喻是不确切的。在匈牙利，国家生活的执行机构，是政府各部和地方议会。政治局没有执行的职能，中央委员会没有立法的权利，即使党的最高机构党代会，也不属于这一范畴。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方面通过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实现政治领导。一切全国性的重要问题，都根据政治局的建议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结构是理想的，党的活动的体制、党和国家之间的分工是完善的。上面谈到的关于国家生活民主化的一些规定，实质上适用于党的民主生活，只是有时方式不同罢了。

我在这里介绍几个数字材料，大概不会是无益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二万四千个支部，八十万党员。1%的党员是在解放前入党的，1944年至1948年入党的党员占16%，1949年至1956

年入党的占9%，1957年以后入党的占74%。

党员的29%是工人，6%是农业工人，41%是脑力劳动者和职员，16%是退休者，8%是其它劳动者。根据党员原来的职业，工人占62%，农民占11%，知识分子和职员占25%。党员年龄三十岁以下的占2%，三十岁到三十九岁的占26%，四十岁到四十九岁的占27%，五十岁到五十九岁的占24%，六十岁以上的占15%。

党员的文化程度：12%的党员没有学完八年制小学，25%的党员小学毕业，46%中学毕业，17%大专院校毕业。

男党员占72%，女党员占28%。

以上数字表明，解放前的党员正在接近完全消失。他们还有八千人，而我在本书中曾经提到，当时地下党员只有几千人。因为这八千名党员中也包括了过去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和流亡在国外的共产党员。其它的数字材料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状况，1948年以前入党的党员比例较大，因为当时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49至1956年入党的党员现有七万名，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很小，虽然当时全国的党员人数最多。四分之三的党员是在1956年以后参加党的，他们占党员的绝大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约有三十万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当时已经符合参加劳动人民党的年龄条件，但那时他们没有入党。

党员现在和原来的职业有很大的差别。这意味着社会有了重大的发展。党员的四分之三原来是工业和农业工人，而现在工业和农业工人只占三分之一。如果不把退休者计算在内，目前党员中有三十万工农出身的脑力劳动者。

党员的学历状况表明，党员中没有受过小学基础教育和大学毕业的比例都比全国平均比例数要高得多。前者是那些在旧社会没有学习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后者表明，在国家最有知识的公民中，党员的比例要大得多。

党员中男女比例也同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别。全国

人口中男女比例大体上是各占50%。遗憾的是，男女党员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这不仅是因为妇女在匈牙利成为平等的公民还只有半个世纪，也表明了当前男子和妇女在由社会、经济和个人等因素所确定的公共生活方面的作用和兴趣。

十八岁至二十九岁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相同年龄的居民占全国人口的17%。这表明，与其说是党的政策，不如说是党的组织结构和日常实践同青年的生活观不相协调。最近五年接受的党员60%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这使以上不协调的情况有所缓和。

仔细分析一下解放后党的领导机构政治局的组成不是无益的。本书没有提及卡达尔1956年后的同事们，这是不公正的。但我觉得分析他们的作用已经超过了我的可能。卡达尔自己经常强调他们的作用，他在六十寿辰时曾经说过：“我无法把自己个人的工作同他人的工作区别开来”。

1945年选出的政治局平均年龄四十一岁，最年轻的三十二岁，最年老的五十三岁。六个工人，五个知识分子。六个来自匈牙利的地下党，五个曾经在莫斯科流亡过。所有政治局委员都由于参加政治活动坐过监狱。从国外流亡归来的大多数年龄在五十岁上下，地下工作者多数在四十岁以下。前者知识分子比较多，后者多数是工人。

一九四八年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时选出的政治局平均年龄四十七岁。最年轻的三十五岁，最大的六十岁。九人是联合前的共产党员，五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其中十二人曾经尝过霍尔蒂制度的铁窗生活。九人是工人，五人是知识分子。当年流亡在国外的共产党员及社会民主党党员代表了五十岁这一代人，在国内的地下共产党员一般在四十岁以下。地下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工人占多数，流亡者中知识分子居多。

1957年的政治局平均年龄五十岁。最年轻的三十六岁，最年老的七十一岁，都是在解放前入党的。政治局中共产人九人，



其中有一个曾经是流亡者，原社会民主党人两人。八人原先的职业是工人，三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八人在解放前，三人在违反法制时期蹲过监狱。

回顾二十三年的历史，一九五七年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三位已经去世，一位至今还是政治局委员。其余健在的人中，除一位外，都是中央委员。

七位已经退休，但今天仍然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其中有国民议会主席，爱国人民阵线主席，工会全国理事会副主席和匈牙利游击队协会主席。

1980年选出的政治局平均年龄五十六岁。最年轻的三十八岁，最年老的六十八岁。其中原来是工人的有六人，农民有两人，知识分子有五人。1945年前入党的五人，1944—1948年的七人，1956年以后的一人。原属共产党的八人，社会民主党的两人，两党合并后入党的两人。政治局中有一名女委员。

政治局的组成很好地反映了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三十五年的变化。解放以后参加党的领导机构的是年轻的地下党员（一般是工人）和年纪较大的有经验的流亡者（一般是知识分子）。两个工人党合并以后，年纪也比较大的、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参加了党的领导，他们长期担任过党的脱产干部。当时政治局的特点是，所有委员都在霍尔蒂统治时期蹲过监狱。1957年政治局的绝大多数委员都被捕入狱过，他们是当年的地下党员，大半辈子都当工人。1980年情况有了变化，大部分政治局成员是在解放后入党的。

卡达尔代表了连贯性。他年龄最大，现已六十八岁，曾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来又是合法的共产党的党员，参加过社会民主党；是工人，但又担任过四十年党的领导人，解放前和违反法制时期都坐过监狱；除被迫中断五年外，1945年以来一直担任政治局委员职务。

不仅他的一生经历，而且决定他政策的生活观，也都意味着

连贯性。

卡达尔说，“当人们理解了一种思想，就会接受它，要去实现它。后来，理论与现实发生了矛盾，任何事情都不会象人们初次设想那样得到实现。只有依靠理智和现实感的帮助，我们才能知道在什么样的可能条件下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思想。否则理论将成为教条，而它不会促进，只能阻碍思想的实现。辩证法不能违背逻辑，因为不符合逻辑的事物不能是辩证的。”

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为自己确定了生活的哲学定义，但是，如果追溯他的过去，可以发现这一生活观贯穿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公众舆论认为，卡达尔的最大政绩是，在1956年的危机以后，使国家重新振兴。人民不会忘记，在大动乱以后，只过了十年时间，人们就能在相对安宁和优裕的条件下生活。

卡达尔说，“对于象我们这样一个曾经饱受苦难的国家，最重要的是，终于得到了一点平静和安全，可以休养生息，积聚力量，建立自信心。”

匈牙利在本世纪确实经历了极度的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的失败，苏维埃共和国，白色恐怖，特里亚农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箭十字党统治，解放，转折年，拉科西时期，1953年，1956年。这么多的事件，即使前后回忆一遍，也要费很大的精力，更不要说去亲身经历、思考分析和本能地进行消化了。

一段时间里，不少人抱怨卡达尔的政策固执，说他顽固地主张保持平衡和安定。我自己也不满在平静的环境中滋长起来的懒散、怠惰和贪图安逸。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为一切流逝的岁月感到悲叹。历史使用的是另一种计时单位，几十年光阴就像几分钟一样匆匆消失。对于人来说，一个世纪的时间长不可及，而在历史上它只是一瞬间。

然而在这些年月里不知发生了多少事件。1957年，混乱不堪的政权得到了巩固。1960年，农村改变面貌，波及了几百万人的生

活。1961年，执行坚定的联盟政策，又有数十万人的生活发生变化。1968年，改革经济体制，全国都动了起来。七十年代初期，改革停顿和动摇犹豫。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新的冲刺。

只看到安定和保持平衡的人无法正确评价卡达尔的作用。无论在1956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在建立全民团结和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卡达尔的政策都是激进的。在最后这个问题上，敢于在第二次冲刺中不仅纠正政策本身的错误，而且按照经济改革的要求和目标改造整个社会结构，使改革发展成为全民的纲领。正是在最近几年，由于内部的发展，匈牙利成了世界政治的因素。

“解放后，有一次一位女同志向我诉苦。”卡达尔说，“她为父亲是个工厂主感到羞耻。她是个非常正派和勇敢的女同志，我曾和她一起搞过地下斗争。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对她说，它只能说明，你走过的是一条更加曲折的道路，为了革命你抛弃了家庭的优裕生活。我却比你简单得多，我是因为成天遭受生活的磨难才成了共产党员。”

卡达尔的生活道路是不是真正那样简单，还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 后 记

炎热的初夏。我们驱车访问某州。到达州界之前，车子停了下来。后面的行李箱里放着一个冰袋，从中取出啤酒，大家喝了一杯。盛暑中它是多么清凉可口！

卡达尔不管去什么地方总是准时到达。每次接见客人，他总是分秒不差地把门打开。现在停车休息，也是为了按时到达出访的第一个城市，州的领导人在那里迎接。在我们来的那条公路上，其它的汽车照常行驶，交通没有中断。

我们去州里访问了三天，到处都按照预先安排好的日程准时活动，一分钟也不差。只有一次例外，这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归途中，车子在布达佩斯郊区又停了下来。卡达尔拿出怀表。

“我对我妻子说六点钟左右到家。”

这时，时针指着五点半钟。

那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到达州府，住在州议会招待所。吃晚饭时，卡达尔从招待员手里接过了分菜的匙子。

“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他吃得很少，不喜欢别人把他的盘子装得满满的。他这一代人懂得，盘子里剩下食物是一种罪过。

夜晚，我们穿过寂静的公园散步到附近的游泳池去。卡达尔不慌不忙、有节奏地在水里浮游。看出来他不是从游泳专家那里学会的。他在温水池里泡了很久，让喷泉拍打着自己的身子。他身材匀称，体格强壮，看不出来是快到七十岁的人。我也曾见过他比现在疲劳和憔悴得多。

第二天早晨我们七点起床，八点进早餐，然后到州委会听取

州领导人的工作报告。之后，卡达尔作简短讲话：他表示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前一段时期已经作过多次公开讲话，其它东西一时也说不出来。州里的问题首先要由当地来解决。他这次主要出来走走看看，了解情况。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这个州里来了。

汽车驶向全国一个最大的冶炼工厂。先是工厂领导人介绍工作情况，然后坐大轿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这个面积有一个村庄那么大的工厂。中途多次停车，卡达尔走下车来同大家交谈。

一点钟在工厂吃午饭。饭后卡达尔离开半个小时，去集中精力考虑下午的讲话。下午在文化馆召开大会。会场里座无虚席，气候非常炎热。卡达尔不用讲稿，只是时而看一下手里的提纲。会后他喝了一杯清凉饮料，脱了上衣，解下领带。休息十分钟。

我们步行到城里去。卡达尔重新穿上上衣，想了一下，叹口气，然后又系上领带。

“不系领带当然要舒服得多，不过人们会说我对他们不尊重。”

我们看了新建的城区，参观了一家食品商店和一个退休党员的街道支部。卡达尔还到州委第一书记的家里拜访，表示对东道主的尊敬。晚上在饭店同州人民阵线领导人共进晚餐。他们中间有神甫、党的干部、演员、工人、大学教授、警察和工厂厂长。卡达尔作了简短的讲话。深夜才回到住所。在招待所客厅里我们又谈了一个小时。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又从头开始活动。

唯一的一次没有准确按照日程进行的活动，是参观市容。我不知道这个二十万人口的城市那天有多少人涌上街头。几乎挤得水泄不通，以致我们难以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通路。至少有五万人。卡达尔安详地在人群中走着，时而微笑，时而挥手致意。周围，人们鼓掌、欢笑。许多人手中握着鲜花，挥动着向卡达尔致意。卡达尔不时叫住一些人，交谈几句。

看来是很细小的事情，但我不会忘却。当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把箭十字党人弄到西方去后，一直由美国保存的圣·伊斯特万

的皇冠在三十多年以后归还匈牙利时，我也在国会的圆顶大厅里。我看到了美国保安人员，他们脸上肌肉紧张，眼睛不停地向周围环视，手臂半弯着，准备随时拔出武器。认出他们来并不困难，他们一只耳朵上塞着小扣子般的耳机，时而对着手表上的某种机器说话。而跟随着卡达尔的是穿便衣的政府卫士，他们同卡达尔一样沉着，只有当需要在人群中开路的时候，他们才靠近来。

我知道什么是群众歇斯底里。我也知道怎样人为地挑动或摆弄群众。我看过无数部描写群众欢呼若狂的电影和纪录片。我听说过欢呼拉科西的有节奏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但像这几天发生的情况我还从未见到过。这里没有凯旋的队伍，没有群众歇斯底里，没有热烈的鼓掌声，也没有欢呼。在这炎热的初夏，人们穿着短裤、游泳衣或光着上身涌上街头。凡是他们走过的地方，人们挤满了阳台、窗口。妇女系着围裙离开炉灶，手中拿着正在做菜用的木匙向街上招手，上了年纪的男子举起帽子频频致意。

人们没有为卡达尔放声欢呼，没有把他当作偶像，崇敬如神，也没有欢庆和祝贺。但他们是热爱卡达尔的，怀着从内心发出的喜悦和敬意。我了解我们国家的所有烦恼、问题和困难，看到世界上和我国的那些令人痛苦和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同所有喜欢思考的人一样感到失望。我不止一次感到，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如果以愿望来衡量成绩，我们只是以无谓的劳动搬动了几颗沙粒。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无疑：卡达尔·亚诺什就是匈牙利。

按照卡达尔的性格，他是不会动感情的。生活把他磨炼得很坚强。但是，那天晚上他也无法掩饰，自己已被大家对他的爱所感动。此情此景，有谁能无动于衷呢？1957年春，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卡达尔在国会上说：“同志们，有时候信任使人惊吓。爱对有觉悟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因为爱——或者说感谢和信任——赋予人们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如果人们认真对待它——，要忠诚地把它完全承担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播下的种子已经成熟。”我对他说，显然有些激动。我确实也被这种感人场面感染了。

他呷了一口酒，喝得很慢、很少。

“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我们的政策。”

“您担任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已经十四年。您认为什么是自己最大的成就？什么是最大的失望？”1971年，一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曾经问卡达尔，“对于未来您个人有什么计划？”

答：“无论是谁，只要提起十四年前的往事和今天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他就会得出结论，由于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的团结、斗争和劳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我来说，能够参加这一进程，看到我个人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并且能为已经获得的成就作出了一些贡献，这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个人都会遇到失望。至于我，生活从来没有娇惯我，总是迫使我现实地考虑问题，因此我易于忍受各种不可避免的失望。我从未有过特别的个人计划，现在也还没有。很久以来我就献身于一个思想，总是按照为这个思想服务的要求和象它所允许的那样去工作。最后我还想再补充一点：个人在任何事件中自然都起着某种作用。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路线不是一个人、五个人，也不是十五个人的政策。因此，必须估计到，这一政治路线已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它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并将是持久的。”

个人迷信和与此相联的一切阴影笼罩着我的青、壮年时期，使之黯然失色。我仇恨它，直到今天它还窒息着我和使我忧郁。但是我也经历了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且读过马克思著作中的这样一段话：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进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

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sup>①</sup>

匈牙利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种“偶然性”。也许，一个世纪以后，更为下一代人所注意的是“总的发展进程”，他们可能认为，如果1956年不是卡达尔出任党的领导，国家的命运基本上也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作为同代人的我只能说，如果不是这样，几十万、几百万人的命运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定是另一个样子；我无法如此抽象和没有偏见地研究历史，以致忘却了在历史中生活的人。不仅卡达尔同国家合为一体，而且国家也同卡达尔合为一体。因此，我才敢写出这句大话：卡达尔就是匈牙利。

卡达尔很少谈到自己，尤其在公开场合。但是，1958年10月在国家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他觉得有必要在安焦尔费尔德举行的国会代表候选人提名大会上讲这样一番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我十九岁那年成为共产主义者。不能说 I 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我是犯过错误的，有时一个人还犯过相当于三个人的错误。我也做过好事。但是，可以说，我是共产党人。这一点即使敌人也无法同我辩驳。政府总理是很高的职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同样也是很高的职务。但有一种东西比所有的职务都高，那就是共产党员和人的称号。这是最高的称号。各人可以有不同的职务。我看到过总理，后来不当总理了；看到过第一书记，后来不当第一书记了。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他永远是共产党员和人，就永远具有这个最高的称号。可以说，自从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以来，我在愿望、思想和感情上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争取一辈子保持这个称号。”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10页。



他用我曾经在前面引述过的那段令人震惊的自白结束了这个讲话：

“从前，当我快该死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冷静地回顾往事，回忆我一生去过哪些地方，做过些什么事情。这在1944年没有什么困难，死就死吧！肯定人民将生存下去，苏联军队一定会到来，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但在另一次却遇到了困难。那次似乎我必须在这种处境中死去，即我的所有同事、兄弟——他们的意见为我所尊重，我曾经作为青年工人同他们一起劳动过——都以为我出卖了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可怕的事。在那种处境下我不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我迫切希望能看到有那么一天，那时人们将知道我不是共产主义旗帜的叛徒。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你们知道了这一点。这对我来说也就心满意足了。”